

# 中共党史资料

留法琐忆

50年代初赴苏学医

在西花厅周总理身边工作

流放西伯利亚的25年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农业税征收情况

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63

总第六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1997年9月出版

98583

D439  
651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200041338\*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主 编:韩泰华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本期责编:王林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第 63 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9

ISBN 7-80136-084-2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I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573 号

## 中共党史资料(63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6.375 印张 150 千字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136-084-2/K·74

定 价:6.00 元

# 目 录

## 文献资料

旅欧、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报告 ..... (1)

## 回 忆 录

留法琐忆 ..... 郑超麟(24)  
追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几个问题 ..... 毛齐华(50)  
50年代初赴苏学医 ..... 涂通今(65)  
在西花厅周总理身边工作 ..... 吴群敢(85)

## 访 谈 录

流放西伯利亚的 25 年  
——访王一同志 ..... 王林育(105)

## 专题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金融建设 ..... 张晓军(119)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农业税征收情况 ..... 李成瑞(132)

## 人物介绍

纪检监察战线上的钱瑛…………… 刘克境 王钧 李捷(150)

## 资料文摘

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张耀祠(156)

## 史实考证

张国焘另立“中央”与私刻“中央”大印

——西路军三枚木质“中央”大印由来考辨 …… 曹定云(159)

对斯诺 1936 年赴陕北采访出发地的考辨 …… 史纪辛(167)

关于确定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问题…………… 钟惠玲(171)

## 译文选登

二万三千公里的夏日之旅

…………… [越]胡志明著 洪左君译(174)

## 研究动态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五十年评述

(1946—1996)(续)…………… 张会才 韩凤琴(187)

新书选介…………… (201)

封面照片:莫斯科中山大学

# 旅欧、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工作报告

编者按：中国学生赴法留学起于19世纪70年代。但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大批赴法留学，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特别是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先后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远涉重洋，联袂赴法，使勤工俭学运动达到空前高潮。

在此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同时又面对康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均告破灭的前车之鉴，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赴法留学运动也就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全国各地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希望借助这一运动，学习新思潮，学习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培养和锻炼革命人才，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蜂拥而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不仅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对旧中国的实业发展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产生了旅欧党、团组织——例如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

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早期的建党建团活动,都有积极的直接的促进作用,并造就了一大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

1922年11月,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从法国调一部分留法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因此,旅欧党、团组织挑选了一部分留法学生从1923年至1925年先后分几批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我们从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文献中选出的两件,即1924年1月7日李富春的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报告和1925年5月23日李求实的旅莫共青团给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就是反映旅欧、旅莫团组织和留学生的部分工作、学习与生活片断情况的。

这两个报告,原件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加。现在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稿,在这里全文首次公开发表。

## 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报告

(巴黎,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同志:

旅欧区对于中央的报告实太稀少,其中原因自然在旅

欧区所处特殊环境,对内以团员日增,要想将吸收进来的同志,根本训练成可靠的战士,好回到中国来帮助同志作战,而忙于内部训练工作;在对外方面,又因旅欧共有三四千华人,对象既尚不坏,实际上以我们团体人数逐渐增加拨之,更有活动的可能性,于是又不能不忙于对外,因此报告稀少,尚望中央加以原谅!

中央发来的信件及通告,在通信方面,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发关于承认与指令更正旅欧区特殊职务的信收到,同年十月二日重述各通告的大概及十月二十日执行大会对旅欧团殊特决议的两信亦收到,其他有无遗失不得而知。在通告方面,据去年十月二日通信看来,遗失很多!总共二十次通告,我们仅接得通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共〕<sup>①</sup>六号,其余均未收得。此外收到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一份,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八十册。调查表十份,团刊三十份,我们所接到中央的刊物文件仅如此,因此对于国内团中进行〔情况〕,非常隔阂。望以后务要设法将一切文件寄到西欧。至地址仍由华侨协社书信代转处转,法文地址如下:

39,Rvc de la Pointe

La Gaunne Calomlu

(Seine)

France

国内大会对旅欧区所指定的各项工作及更正旅欧区特

---

① 方括号内的字为编者所加,下同。



殊职务第四项,已交本届大会更正,至努力研究主义,教育华工,发展组织,注重国民运动,扩大国民党组织,团员完全加入民党等,均在极力进行,详情散见后面各种报告。其关于中央所希望我们要作的文字及译著主义书籍,因旅欧区的同志中,比较能担负此项责任的,多忙于为团体服务,而其他的不是忙于求学,即是在作工,时间固然给了同志们以限制,而能力充足者亦尚无多人,于是也仅能尽可能的去做,在最近的将来虽然望不着有很多的成绩表现,但将来总可做到一部分。

旅欧区自接到中央第四号通告后即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发出通告,召集第四次临时代表大会,讨论本区依据国内新章改组改选事。结果大会完全接受中央指令,实行改组改选,改组的结果,对于组织方面,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五个执行委员组织之,互推三人组织书记局,在执行委员会指挥之下又分设两部,即(一)宣传部,(二)训练部。各设主任一人。即以其余二执行委员分任之。旅欧区因情形较国内要特殊一点,在一地能得二十个同志的很少,而又常迁徙无常,且为同志们经济点时间出来作旁的宣传训练等事。……曾取消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以减少手续,这在章程上亦有此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区执行委员会一语之规定。故将他取消。更在此加以特别说明。区执行委员会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小组,惟小组不限于五人,因人过少研究会无人供给材[料],反减少了兴味,这也是应得说明的。

本届大会改选,选出执行委员五人,即:周恩来、任卓宣、李富春、张若茗、刘伯庄。候补执行委员三人,即:穆清、

熊锐、林蔚。其职务分配为李富春、刘伯庄、张若茗三人组织书记局，任卓宣担任训练部主任，周恩来担任宣传部主任，书记局三人的职务分配为委员长李富春，秘书刘伯庄，会计张若茗。张若茗同志于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开会即提出辞职案，结果执行委员会审查将来书记局工作，若茗以一女同志担任此项职务，实有碍于进行，即允其辞职，以穆清补充会计一职。至旅欧区改组后共成一十三支部，全体团员共一百六十四人（计旅欧区连前后去俄同归国的合算起，有团员二百人）。在今后对内的训练与对外的活动，与本届大会中从〔重〕新估定其方针者不少，其重要议决案俟将来印出后，自当寄回作诸同志的参考，但在详细情形，不能不在此加以说明，兹分项述之如下：

#### 一、关于内部训练的

关于内部训练的，大约可做如下说明。

(1)共产主义的研究。在这一项，我们旅欧区决定两个标准来训练同志们。(a)人的标准。因为本区团员学生工人均有，在学生方面了解力较强，对于主义的研究易于引入较深的境地，故在内部的印刷物特编有共产主义的教程，谈高深的学理，以应学生同志的要求。至对工友同志，亦出有共产主义浅说，描写共产主义浅近的全部理论，平时每周各小组均有讨论会，每月支部会议亦可讨论主义，更常开支部的联会，亦多讨论主义及时事问题，对软弱的团员，亦常常指定专人施以特别训练。(b)时期的标准。在研究的时期上分两个段落，第一期自去年起至今年六月止，为普通的研究，从唯物史观起，次阶级争斗，次马克思经济学说（农业包含

在内),次时事问题。第二期自今年六月起即将一部分主义已有根底的同志提高他们的研究,作专门的研究,如经济学、历史学——如俄国革命史、劳动运动史等——以至达尔文的进化等等。这就是旅欧区关于主义研究的预定计划。

(2)活动能力的训练。此项训练完全在各种会议中施行之,于各种会议中要同志们普遍的发言,以练习演说的能力,要同志们轮流作主席记录,更要同志们在各种组织中平常练习办理。至在外面的各种活动,亦常指定同志去参加以练习能力。

(3)关于纪律的训练,这一项是随时的工作。在最有作用的时候,是开批评会,彼此必将各个人的思想行动及对团体对同志种种表现,都加以严刻的批评,以纠正其不合共产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思想等错误,而期能完全无产阶级化,并绝对服从团体纪律!

## 二、对外的活动

在此项中本可分五大项说明。即(1)学生运动,(2)华工运动,(3)民党运动,(4)其他社会主义团体运动,(5)出版。在这五项中(1)(2)(3)(4)的运动方针有重要议决可查,即不报告,只分条从实际的运动方法及效果说一说,至(5)的一项,更提后特列专项,因为还要将团内的出刊物作综合的报告的原故。

(1)学生运动。旅欧的学生中,在一般官费生同自费生我们的活动力量比较难插入,在旅欧的团体中,官费生与自费生少极了。几乎全体都是勤工俭学生。在这一点我们很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论证:思想行动是由生活条件决定出

来的价值。在勤工俭学生中，自然有一部极力反对我们，然而大多数很可以宣传，只是有许多实业观念重的很难宣传，但西欧同志的努力，已把许多铜墙铁壁打破了，我们同志们在外宣传，几乎令许多人畏惧，不敢与我们讨论，照这样努力的结果，所以于去年二月至八月六〔个〕月中，增加团员八十余人。与基本团员之比为三与二之比强，即是说加了百分之七十的新团员。在这一点上，可见西欧的学生运动对象不坏。至于官费生自费生中，于里昂大学方面的效果收的太少，自然是遗憾，但我们总想设法杀入他们的队伍中，将来或许也有一部分结果。我们在学生中运动的方法，自然一方面不放弃各种公开的运动，投入群众中去演说，以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与见解，藉此引起其信仰心，他方面用全力作个人的活动，单独宣传，这样去吸收同志，颇得了些效果，再一方面，实行作种种组织如书报传阅社，诗社，社会革命问题讨论会，谈话会等以取得宣传及联络的机会。这就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大概。

(2)华工运动。华工运动入手时非常困难，在开始活动了半年，仅得吸收同志二人，至近来成效已大著，在工界吸收的同志已达四十余人，优秀的分子几乎完全加入了我们的团体，本来在工友中吸收同志，现在颇为容易，只是限于人力财力两者的关系，吸收进来训练困难，所以为保持团体的纪律起见，不敢大胆的吸收而已！华工总会，自入我们团体的手中以来，算是三次大会的改组改选了，无政党人用尽伎俩，终没有抢得过去，在上届的工会执员，全是我们的同志，此次一月大会，因我们要想收罗更广大的工人群众，与

反对派略表示合作的态度，工会执员始有一二非同志参加，但大多数仍是我们的同志。对于工友运动的方法，自然仍采用个人活动的政策以吸收同志，同志们亦为他们设了好几处的工余学校以教育他们，在工友方面的教育及工友同志的训练最有成效的，要算里昂方面。以上是华工运动的大概。

(3) 民党运动。旅欧的国民党人，有能力的太缺乏人了，王京岐这个人能力无有而又狭隘。所以旅欧的国民党实少起色的地方。中央来信指定我们的同志全体加入民党，在本区执行委员会的办法，是采用分期指定若干人的法子，现在加入者仅三十三人，其原因在：第一，旅欧国民党人甚少，我们的同志一时完全加入未免太现形，因为我们加入民党，还需保守我们的所属组织之秘密。第二，我们的同志常常有许多新人团的人，研究与所受训练都很浅，不宜一时令同志们完全加入。第三，内部训练工作极为要紧，对外活动口直接关系本团者亦颇需人，全体立刻加入民党要增加许多工作，恐反荒芜了自己的团务。其未立即全体加入的理由大概如此。但缓缓的仍是要做到全体加入的。在扩大民党组织上说，国民党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成立支部，其中自然亦有我们的同志在帮助主持一切。而巴黎的通信处，固是我们同志成立的，比国通信处亦系我们同志主持，现我们同志又正在柏林创设通信处。故对于此项还算在极力进行中，从现在形势看来，将来国民党在欧的活动，自然又要我们的同志替代他们作的！同志们加入民党者既少，为时亦最暂，故为民党吸收党员与由民党中吸收进步分子入我们的

团体，成效仅略有而未著，这也应得报告。

(4)其他社会主义团体运动。留欧方面各种组织颇多，即以法国言，都有四十余团体，旅欧既有如此之多的社会主义团体，我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对于这些团体，根本想将他们引到民主革命的同一直线上来。亦在明白的或暗地的设法与他们讨论和接近，无如他们成见太深，现尚未能十分得手。

关于对外活动的几项重要进行状况已报告如上，下面再综合的说我们西欧团的出版物。

### 三、出版物

旅欧团的出版物其直属于团体中者共有五种：(1)共产主义教程，(2)共产主义浅说，(3)赤光，(4)通信集，(5)通信摘要。(1)(2)两种其作用内容已在前面说过，不赘。在(1)的一种，非定期刊，视研究的进程而定其多寡，据第一个时期的六个月中，预定的七册，每册在二万字左右，共十四五万字，性质无所谓公开不公开。在(2)的一种为三周刊，每期三千字左右，性质为半公开的，就是说无论工人学生，他如需要，都可送给他看。亦不一定要外售。(3)赤光，为半月刊，每期七八千字，内容多批评中国时局及旅欧华人状况，介绍国际情势，解释中国与国际共党工作。我们深觉旧有的“少年”，既少谈论实际问题，又多登无系统的片段的较深的共产主义学理，既不能兴奋别人的革命精神，又不能应素无主义观念的群众的要求，特把他停刊，改为赤光，更辅之以共产主义浅说。(4)的一种的通信集，为不定期刊，乃团员彼此通信讨论主义的刊物，此种刊物，非有比较精美的材料不

登。(5)的一种通信摘要乃讨论团务的刊物,绝对秘密。  
(4)(5)两种都出得很少。

其他尚有不直属于我们团体的刊物而由我们同志负责编辑者有二。(1)工人旬报,(2)新工人,这两种刊物,出的比较的久,在前届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当已报告了。兹不赘。

以上已将旅欧区的情形报告毕了。再总括的说几句我们西欧团对外对内的大概情势。西欧的团体在对外方面,无论其为反对派与中立派,他们现在都认清了我们是革命的而且有组织的团体,在各种群众聚会中,他们总是注意我们的,有时亦不能不尊重我们的意见,只因被我们这个团体将西欧华人的群众□〔鼓〕动了,他们也都感觉有组织的必要,于是纷纷独树一帜,也使我们的宣传对象渐近狭隘。故在以后团员的增加比例既往,当难如从前那样踊跃!至对内则同志们不是苦工即在苦学。而又将一部分较有能力的同志指定了过半数赴俄,团中比较是有缺乏人材之叹!不过在最近的将来,拟努力训练一批人出来巩固西欧团体的基础。关于西欧团的一切工作,望诸同志看过这次报告后切实指正我们,如有错误之处,我们是绝对服从纠正的。此外对于上海地方团反对中央的通告十二及二十一,我们虽未得着通告,不知详情,但从俄国同志传来的消息,在理论上我们认〔为〕上海地方团是不对的,我们有点意见发表,望斟酌登诸团刊上,我们更希望中央以后要极力注意内部训练工作,根本铲除同志们的不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一切思想,对于团员我们应采严厉方针,宁可〔缺〕不滥而要求得坚实分子! 仅此以

闻,并请接受 C 的敬礼!

旅欧区执行委员会

委员长:李富春

秘 书:刘伯庄

## 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团 书记李求实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C. Y. 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同志:

此间自第十四期工作开始以来,因中间经过派同志回国并出外实习及党团分化等事件,故团务未能如前此照常进行,现在将月余来经过的情形报告如下:

### A. 第一、二两周的工作。

四月八日第十三期工作结束以后,因改编小组及筹备李季达等六同志回国诸事,直至十六日始开第十四期第一次组长会议,由两执行委员会根据第十三期末次大会的结果将过去的缺点及今后工作进行方针作一详细报告,经各组长及若干中坚分子的讨论,结果颇好,在这个报告里面,在指出过去的缺点及其原因以后,并详细说明本期为实行“思想奋斗政策”的时期,本期的工作的要点为:1)从理论上观察,分析并批评同志;2)提高思想的水平线;3)使同志思想上起变化——自觉;4)促进同志分化;5)准备回国。最后



就研究与谈话两方面提出若干应注意之点，并简要的附带报告“怎样达到自觉的训练”“研究方法”“怎样观察并批评同志”“怎样从事训练工作”。此外又将上届执行委员会所作的个人批评提出讨论，结果与原批评无大差异。组长会议以后各小组即开小组会议，小组会议的内容，第一是解释团体第十四期的新政策；第二是个人批评，各小组会议均有执行委员会同志参加，会议较前有精神，结果亦尚好。小组会议后复由党团两执行委员会定出小组工作进行具体方法分发各小组，并由执行委员会各同志分途与在小组会中未充分表示意见的十余较落后同志谈话，亦有相当结果。

附小组工作进行之具体方法如下：

#### I、研究方面：

a、在团体研究组织之下（各班功课讨论会，有组织的谈话会，小组研究会），各组员应尽力准备，充分发表。

b、团体指定的各种参考书，各同志应认清自己的能力去采用，在必要时组长应认清各同志的能力及需要，而分别指定之。

c、看各种参考书应以团体指定的为标准，绝对禁止看不关目前需要的参考书。

d、组长得随时检查各同志校课（党课，念报在内）和各种讨论提纲及谈话预备和结论的记录本，同志间亦应互相严格监督并互相帮助预备各种材料。

e、组内应互相督促整理和补足一年的功课。

#### II、活动方面：

a、同志应从理论上去分析和认识团体，同志和自己。

b、应努力参加有组织的谈话会，他组会议亦应尽可能的去参加。

c、绝对的不要无意识的无预备的个人谈话。

d、在各种谈话会中及各种工作中应彼此注意同志的观点，态度，习惯及说话技术，尤应注意组内同志而时常提出批评和纠正。

e、注意正确切实的填写报告表。

f、组长得酌量各同志的需要，指定同志参加某种谈话会。

Ⅲ、个别训练。

## B. 党团分化

此间过去因为便于训练起见大部分工作均由党团合作，即小组工作亦然（凡是党员无论其年岁大小同时均须为团员），此种情形中央诸同志想都知道。最近东大俄党部对于积年未得解决的东大中国班党团组织问题有一新决议案（详情谅党部有报告，兹不赘）令中国班党团工作实行划清，同时 C. P. 第四次大会及 C. Y. 第三次大会对于 C. P. 与 C. Y. 之关系均有更明确的规定；我们自己亦察觉过去对于 C. Y. 本身工作（如青年问题之研究等等）多有忽略；且数月以来同志分化逐渐明显，落后分子大概团员诸多数；在研究与训练方面党团工作亦有分划的必要，所以于四月二十九日党团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按照东大俄党部的决议及中国 C. P. 与 C. Y. 的章程，实行党团分化。

党团分化的要点如下：

a、凡年龄过 25 岁的党员，均须退出团为纯粹党员；未

满 25 岁之党员仍须同时兼为团员。

b、党团各自成立小组，各有其组长会议，但在某种情形之下，党团小组或组长会议均可合并开会。

c、以前属于团文化部之各种委员会（如编译委员会，印刷委员会……）均移交与党的文化部，因此种委员会均系党团合有的工作（此次东大俄党部新决案规定，凡党团合有的工作应由党处理）。

d、文化部改为宣传部，训练部改为组织部。

e、党团两执行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开会时互派代表参加。

按上述各要点，得结果如下：

a、团员人数。在第十四期开始此间共有团员 118 人，四月半第二批回国 6 人（李季达等），五月初，又派 25 同志出外实习，再已达 25 岁之党员退出团者 24 人，故现在此间仅有团员 63 人（30 人为纯粹团员，33 人为团员兼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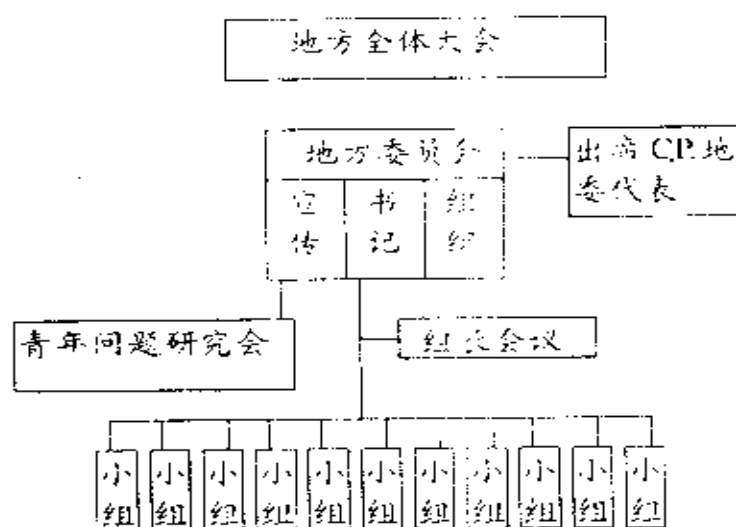
b、团小组。现共成立十一组，每组五人至六人。

c、团宣传部所属之组织。前文化部所属之各种委员会均已移交与党，现团宣传部下另设一青年问题研究会（详后）。

报告及此，乃发生一问题，应请中央解决，据 C. Y. 第三次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及第二次修正 C. Y. 章程，本团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支部十五人以上，即按工作部分分小组，有三支部人数在 30 以上，即可成立地方。

此间同志所在地仅东大一机关，似只能组织一支部；但

此间人数已二倍于 30 人，现共 63 人，暑假后尚须加多，且“附近”又无上级机关，若不成立地方，则内部工作颇感困难（干事会不能兼顾十余组的工作），且对中央，对俄少共及与 C. P. 莫地之关系，均感不便，在莫地第十三期以前即因上述原因得前届中央允许成立地方，此次党团分化改组以后，仍暂照前期“地方”之组织，如下图——



但此组织与中央通告第八号所规定的不合，即在地方委员会与小组之间，缺了“为本团基本组织”之支部，现在应请中央解释的，即：此间在事实上势不能不成立地方；然成立地方又有与大会决议不合之处，此点究竟如何解释，应请中央即刻答复。

又，关于中国 C. Y. 在莫成立地方团（或他级机关）一事，东大俄少共极表不满（与东大俄党部不满于中国 C. P. 在莫成立地方相同），屡次向我们提出否认，此次东大俄党

部新议决,已正式承认中国 C. P. 旅莫地方之成立,东大俄少共对于中国 C. Y. 旅莫地方之成立,则申明由少年国际解决。中国 C. Y. 在莫必须成立地方(或他级的机关),其原因中央自深悉,现在应请中央即刻去函少年国际,说明中国 C. Y. 在莫成立地方之必要,请少年国际速予正式承认,以免障碍一切工作之进行,此事望中央即刻进行。

### C、党团分化以后。

关于党团分化事件,五月六日在党团合开大会中宣布以后,十日即召集团组长会议(并有中坚分子参加),决定团工作进行计划。在此次会议中执行委员会除指出过去两星期之缺点(沉静、散漫、敷衍)及其原因(a、组长未尽责;b、一般同志不了解团体的新政策,有惰性)外,并说明现在的环境(a、许多好同志回国;b、党团分化,团员成分极散;c、暑假快到)及今后工作应注意之点(A. 全团方面——1、一般同志应充分了解团体的新政策;2、了解并严格实行小组工作进行这具体方法——见前;3、结束学校功课;4、注意谈话——理论及训练的。B. 组长方面——1、应在行动上领导同志;2、应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改进自己的行动;3、组长彼此间应密切接触;4、应多与执行委员会接近。C. 执行委员会方面——1、多参加小组会议;2、分别指导小组工作;3、多开会讨论团务)。经多数发言讨论,结果与报告无异,组长会议之次日即开小组会,报告组长会议结果并摘要举行个人批评(特别注意中平分子),结果均好。现在关于研究方面的各班校课讨论会及有组织的谈话会,关于训练方面的个人谈话或有组织的谈话会,均已积极进行;关于中国实际问题的研

究(与党合作的)亦已进行(此次的题目是“国际状况,与中国政治争斗及我党目前应取之政策”),唯小组工作仍无大起色,因团员中中坚分子太少,组长不得力,执行委员会亦未能用全力指导小组工作,不过就一般看来团体现象较两周前尚有进步,沉静散漫都比较减少了。

#### D. 学年末的批评会。

东大定章在每学年之末,教育部及党团三方面对于学生均有一次总批评,中国班团的批评是本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分三次举行的。此种批评先由东大俄少共规定了三大标准,与前次我们每月的批评形式稍有不同。批评会举行时,学校俄党部及少共均派人参加,党员亦得出席发言,会场中精神颇好,现将批评之标准及结论的统计报告如下:

### 批 评 的 标 准

#### I、团员之真相

- a、对于实际(政治的)生活了解的程度;
- b、对于团体的忠实;
- c、守纪律否?
- d、尽团员的责任否(如到会等)?
- e、同志间的关系如何?
- f、对于党的兴趣如何? ★

#### II、对于学校一般工作努力否?

#### III、对于团体的工作努力否?

### 结 论 的 统 计

## I、团员之真相

a、对于实际(政治的)生活了解的程度:

深切了解者	相当者	欠了解者	不了解	共计
15	22	8	16	61

b、对于团体的忠实:

忠实	中平	无表现	不忠实	共计
20	7	23	11	61

c、守纪律否?

自觉的守纪律	不自觉	不十分守的	共计
20	34	7	61

d、尽团员的责任否?

很尽责	机械的	不十分	共计
27	30	4	61

e、同志间的关系如何?

很好	平常	共计
20	41	61

f、对党的兴趣如何?

很高	平常	有偏向	无	共计
20	24	7	10	61

II、对于学校一般的工作努力否?

自觉的努力	被动的	不十分努力的	共计
20	29	6	55

(有6人在医院)

III、对于团体的工作努力否?

自觉的努力	被动的	不十分努力的	共计
-------	-----	--------	----

就大概说来,此间团员的成分可得如下的百分数:

好的 33%,中平的 50%,不好的 17%。

### **E、青年问题研究会**

a)、组织。这个研究会属于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设委员五人,以一人为主任(现由宣传部主任兼)。

b)、研究的内容。这个研究会研究的内容包括下述四项:

- 1、中国青年状况的研究;
- 2、中国 C. Y. 与中国青年运动;
- 3、少年国际与各国少年共党的活动;
- 4、俄国少年共产党的研究。

c)、研究的材料。一面靠同志自己的力量(这种工作自然尽量要全体同志参加),从书报上面搜集材料,一面向东大少共及少年国际交涉,请人作报告。

d)、研究的方法。由研究会按上述内容作出提纲再按提纲分途搜集材料,俟有相当结果时,即由研究会指定同志(一人或数人)预备在大会中作报告,更重要的则提出小组会中讨论。

e)、研究的步骤。现拟先研究少年国际,次及俄国少共。关于中国青年生活状况及中国 C. Y. 与中国青年运动现均着手搜集材料。

关于中国青年的生活状况及青年运动状况的材料,此间极少,希望中央尽可能供给莫地此项材料。

“附”,研究的提纲



青年问题研究会研究的问题分下列四种：

- A. 少年国际及各国少共运动状况；
- B. 俄国少共的研究；
- C. 中国青年生活状况的研究；
- D. 中国 C. Y. 与中国青年运动。

A. 少共国际及各国少共运动状况

- a) 大战前世界青年运动及少共国际的形成；
- b) 少共国际的组织——党纲章程……；
- c) 少共国际各次大会的概略及其决议案；
- d) 少共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 e) 少共国际与其他各组织的关系；
- f) 少共国际成立后各国少共运动的状况；
- g) 少共国际与东方青年运动；

B. 俄少年共产党

- a) 十月革命前的俄青年运动状况及俄少共之形成；
- b) 俄少共的组织——党纲章程……；
- c) 俄少共各次大会的概略及其决议案；
- d) 俄少共和少共国际，俄共产党，第三国际少年童子军及其他组织的关系；
- e) 俄少共运动的现状；

C. 中国青年生活状况的研究

- 1)、一般的青年生活状况(包括青年工农学徒学生妇女童工……)
- 2)、青年工人农人学徒生活的比较(家庭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工作种类；工资待遇……)

3)、京津、沪杭、武汉、川湘粤等地的青年工人生活的比较；

4)、大学生与中学生生活之比较(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教课……)

5)、教会学校学生生活的研究；

6)、青年女工与青年男工生活的比较；

7)、女学生与男学生生活的比较；

8)、中国青年工人生活与日本、美国、英、俄的青年工人生活之比较(教育、工作时间、工作种类、工资待遇……)

D、中国 C. Y. 与中国青年运动

1)、C. Y. 成立以前之青年运动状况；

2)、C. Y. 之成立及其组织；

3)、C. Y. 各次大会的概况及其决议案；

4)、C. Y. 与少年国际及中国 C. P. 之关系；

5)、中国青年运动的现状(工人、农人、学生、妇女、兵士、学徒……)

F、第十四期莫地负责同志的姓名

a、执行委员会：

求实(书记),富春(组织),穆清(宣传),奇岳、人达；候补委员：苓生、警东、向应(正式委员克靖派出作工,由人达递补并由五月六日大会补选向应为候补委员。)

b、组长：

化之、隋和、家辰、味根、比难、向应、贺果、蔡畅、继曾、合林、鄂阳。

c、青年问题研究会：

穆清(主任)、冰冰、蔡畅、苓生、合林。

### G、团员名单

(1)团员			
姓名	年龄		
合林	23	仁先	34
越一	23	任平	26
陈钧	22	秀京	20
家熙	23	文浩	23
涌泉	23	占奎	20
宗孚	22	镇寰	20
李特	21	贺果	29
卜烈	23	贤珏	23
韦坚	22	稽直	25
继曾	25	长卿	25
止戈	24	定远	27
宝泉	24	子刚	23
平民	25	名栋	23
徐东	27	隆真	27
鄂阳	30	健亚	22
		共:	30人

(2)团员兼党员:			
姓名	年龄		
乔年	23	奇岳	24
连生	24	李枏	25
家宸	20	人达	24
		黄镜	24
		隋和	21

警东	24	达文	23
冰冰	23	化之	23
乃昌	20	继渠	22
树敏	25	向应	22
来杰	25	学禄	21
味根	25	石月	25
达垓	29	培元	23
朝凤	21	富春	25
康庄	24	蔡畅	25
信民	24	□君	20
求实	22	念祖	25
比难	22	冉钧	24
静仪	22	共：	33人

关于团的出版物，如中国青年，此间还未收到（仅零碎收到一两期），望中央注意此事（可仿向导寄法）。

我们大概明后天即须到乡间去，一切再续告。请接受C的敬礼！

旅莫 C. Y. 地方团书记 求实

五月二十三日

# 留法琐忆

郑超麟

我是1919年12月初到法国,12月中旬便进圣日尔曼中学补习法文的。这个中学第一次收中国学生,特辟一个法文补习班,特请一个教师来教我们。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学生,陈炯明派来的,每年有本县公款300元补助的半官费生。约两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又送来几十个学生,另开一个法文补习班。

在圣日尔曼中学里,福建班学生和外省班学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语言隔阂。福建学生每人能说普通话,但一般都说不好,少数人说得好的,究竟不如说方言畅快。语言不便使福建学生同外省学生发生隔阂,在福建学生中也发生了漳州和客家话之间的隔阂,因此又发生地域隔阂。归漳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漳州话,归汀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客家话。两府学生时常争吵,以至于打架,有一次还请张继来学生中间做调解工作。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开始,我也难免有地方主义,但很快就从地方主义发展为汀漳一家、福建一家、全国一家,以至于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异,福建学生是落后的。福建学生虽也经过了五四运动,但汀漳二府的五四运

动，单是抵制日货，而不是新文化运动，外省学生大多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那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例如尹宽就是芜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他们来说，抵制日货和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他们一面组织学生出去检查日货，同以当地商会为组织的资本家阶级面对面斗争，一面手不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出版的杂志。他们互相争论“文言和白话”、“三纲五常”和“赛先生德先生”，甚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汀漳二府的学生不知道这些问题，即使知道一点对之也没有兴趣。他们爱说的是如何发财，如何物质享乐，如何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他们向往的是南洋群岛，是华侨生活，充其量也是资本主义。

我在这一批同乡中没有谈话的对象。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不感兴趣。有时与外省人交谈几句我倒发现有许多同感兴趣的问题可谈的。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书看。福建学生的行篋中没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杂志，没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外省学生则有很多这类的书刊。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轮船上向一个外省学生借来的。这本《新青年》登载了一个叫做陈独秀的人写的一篇非圣无法的文章，最后用“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话来反对孔子（按：这篇文章题为《宪法与孔丘》，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当日，我写日记时长篇大论大骂陈独秀。可是从此我有了瘾，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他的新文化杂志来看，外省学生来到圣日尔曼中学后我就向他们借这类书刊来看，我早已不骂陈独秀了。

## 自 明 团

外省学生中有几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并不骂福建学生野蛮，而是像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蛮人。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我这个爱借新书看的人特别引起他们注意。贵州学生汪颂鲁特别喜欢帮助我向别人借书，喜欢同我谈话、讨论问题。他在我背后替我宣传，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谈话。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说的话绝对化了，好像30几个福建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同外省学生有思想上的接触。另有一个或两个福建学生也有些接触，不过性质上多少有点不同。他们是为了“交朋友”，我则是为了求知。

一天汪颂鲁带我到学校内一个偏僻课堂的门口去，课堂内没有人，门是锁着的，门前走廊上站着一个高而瘦的人，面孔像煮熟的螃蟹壳。汪颂鲁作了介绍，说这人名尹宽，我听了不觉暗笑，叫作“尹长”不是更适合些么？这个人未等寒暄，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说。内容，我自然忘记了。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常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为了不致引起别人惊怪，我们往往到校外圣日尔曼森林内的空地石凳上去谈话。渐渐地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来研究学问。讨论名称时，我建议叫做“自明团”，他们两人立即接受了。

为什么叫做“自明团”？因为当时《新青年》发表了张崧年一篇文章，介绍以罗曼罗兰为首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张崧年给每个签字的人作了简单的

介绍,对于不久之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金的巴比塞,除介绍他本人外,还说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光明团”。我在巴黎一条小街道上寻找到了光明团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订了一份《光明》。那地址是一个小书店,卖革命书刊的。我的法文学得比他们两人好,常常告诉他们革命书刊的内容。汪颂鲁说:“你这个名称取得好,要向别人说道理,自己先要懂得这道理。”我们的计划是以三人为核心先组织起来,然后争取别人加入的。可是,没有增加一个人,最后连团体本身也无形消失了。

团体成立不久,暑假到了。外省学生全部离开学校,福建学生大部分离开学校,只有少数人没有离开,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团”没有解散。我们决定通信联系。暑假分手以前,在讨论问题中,我和尹宽两人之间就常有争论,分手以后我们在信中争论,争论的是宗教问题。当时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对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宽赞成宗教。他赞成的不是某一具体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类,而是宗教精神。他认为必须有宗教徒那种百折不回、甘愿为信仰而忍受牺牲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便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他举一个例子说,有些勤工俭学生写回家信,信封上要写“大中华民国”,这个“大”字就是宗教精神。可见,他所谓宗教,意义是很广泛的。后来争论就演变为理智和感情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主张感情应服从理智,他则相反。我们反复辩难,来往的信都写得很长。双方的信,我都保存下来,连同汪颂鲁的调和的短信。争论自然没有结果,但不记



得怎样没有继续下去。1921年，我住在墨兰，认识了曾琦，谈得颇投机。他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我虽未参加，但拿我和尹宽关于宗教问题的来往信给曾琦看了。曾琦说《少年中国》准备出反对宗教的专号，他要拿这几封信去发表，我征求尹宽意见，尹宽反对，理由是：“不成熟的”。这些信，我还是保存下来，但以后遗失了。

当时我们的思想确实是不成熟的。我们三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新青年》的水平上，而且是1919年《新青年》的水平。1920年的《新青年》已经谈社会主义了，但我们没有跟上去。

1920年12月下半月，我终于离开了圣日尔曼中学而住到墨兰来。当时，汪颂鲁住在巴黎，尹宽住在墨兰。巴黎生活费太高，房租就出不起；墨兰是外省小城市，适合于我的经济条件。

法国有两个外省小城市，读音相近，都有中学，都收中国学生补习法文。一个叫Melun，一个叫Moulins。两者读音，法国人是容易区分的，但其中第二音节中国人很难分别，前者一般译为墨兰，后者一般译为慕兰，也有其他的译名。墨兰是“塞纳与曼因”县（有人译为“省”，其实面积只有中国一县大）的县城，后者是“阿里耶”县的县城。两县都在法国中部，前者偏北，后者偏南。我搬去的是墨兰城，在巴黎东南40公里，塞纳河岸上，巴黎至马赛的铁路经过市外，人口不足2万。中学有几十个中国学生补习法文，市内也有不少中国人赁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学习。我是来此自学的。在圣日尔曼，不能过这种生活，因为房租太贵。在墨兰，除租

赁人家余屋之外，还可以住小公寓，房间简陋，但租金便宜。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宁愿自己烧饭。我不是通过尹宽，而是通过一个在墨兰中学补习法文的中国学生预先租好公寓房间的。尹宽住的是人家的余屋，他东奔西跑，不常在家。不久，汪颂鲁也搬到墨兰来。他也租赁人家余屋，虽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节省得多了。

我们三人之中谁也不再提“自明团”的事情。我们各人思想都有发展以至于分歧。这时恰好爆发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对中国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进行斗争，同时群众内部也发生分化和斗争。法国各地方，有勤工俭学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镇拉加伦哥隆来。那里有个花园洋房的别墅，坐落在盘特街 39 号，是一位法国有钱的老寡妇赠送给中国侨民的。门前挂“华侨协社”牌子，表明是好几个华侨团体公共使用的，事实上是华法教育会一家独用。它处理有关勤工俭学的一切问题，我们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屋子三层都作办公室，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1921 年初，那里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达后便在那里开会。当时群众已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叫蒙达尼派，另一个很难用简单的名称概括起来，故称为“另一派”，蒙达尼派提的口号是：生存权和求学权——意思是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保障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即供给勤工俭学生进学校的一切费用。另一派则提出劳动权口号，只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设法让勤工俭学生能进工厂做工。自然还有其

他次要的分歧，双方在群众面前辩论，而且写成文字，胶印多份散发。辩论发展为谩骂和诬蔑。另一派骂蒙达尼派为“寄生虫”，为逃避自食其力的劳动，而要求上层社会的豢养；他们根本反对蒙达尼派号召的2月28日去巴黎巴比伦街中国公使馆请愿，以为请愿是可耻的。蒙达尼派则说另一派受了公使陈篆收买，破坏群众运动。到了2月28日，只有蒙达尼派的群众来巴黎请愿。大闹公使馆，结果被法国警察冲散了。另一派则不参加这个“二八运动”。我自己当然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因为我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半官费生”，因此我一向误记为另一派也参加了“二八运动”。近年看到了李隆郅对于这个事件的回忆，才知道另一派并未参加这个运动。李隆郅的回忆文章说：“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篆的收买，因此对于这个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个行动，但对中国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便明确表示：（一）坚决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二）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这话是可信的，另一派确实没有参加二八运动，但李隆郅回忆文章中其他部分的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则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冲淡了两派之间激烈的对立和斗争的事实。我虽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记得了这些事实。我的两个朋友恰好分属于两派：尹宽站在蒙达尼派方面，而汪颂鲁站在另一派方面。他们各自向我说本派的好话而丑诋敌派，我由此知道了双方的主张及其遗闻轶事。有时，尹宽和汪颂鲁在我家中见面

也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

我置身于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之外，把运动消息当作与己无关的社会新闻，也不去判断两派争论谁是谁非。我不想去认识两派中的活动人物。但通过尹宽和汪颂鲁，双方都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并不重视我这个人。有一天，李隆邳来墨兰看一个人（不是汪颂鲁），不知怎样到我的小公寓来，推开我的房门，说 he 叫李隆邳，顺便来认识一下。我知道这个人，正要招待他坐下来谈谈，他不坐，说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来谈。从此直至三年之后我才在上海同他见了面。那时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时还在准备考大学，自修法文、数学及其他科学，同时通过《人道报》和《光明》杂志以及国内出版的书刊去关心当前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论。我试译《光明》杂志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东方杂志》，居然发表了，并寄来稿费。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可是直至今天我尚未看过这一期《东方杂志》。

汪颂鲁约我合译一本法文书。我选定了当时新出的一本《文学入门》，是法兰西学院一位有名的院士爱弥·法格(Emile Faguet)著的。一面译，一面写信给胡适，问他要不要这本译稿。当时胡适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很快收到胡适寄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某个职员用胡适的名义写的），嘱寄去看看。我们译好便寄去了，从此没有下文。但这几个月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我的法文知识，也给了我许多有关世界文学发展的知识，书未出版，领不到稿费，我也不在乎。在翻译的过程中，汪颂鲁把关于波兰文

学的一章单独抄出，寄给《学艺》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个编辑是汪颂鲁的朋友），却发表了。译者用汪颂鲁、郑超麟之名。我在一本刊物的广告上看见目录。但至今也未看到这期杂志，更未得到稿费。奇怪的是我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学入门》（或类此的书名），也是法格著的，但系另一个人翻译的。是否商务印书馆收到我们的译稿后，认为书是好的，但翻译不好（翻译当然不会好，因为我当时只学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个人重翻出版呢？我对于此事没有兴趣，也懒得买一本来研究一下。

## 工 学 世 界 社

尹宽当时就不赞成我做翻译工作，也不赞成我读《光明》杂志。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产党宣言》给我，要我看。他说：“这本书，有学问的人看了，不见得欣赏，工人看了，则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会接受的。”我早知道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并没有买来看，尹宽给我的是一本字体很小，纸张很薄的书，法国共产党人印出来向群众宣传的。我拿到了尹宽介绍的书，自然要看下去，同时知道这是蒙达尼派拿给尹宽看的书。我看了《共产党宣言》，随后又看了尹宽拿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两本法文小册子，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识，更多知道“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内容。不过，我自己未曾在工厂做工，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工厂做过工的人，我仅仅把各派社会

主义当作学说,但尹宽以及他背后的蒙达尼派显然已经把“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奉为唯一真理了。

尹宽和汪颂鲁确实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一年前,在圣日尔曼中学,我们三人的思想根本是一致的,即都是“新青年派”,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等等。一年以后,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思想了,我们都在探索,尹宽受了蒙达尼派的影响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是在探索;汪颂鲁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后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三人思想进程不同,明显是受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所决定的。这里,我说的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就尹宽、汪颂鲁和我三个人的具体经历来说。

尹宽喜欢说自己的家庭出身,并非同我熟悉之后才同我说,而是一认识我就同我说了。他的父亲是农民。家里很穷,他少时就在田里劳动,也在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看见他很聪明,很会读书,可以造就为人才,于是有意培养他,物质上支持他(我想,当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钱培养他,因“十个先生九个穷”),送他进新式学校,最后送他到芜湖进农业中学。五四运动中,他在芜湖成了学生群众的一个领袖。

我欣赏尹宽是桐城人,因为我在中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读的是桐城人姚鼐选的《古文辞类纂》。那时人家说桐城人出门只说自己是桐城人就够了,不必说安徽省桐城人,安庆府首县是怀宁,但与桐城并举时人家不说“怀桐”而说“桐怀”等等。《新青年》虽然骂“桐城谬种”,我虽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对于桐城的向往尚未泯灭。我很佩服尹宽,他读的书也许没有我多,但比我从书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处。他

没有书呆子气,能办事,能辩论,能指挥群众,能演说,而在群众面前说话时又能随机应变。这些,我是自叹不如的。自然,他的优点之中也包含了缺点。

他是五四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很活跃。在五四运动中,安徽各城市的学生没有芜湖闹得凶,省会安庆学生运动也不如芜湖。高语罕、恽代英都曾在芜湖教书,恽代英在宣城教书,但常来芜湖讲演,自然发生了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尹宽怎样活动,我今天已经说不出来了,他也许根本没有同我说起,可能说了但我忘记了。我是从其他安徽学生知道一点尹宽的作用的。

我自然不能补叙尹宽在芜湖这一段生活,我想后人可能找到史料。我只说,在法国,安徽学生都是把尹宽看作领导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后骂他或说他坏话。唯有李慰农一人始终跟着他走。在法国,尹宽还领导全体安徽学生,争取安徽省军阀政权拨款救济本省学生,所以安徽学生的经济情况比四川、湖南学生好些。

尹宽怎样参加了蒙达尼派的呢?蒙达尼派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安徽人怎样会加入其中呢?以前我没有去弄清楚这个问题。1956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蓝桥大监狱,关在一个囚室,谈话间想起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他告诉了我如下的情节。

他同蒙达尼派早有来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蒙达尼派很看重他这个人,蔡和森特意派欧阳泽(字玉生)从蒙达尼到墨兰来,住在尹宽家中,天天同尹宽讨论问题,最后说服了尹宽。这就是说,尹宽由此从复杂的混乱的思想走到马克

思主义来。

经他一说,我想起了1921年我搬到墨兰那个小公寓自炊自学时几次在尹宽家中看见一个湖南青年,叫做欧阳玉生的,介绍之后他也同我谈思想问题,谈人生观,谈一般的哲学。至今我还保留着如下的印象:这个人很有学问。当时,我对于哲学发生了兴趣,找中国杂志来看,同时也找法文书来看。我在中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笛卡儿;我在法文书中看到有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Descartes。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这两个人名联系起来。欧阳玉生同我谈笛卡儿,我知道,我也能够同他谈,可是一次他说了笛卡儿,接着就用法文注释“德斯卡特斯”,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笛卡儿就是Descartes。欧阳玉生同我一样读错了法国字。Descartes不应当读为“德斯卡特斯”,应当读为笛卡儿或德卡尔。但由此我承认欧阳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发表的《贺果日记》,我还可以确定欧阳玉生到墨兰来去的具体日期,贺果日记见《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由此可以看到1920年12月27日至31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开大会(第一次大会),贺果从商巴尼(Champagne)来蒙达尼,会毕,1921年1月2日回去。这日的日记说:“上午八时偕寿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车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转郎西去;有欧阳君玉生往木兰去。……”木兰即墨兰。这就是说:欧阳玉生是工学世界社大会后决定派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的。1921年2月23日日记说:“早五时十八分附车赴巴里,与驻巴代表谈话一切,商及直



接行动办法。下午偕尹君赴木兰，晚宿尹君寓所。”巴里即巴黎。这就是说：尹宽也参加了“二八运动”，也是一个领导人，事前五日亲自去巴黎，同蒙达尼派的人商议行动计划，当日便同贺果回墨兰，留贺果住在自己家里。贺果来墨兰是有作用的。2月24日日记说：“上午木兰公学同学会商，结果赞成直接行动，签名的十二人。下午偕欧阳君来商巴尼，和笙已自蒙达尼归，晚印公启五十份，明早即发。”和笙就是李维汉，他当时也住在商巴尼。那次，商巴尼的学生派贺果去巴黎，派李维汉去蒙达尼，派另一个人去枫丹白露。贺果由巴黎再到墨兰去动员。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欧阳玉生做尹宽工作已经成功了，2月24日离开墨兰回商巴尼去。欧阳玉生在墨兰共住了53日。2月28日，尹宽无疑去参加了包围公使馆这个直接行动。

发生这一切时，我都住在墨兰，但事后才知道这个运动，尹宽事前毫未告诉我。这是奇怪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勤工俭学生，此外我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尹宽给我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看，当是二八运动以后的事情。

参加工学世界社，是尹宽生平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一般的民主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

我一向认为工学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领导的一个组织，服从蔡和森的一切指挥的。近年看见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没有我设想的那么简单。蔡和森领导的，只是总部设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组织。在湖南，蔡和森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领袖，两人思想相近。蔡和森率领一部分会

员来保定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期间，思想进步了，研究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他带了妹妹和母亲一起来到法国，始终住在蒙达尼，似乎未曾离开那里的中学。向警予住在那里的女子中学。法国的中学是男女分开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响之下不久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了。他们二人结婚时发表了一个《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达尼中学更加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人道报》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书。他学习、谈话、工作，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人说，他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这话自然是夸大的了。后来，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妇相处几个月，发现他虽不修边幅，却没有到传闻的那种地步。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

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他认为蔡和森在国内是墨翟主义者，初到法国时，也在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之间探索，直至1920年法国社会党都尔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改名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而排斥其他社会主义学说。

工学世界社不过是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一部分人的组织，是以李维汉为领袖的，这些人仍旧是新民学会会员，仍旧受国内毛泽东，国外蔡和森的领导。他们组织这个新团体，不是要代替新民学会，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为了互相帮助，如交换书报，储蓄救济之类。成员不限于新民学会会员，更不限于湖南籍学生。用现在的话说，那不过是新民学会的一个“外围团体”。1920年7月间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

尼开大会，工学世界社中属于新民学会的人自然参加，不属于新民学会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学世界社的人可以说都参加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人不见得都参加工学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亲近的几个人就未曾参加工学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大会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应邀参加。蔡和森为甚么不加入工学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对“工学”二字。蔡和森早已认为“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所以1921年7月间开第二次大会时就提出改变“工学世界社”名称的问题。贺果日记说，一部分人主张改名，因为原名“名不副实”；另一部分人则注重实际，认为不必改名。双方人数相等，就不改名了。这是表示，此时工学世界社事实上已经抛弃“工学主义”了。

我们外面的人只知道蒙达尼的组织就是工学世界社，不知道有这些曲折。1922年6月间我们筹备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时，李维汉关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问你去巴黎做甚么，你就回答说：去参加工学世界社的年会。”尹宽参加的，可见也是工学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学会。而且，据我研究，尹宽是在1921年7月间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时才正式参加的。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把尹宽姓名列入1920年年底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出席者之内，恐怕是误记的。事实是第一次年会以后，欧阳玉生才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会上，据贺果日记有14个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会上发言，尹宽当在此14个人之中。但因从二八运动前后起尹宽便同蒙达尼派站在一起了，无论是另一派，无论是群众都把尹宽算入蒙达尼派，而且算入蒙达尼派

的头头。

我看到1983年8月发表的尹宽一篇回忆文章,关于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的。这是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所记有许多不合事实,但也有许多是可信的,可以补充和证实我这里所说的。

尹宽论蔡和森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是蔡和森。蔡和森这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因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是无产阶级专政,除开会外终日抱着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他还做‘特运’工作,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蔡和森在法国最初所团结的团体,就是‘工学世界社’。顾名思义,可以知道这个团体还是受五四运动及‘工读互助团’之频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据说它的基础还是五四运动时湖南师范里所成立的新民学会,不待说它的成员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后才掺进我这个忘记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宽也不清楚“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之间曲折的关系。)

尹宽说他怎样被欧阳泽说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我在来法国的轮船上认识一个湖南人欧阳泽(又名玉生),并且成为至交。一天,他从蒙尔公学转来木兰(按:即墨兰)找我……他就依靠我过生活,住在一个狭小的阁楼上,每日买面包,煮汤,如是一个多月,谈话间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李维汉等友人委托,特来做说客的。不过,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他仰慕尼采的超人主义,当时所研究的是柏格森的创化论,他的书包里就夹着一大

本柏格森创化论原本。但他不向我宣传创化论，只向我宣传蔡和森的革命。他说：未来的革命的领袖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传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说：他自己将来不愿意参加革命，却愿意从旁赞助。很显然，他把革命运动当作俗事，而他自己乃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说动了，竟被他拉到蒙达尔去见蔡和森、李维汉，以及工学世界社的一些社员。不知怎的，我后来也就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从此我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我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我开始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党宣言》，解放后经过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这是否叫做‘人牵着不走，鬼牵着乱跑’呢？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当时摆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唯独欧阳泽来一说，我就听从了，归根结蒂，还不是甚么人走甚么路吗？”

我本来听说，蒙达尼派有四个头头：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蔡和森又是头头中的头头，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他自己不在群众面前露面，李维汉、汪泽楷等人向群众说的就是他的话。现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后才知不然。新民学会会员虽初到法国时思想是复杂而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工学主义，占了上风。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其他会员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上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大抵可这样说：蒙达尼派夺取勤工俭学群众运动领导权的过程，同时就是蔡和森统一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思想的过程。从贺果日记可以看到蒙达尼派第二个头头李维汉，思想上同蔡和森距离很远。蔡和

森早已克服工学主义了，李维汉另组织一个团体仍以“工学”为名（“工学励进社”，后改“工学世界社”）。1920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年会时，“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定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可是，第二天，李维汉谈话则“主张无政府主义，从个性出发，主张社会〔应〕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李维汉的无政府主义不知何时才放弃而接受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我想经过二八运动之后，到了1921年7月下旬开第二次年会时，工学世界社的思想当然得到统一了。

据尹宽解放前某次闲谈时告诉我说，李维汉在思想转变期间，曾发表一种议论，认为社会的动力是“为己主义”。尹宽说这话当然是为了反对李维汉。其实，尹宽不知道，这不是李维汉的发明，而是近代哲学中有一派这样说。为己主义并非自私自利之意，我们古代的杨朱毕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废的。此外，当时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存有这种思想的，决非李维汉一人。贺果一条日记就说他们讨论欧阳玉生提出的人生观问题时，一致的结论是：“人的意义就在于生，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应当说一说蒙达尼派的对立面，另一派的情况。这派一个头头李隆郅写了回忆。他说，他到法国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欧周刊》，登载出来了。文章大意是拥护勤工俭学，希望国内贫苦学生更多来法国勤工俭学，而反对当时出现的“勤工俭学不可能”的论调。赵世炎看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作者表示同意并要求见面。从此李赵二人结成一个核心，不

久吸收了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若等共七八人，组成一个“劳动学会”，他们反对“请愿”，不参加二八包围公使馆的运动。运动失败后，群众更多拥护他们。他们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学会”，以原来的“劳动学会”为“领导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按：这话是夸大的。）“若飞、延年、乔年同志等都参加了。”（按：王若飞确实参加了，但陈延年、乔年兄弟曾否参加，还须查考。）

据我所知，组成另一派的勤工俭学生各省人都有，不似“蒙达尼派”以湖南人为主体的。大体可以说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学会系统的湖南人，跟随黄齐生来法国的贵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组成的。贵州人在其中活跃的人物，除王若飞之外还有熊志南。黄齐生自己没有参加，他不是勤工俭学生。这一批贵州学生，我找到了踪迹，是1919年11月22日从上海坐英国轮船勒苏士号出发的，先到英国，再由英国转来法国。我们有中国乘客的全体名单，共40人，其中贵州籍11人，有3人不是黄齐生系统的。属于黄齐生系统的8人，名单如下：黄齐生、汪颂鲁、刘方岳、熊铭青、熊瑾、冉蕴明、胡礼同、熊志南。这名单中没有王若飞，也没有我知道的另几个贵州人，他们大概是另坐一船来法国的。我在汪颂鲁住所看见他的许多同乡，他们在勤工俭学生内部斗争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二八运动”失败后，两派各自采取多种多样方式发展自己的力量。1921年初夏某一天，汪颂鲁来找我，说有几个朋友提议组织一个“通信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或别的

类此名称,我记不清楚),办法是:参加的人把身边的书开一张目录,然后汇齐印成总目录,发给各人,书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处可借等等。他们邀汪颂鲁参加,并托汪颂鲁邀我参加,参加者可于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庐(Saint-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开一个成立会。散客庐是巴黎一个名胜地,在丘陵上,有拿破仑离宫,普法战争时被普鲁士人焚毁,美丽的花园还在。我没有去过。熊志南的寓所就设在山坡上,他替一个瓷器厂画瓷坯,每月工资相当多。熊志南曾在圣日尔曼中学补习法文,我常常见面,但未曾谈过话。我知道,他在勤工俭学生中属于另一派,反对蒙达尼派的。汪颂鲁说,他自己决定参加了。他劝我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卷入斗争漩涡,但考虑到要成立的团体,不过是互相借书看,既不参加行动,也不讨论思想,同这一派人往来也不会有什么問題,就答应那日到散客庐去了。汪颂鲁也约尹宽一道去。尹宽属于蒙达尼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颂鲁大概是虚邀一声,明知尹宽不会去的。谁知出人意外,尹宽答应去了。

到了约定的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墨兰到巴黎去。熊志南热情迎接我们,房里收拾得干净,案头放着未画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阳光灿烂,天气并不热。在那里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见面的,有王若飞、赵世炎,无名(陈公培),还有两三个其他的人。有两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还不会忘记。一件,在开会前,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闲步。赵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说话,尹宽走上前去,问道:“你是赵世炎吗?”问了两次,赵世炎都没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还是没有听到呢?我至今还不能确定。据李隆郅说,他们那一派于“二八



运动”后曾派赵世炎去蒙达尼同蔡和森谈了三天的话。不知在此以前以后？即令在此以前，蔡和森会见了赵世炎，尹宽也不见得会见了赵世炎。恐怕在二八前后的群众运动中尹宽也没有机会同赵世炎会面。另一件则发生于开会以后。开会，讨论名称、章程、推举办事人，及其他事情，我都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我自己也发了言，而且同王若飞争论了什么事情。尹宽一句话没有说，会开完了，他才站起来说：他今天是来旁听的，这话大出我意外，我只记得，会上只无名一个人有反应，好像是用讽刺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们知道了。”

散客庐开会那日，李隆邳没有出场。这个会以及成立的“通信图书馆”，显然是一种活动，藉此发展影响和组织的。团体成立了，我把身边的书抄了一份目录寄去，不久收到全体成员的名单和总书目。成员中有李隆邳、熊雄、林祖烈等，自然有那日到会的人，尹宽不在内，蒙达尼派都不在内。我也曾向别人借书看。别人也曾向我借书看，这个通信图书馆还是有生命的，可是这生命太短促了。图书馆成立不久，勤工俭学生中的两派就合作发起一个更大的群众运动，即准备占领里昂大学。尹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里昂大学运动的经过记载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费笔墨，我只说尹宽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1960年11月6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访问羁押在那里的尹宽，搜集有关赵世炎传记的资料。尹宽自己说：他在那次运动中是参加占领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兵营内，吴稚晖到法国后，要被押学生推出代表同他谈判，尹宽就是被推举的4个代表之

一，他们面对面同吴稚晖辩论；谈判失败后，代表复回兵营；回到门口，里面的学生叫尹宽不要进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陈篆办交涉；他到巴黎后不久，100多学生就被驱逐回国了。

尹宽这个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细节方面有不合事实之处。被关押的学生确实同吴稚晖当面辩论过，李立三的回忆也这样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这个运动，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记得十月间尹宽在墨兰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到那批学生被驱逐回国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间听到的，也不是在尹宽的房间听到的；当时我和尹宽都在小公寓三楼一个大房间内，那里住的也是一个安徽学生，英文很好。他主张打电报去里昂或巴黎证实这个消息。电报简单写“expulsion？”尹宽并未接受这个建议。这个细节和尹宽的回忆并不矛盾。可以设想，尹宽从里昂回到巴黎，看见无事可做，便回墨兰来了，在墨兰听到了驱逐回国的消息，当时勤工俭学生有10个人留守巴黎，做后援工作，据今人考证，此10人中有李维汉、汪泽楷、萧子暉、王若飞、方敦元等，赵世炎、尹宽二人则是从里昂兵营内逃出来的。

里大运动并未表明蒙达尼派和另一派（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之间思想已趋于统一。两派之间不过是联合行动而已，思想上并未统一。运动失败以后，两派仍旧分开，各干各的。蒙达尼派残存的人仍旧回到蒙达尼，李维汉成为这一派最高领导人，他此时大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残存的人则分散各地。熊志南发疯了，赵世炎去北方县做苦工，其余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联系。

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里大运动前后，中国共

产党在西欧有没有组织？换一句话说，1921年7月以前法国是否已有“共产主义小组”存在，只因路远才不能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建党大会？党史界经常争论这个问题。

当事人张崧年的回忆是不能作准的。据他说，1920年8月间，上海、北京两地开始建党；上海有以陈独秀为首的几个人，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他二人；他11月间乘船去法国，应聘作未来的里大教授，1921年初住在巴黎，当时刘清扬和周恩来也在巴黎，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后二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约在1921年二三月间。不久之后，赵世炎和陈公培也来法国，于是原来三个党员连同新来两个党员共五人成立一个小组。张崧年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我们没有以小组的名义领导活动，小组同这三次斗争没有关系。”（以上张崧年的话出于他的两篇访问记：《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张崧年这两篇访问记有许多失实之处，关于中共旅欧的组织的成立，其时间和人数，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赵世炎是1920年5月9日离上海，6月15日抵马赛的，陈公培是同年6月25日离上海，8月4日抵马赛的（按：赵陈二人离上海时陈独秀尚未在上海建党），周恩来是同年11月7日离上海，12月13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和刘清扬二人是11月24日离上海，12月27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到法国后即介绍刘清扬入党，二三月间二人再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了，便同他们三人结成一个“小组”，于是在1921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

组”，——就时间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就当时的斗争情况看，1921年上半年，甚至里大运动以前，看不出共产党小组存在的迹象，我认为“小组”正式成立，至少赵世炎同“小组”发生联系，是里大运动失败以后的事情。除张崧年老年回忆不可靠之外，我们发现“小组”活动，最早的证据是李维汉的回忆。他说：“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此时，周恩来尚未去柏林，赵世炎尚未去北方县，他们才能约李维汉从蒙达尼来巴黎会面。赵世炎是1921年底去北方县的，可见此次会面是1921年底的事，即里大运动失败后一个多月的事。从此以后“小组”活动的证据就多起来了。我们有周恩来1922年3月给“山妹”（邓颖超？）的信，又有赵世炎同年4月给李隆郅和无名的信。惟有这样才能说明：在1921年的“三次斗争”（另一次是反对朱启铃来法借款事）中，“共产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为什么表现得远逊于非共产党员的蒙达尼派。

尹宽参加了里大斗争，侥幸未被关押而驱逐回国。此时，他和蒙达尼派别的头头都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同他比较起来，我当时确实是落后的。我虽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学说，同别的学说一般的地位。我那时还一心想考进大学，没有疏忽考试的准备。我不需要去工厂做工，因为即使家里没有钱寄来，县公署每年还可以给我300元官费，我仍然可以维持自学的生活的。

可是,1921年底,我的如意算盘都打破了,不仅家里没有钱寄来,连300元官费也被破了产的父亲领来作为家用。

这个时候汪颂鲁也陷于与我相同的命运。我们身边的钱都剩下不多了。里昂大学从国内招来的学生中有3个是汪颂鲁的同乡、朋友。汪颂鲁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当时出现一种传说,里昂大学准备通过考试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学生,而且学膳宿等费用可以拖欠,候国内寄钱来偿还的。汪颂鲁和我于是从墨兰迁居里昂,交涉这件事情。两个福建学生也同我们一起迁去。

谁知这传说不符合事实。确实有几个勤工俭学生进里大上课的,但那是“走后门”进去的,我们没有后门可走。我们在学校院子内看到了校长吴稚晖,于是走上去向他提出要求。他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拒绝了。我们进退两难。一天,汪颂鲁提议:找褚民谊去!我和两个福建同乡跟着他去。我们以为是去交涉入党事情的。但见面时,汪颂鲁直接叫褚民谊负责我们几个人的生活,即叫他拿出钱来给我们,这话大出我们意外。我们三个福建学生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汪颂鲁和褚民谊吵起来,双方拍桌子大骂。学校办事的人出来劝解,把褚民谊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了,汪颂鲁才同我们回去。这事情近于无赖,我们都不满意汪颂鲁,尤其不满意他事先不同我们商量。

里昂大学进不去,我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家里何时寄钱来没有准信,不能长久依靠向同乡学生借钱过生活。怎么办?此时我第一次考虑进工厂做工的办法。汪颂鲁自己不考虑这个办法,但代我筹划。我们发现蒙达尼郊外的橡胶工

厂还能接受中国学生去做工。我们在圣日尔曼中学认识的四川人秦治谷正在那里做工,于是我写信给秦治谷,得到回信后便一个人带着轻便行李从里昂乘火车去蒙达尼了。

如此结束了我的“俭学”生活而开始我的“勤工”生活。这是 1922 年 2 月间的事。

# 追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 几个问题

毛 齐 华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主楼上有几个立体型的俄文是“孙逸仙大学”，但是中国人都习惯地称它为“中山大学”。下面我想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分几个问题谈谈这个学校的内部斗争情况。

## 一、“中大”支部局的概况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从汉口到了上海，被组织上作为最后一批学员派到苏联去学习（1928 年又派了一些人去）。我们到莫斯科的时间大约是 1927 年 11 月中旬。我们一到学校，每人发一张早已写好的用俄文名字登记、编好学生号码的卡（我是 743 号）和一张表格。让我们再登记自己的中文名字和简历，校方初步了解情况后，就给我们编了班，很快就正式上课了。

我们这个班大概有 30 几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学生，少数是大学生），只有五六个工人。我是个印刷工人，只有初小毕业，因此听到学校里讲的那些课程，如社

会形态发展史、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员……等等，都觉得很新鲜，很感兴趣。我就拼命地学功课，对学校里其他的活动都不大过问。

没想到，1928年春天改选支部局（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校党委）的时候，学校方面竟提名选举我为支部局的委员。我估计大概是因为学校的老师们觉得我学习用功，又是工人出身，在国内时曾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接受过罗亦农、汪寿华等同志直接的党内训练教育……，所以给学校和老师们的印象比较好。

我们到校时校长是米夫（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职的），他很少来校。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库秋莫夫处理。

我们这一届支部局的书记叫皮尔曼，也是上届支部局书记（据说在他之前还有位第一任的书记）。这个人很能干，有水平，看问题很尖锐，和一般同志的关系也比较好；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尊心太强，听不得有不同的意见。组织部长伊格那托夫兼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是个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人忠厚稳重，组织纪律性很强。宣传部长我接触很少，这个人主观性很强，讲起话来总喜欢批评别人。书记和部长都是苏联人，支部局委员中有个二年级的学生，叫李竹声，他分工参加宣传部的工作。我分工是参加组织部工作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除了部长和我以外，经常在一起碰头开会研究工作的还有几个干事：一个叫方廷楨（方仲如），一个是陈修良（陈逸），还有一个是博古（秦邦宪），他分工管青年团的工作。还有一个叫蒋德芳，也是工人出身，一年级学生，他是“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联合会）的主任，主要负责



学校方面同中国学生之间的联系,向校方反映学生对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要求。支部局的翻译是张琴秋(沈泽民的爱人)。还有一个苏联女同志当秘书,管文件和开会时做记录,她不是党员,是共青团员。另外,还有一个二年级的中国学生叫苏美益,开始时当选为支部局的委员,但不久就回国了。

1928年春天,赤色职工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领导上指示我们中国学生派两个工人去列席大会,一个叫汪沛贞,原先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是我。出席职工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向忠发、苏兆征等,翻译是冀朝鼎。汪寿华牺牲后继任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的郑复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在会上被提名为赤色职工国际的委员。

## 二、1928年的几场风波

1928年这一年,总的说来还比较平静。但是,也有些不同意见的反映和争论:

第一件事是,有少数人在散布托派的观点,他们除了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外,又讲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说由于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已不是主要的革命任务,今后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和平发展时期,等中国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以后,再进行“直接革命”……。他们还讲苏联现在是斯大林独裁专政,列宁逝世前怎样批判过斯大林。后来,联共

中央开会，公开批判托派言论，学校开会组织讨论，这些言论都受了批判。

第二件事是，“旅莫支部”受批判的事。这事我们原来不了解，有次听卜士奇（他是去苏联最早的人之一）说：原先侨居法国的同志有个中共旅法支部，后来有部分人到了莫斯科，就建立了“旅莫支部”，支部书记是任卓宣（即叶青），这个人独断独行，对支部内部控制很严，旅莫支部在苏联公开活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开始也没有人注意和重视它，后来因为内部统治太严，有人表示不满，就向领导上反映了。共产国际了解此事后，认为这是违反国际章程的错误做法，宣布予以取消。这事可能发生在1926年的夏天，我们去时早已不存在了。

第三件事是，“江浙同乡会”问题。学校里有一部分中国同志俄文较好，兼任翻译工作，有顾谷宜、董亦湘、俞秀松等，他们因为平时吃饭都由公家供给，而做翻译工作每个月还有100到200卢布的工资收入，有了钞票就经常请一些熟悉的同志吃饭，你来我往又说又笑，很热闹。苏联同志搞不清楚，这些人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的，不知他们在干些什么。有一次别的中国同学开他们的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江浙同乡会”（因为他们之中不少是江浙一带的人，但也有其他地方的人），“江浙同乡会”的称呼就这样传开来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苏联同志听说有个“江浙同乡会”，也没有调查清楚，就认为是“封建性的组织”，并进行了批判。中共代表团向忠发有次来校向中国学生作报告，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作了很严厉的批判。后来，又被王

明等人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借以整人。

第四件事是，所谓“先锋主义”问题。大约 1927 年到 1928 年这段时间，“中大”青年团支部局的书记叫西门宗华，这个人俄文翻译很不错，但是说话不慎重，爱放大炮，也不听从党的支部局的领导，因此被叫做“先锋主义”受到批判。

在 1928 年的时候，除了托派的问题以外，对于后面三件事虽然都进行了批判，但还不是当作敌我矛盾对待和处理的。即使对于托派问题，也没有后来那样严厉，但是因为这几次批判的调子都很“左”，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有被批判过的人都不很服气，对学校领导有不满情绪，这就为 1929 年学校内部的激烈斗争埋下了种子。

### 三、斗争激烈的 1929 年

1929 年学校内部斗争激烈起来，形成两派，开始并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而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有分歧和不满情绪，学校领导没有处理好，逐步积累起来，最后总爆发了。记得有这样一些事：

第一件事是，1928 年夏天，从中国又派了一批新的学生去“中大”学习。他们之中很多人是穿了长袍出发的，到了莫斯科就要换穿列宁装式的制服，但是学校量过身材尺寸之后很久，制服还没有发下去，中国同志就产生了不满情绪。苏联当时正在准备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集中全力发展重工业，市场上衣料等生活消费资料的供应很紧张，

学校行政部门因为买不到做制服的衣料，所以只好老是说“等一等”，但是又不向中国学生说明真实情况。后来，只好先给新来的学生发白布衬衣。因为俄国人的身材一般都比中国人高大，所以发下来的衬衣中国学生穿起来太肥大，很不合身，结果又招致很多人的不满。还有苏联是不用痰盂的，中国学生提出要求教室里发些痰盂，学校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能解决，也引起不满。再有就是吃饭的问题，当时苏联经济困难，食品供应很紧张。但有些中国同志不体谅他们的困难，少数人很不自觉，把面包皮扔在食堂的桌子上，这样糟蹋浪费粮食，不少同学见了很生气，就当面批评他们，经常在食堂里吵闹起来。苏联同志听不懂他们在闹些什么，就问中国翻译：什么事？翻译说他们这些人是无原则的瞎胡闹……苏联同志听说后，就批判这些中国学生是“无政府主义”，而中国学生则批评苏联校方领导是官僚主义，这样，一部分中国学生和学校领导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了。

第二件事是，对苏联教师讲课有意见。中国同学要求讲课能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个要求是对的；但实行起来苏联的教员也有他们的难处，因为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毕竟不如中国学生熟悉。还有就是教员讲课的内容，学生要求早些发下讲义来，但是，因为要翻译成中文，再在玻璃板上用药水一个个写后，用纸油印，发下来至少要隔三四天时间，大家很有意见，而学校领导上也没有把原因很好地向大家讲清楚。讲课的苏联教授中，大部分兼好几个学校的课，每天跑来跑去，还要备课，所以同中国学生没有什么接触，师生之间从学习上到生活上都很隔膜，对学生的思想情

况很不了解。

第三件事是，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引起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当讨论到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时，有的人生搬硬套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况，引起了“一个政权”还是“两个政权”的争论。讨论农民问题和反封建斗争时，有人认为不能笼统地提农民是一个阶级，农民中有贫农、中农、富农之分，而富农应与地主同列为革命的对象，不能列入农民阶级之中。在对持不同意见者的争论中，给对方乱扣“富农路线”的帽子。这些争论后来一直发展，变成了一部分中国翻译和校方的主要苏联领导人，同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中国同学之间的尖锐对立。因为在争论中，少数中国翻译如博古、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经常向学校领导人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而领导和他们平时接触得多，很信任，就支持他们，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人习惯上提“布尔什维克”意思是多数派、“正确”的）；持不同观点的一部分中国同志，就表示不满，讽刺他们是“马屁鬼”、学校领导的“尾巴”。这中间有些问题是无原则的纠纷，有些问题是看法和观点上的分歧，而博古等人仗着有学校领导的支持，就给对方乱扣什么“无政府主义”、“托派观点”、“对中国革命失败情绪的反映”等政治帽子，使双方越来越形成尖锐的对立情绪。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怎么干？回去看！》，意思是说博古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看回国以后的实际表现。

由于双方越来越对立，导致学校领导同一部分中国学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和紧张。副校长库秋莫夫看到

这种情况不对头，就在四楼大教室里召集一部分反对博古、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的学生谈话（也包括有一部分后来进校学习的学生），副校长谈了学校教学情况后，提问：你们有些人为什么要反对他们？这些中国学生就说：“他们这几个人在国内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在同学中威信也不高，仗着学校领导的支持当翻译，拿的钱多，神气活现，特殊化，脱离群众，领导上为什么这样信任他们？”库秋莫夫做了一些解释说：“他们这几个人学习很认真，都是有理论水平的（那时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都考进了红色教授学院），我们领导上就是要培养他们，你们应该支持他们嘛！”这样做工作的结果，没能说服学生，反而引起更大的反感。发展到后来，学校内部就出现了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博古等人为代表的拥护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路线”，认为学校支部局在第三国际、联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条则是虽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但在反对支部局领导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的一部分中国同学的“路线”，认为学校支部局领导实际工作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那时候，双方都很极端化地强调：或者对或者不对，或者支持或者反对，不容许有第三种意见和态度。例如有些同志一方面认为学校支部局领导上是有缺点错误，但不能全盘否定；也有人认为，对立的双方都有缺点错误，不能说哪一方就是完全正确或错误的……但这些意见却又被称为“调和路线”，而同时受到争论双方的指责攻击。

有人说，当时在“中大”的600个中国学生中，只有28个人拥护博古他们的“支部局路线”；也有人说，支部局讨论

青年团工作时，只有 28 票拥护支部局。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在我们那个班里，双方就是 17 比 17，各占一半，势均力敌。斗争非常紧张，争论某一个问题时，如果一方有人缺席，就少了一票，影响“大局”。有的班里是支持支部局领导的人占多数，少数人反对，但表面上不敢公开讲话表示反对，如翻译班和陈昌浩、殷鉴等那个第一班，就是这样。也有的班情况正好相反。但不论哪种情况，实际上双方出来讲话的人数都很少，多数人只是跟着跑、举举手而已。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到“中大”来。代表团成员邓中夏同志很好，他看到“中大”内部派性斗争这样激烈，就来找学校领导谈话，讲他所听到的中国同学中的各种反映，并且建议领导上认真地考虑群众的意见，努力做好调解工作。那次谈话我也参加了。但是，当时学校支部局的领导同志不接受邓中夏同志的建议，认为他是在搞“调和”、“折衷”。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经常来学校到“中国问题研究所”，看该所保管的国内送来的文件，我也经常在所里看文件碰到他们。瞿秋白同志的思想和态度基本上也是好的，不过我经常听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后说他也是“调和路线”。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张国焘、余飞有时也来学校到“中国问题研究所”看文件，有不少对学校领导不满意的同志经常去代表团住址找张、余反映学校情况和自己意见。

#### 四、“十天大会”

1929 年夏天快放暑假时，学校召开有全体师生参加的

教务会议(实际上苏联教师都不参加,只有中国教师、翻译和学员参加),总结本学期教务计划的执行情况,并讨论下学期的教务计划。新校长范盖尔在大会上宣布会议目的和内容,并且根据支部局的意见提出组成大会主席团的候选名单(大约是7个人)。接着,就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有没有人提出另外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候选名单?不料,这时有一个名叫蒋先启(他是“东大”并来的)的中国学生,立即站起来说:“有,我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接着就从身边掏出一个小本子,念了7个人的姓名,校长只好宣布对两个不同的候选人名单付诸表决。这时蒋先启说,按照程序应该是后提的名单先付表决;校长说应该先表决支部局先提出的名单,但蒋坚持一定要先表决他提出的名单,并得到台下不少人的支持。校长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先表决蒋先启提出的名单,结果被会上的大多数人表决同意通过。这样,支部局原先提的名单没有付表决就已经落选了。被选上台组成主席团的成员,除校长外,都是些反对支部局的人,我记得有余涂山(是湖北的一个工人同志,俄文名字叫范列考夫)、李剑如(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工人同志,俄文名字叫阿拉琴)等。于是,整个会议基本上就是在反支部局几个人的控制下进行的。

选举主席团后,听取学校教务工作报告,下午分班组讨论。第二天是大会发言,会议中间有一个人上台发言说:学校的这个教务计划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示根本上要反对。他这样一讲,引起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一部分拥护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人,就当场起来发言,责问他,



要他具体讲在哪些方面是非马列主义的？反对他的发言内容。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校长范盖尔马上用笔写了一张纸条，说“某某人说我们学校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要求作为大会决议立即付诸表决，结果多数人不同意，没有被通过。校长又修改这个提案的用词，说“要是有人说我们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是不对的”。结果还是通不过。第三次又修改为“假使有人说……这是不正确的”，最后还是没有通过。这样，会议原定的议程全被打乱，许多人都在大会上发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有人避免争论这个问题，发表其他内容的意见，有的就公开批评支部局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在发言争论中，有些人就逐渐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同时也批判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反映对生活问题上的一些意见。这样一来，发言的人更多了，其中也有些是夹杂一些个人之间的意气以至攻击。

这次“十天大会”学校领导上没有做什么明确的结论（因为反对者占多数），就不了了之了。

## 五、清党与反支部局派的急剧分化

新学期还没有开课，我同方廷楨同志商量，认为学校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学校领导确实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找杨尚昆同志，要他帮助我们翻译，一起去找书记伊格那托夫，建议学校领导应主动承认并改正官僚主义的错误，做好同学的思想工作，争

取和团结大多数。伊格那托夫虽然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并没有看到他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另外，我们又以个人身分找一些同志个别谈话。有一次，我和方一起找赵言轻（俄文名字叫唐伯索夫，是冯玉祥那边西北军部队里派来的人）谈话，赵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就对他说：你（指赵）如果同意，那末我们各自写一篇文章，把自己观点写出来，在墙报上发表。第二天，三个人的文章拿来互相交换看。我们的文章赵看后都同意，而赵的文章，我们看过后，觉得观点不明确，希望他修改以后再发表。可是过了两天，我俩文章交去墙报上发表了，但他的文章一直没有交来。有一个晚上，赵言轻对方说：我参加了托派组织，是学校里托派组织最高委员会三人团的领导成员之一；后来因为我对托派有些不同意见，不能获得信任，因此被撤销了最高委员会成员的职务。赵言轻还说，学校的“十天大会”为什么会闹得这样厉害呢？这是托派利用不同意见的分歧和对立情绪，进行挑拨，煽风点火，故意制造混乱。不过究竟怎样闹法，托派内部意见也是有分歧的。关于这件事，第二天我们就秘密向伊克那托夫作了汇报。伊克那托夫当天上午就直接向联共中央作了汇报。他回来说，联共中央当即有两条指示：（1）此事必须绝对严守秘密，千万不要讲出去；（2）找个安全的地方，要唐伯索夫把托派组织和活动情况全部写成书面材料。赵言轻写完书面交待材料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就在宿舍壁炉里的铁条上用皮带上吊自杀了。这在全校教学员工中震动很大，但领导上没有宣布此事。

这时，学校领导布置进行清党。清党委员会是由上级派来的，大约由10个人组成。分成3个组，每个组负责清查五六个班级，搞人人过关。清查时，3个委员坐在铺着红布的桌子前，受清查的人被点到名后就走上前去，像受审判一样站在他们对面，其他的同学都坐在两边旁听。受清查的人自己要先报告姓名、年龄、出身成分，过去干过什么事等履历；接着就是回答委员们的提问。一般地说，对工人出身的同志审查提问比较松，对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审查得就很严，提出许多问题要你答复，包括历史问题、社会关系、政治观点，还有在学校里参加什么活动和斗争、抱什么态度……等等。比较着重审查阶级成分、社会关系、平时表现和参加什么组织活动，对思想观点问题也查问，但是问得不多。回答问题时，有的人讲，有的人不讲，当场顶起来，时间就拖得很长。所以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审查通过好几个人，有时候一个晚上只能审查一个，审查最后的组织结论究竟怎么样，后来也没有宣布过。

在清党过程中，查到有个叫安福的人，是知识分子，他同托派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卞福林是同乡，清党委员早已掌握到他的材料，所以审查到他的时候，就要他交待参加组织的问题。等了很久，他坚持不说，在这种情况下，清党委员就在会上公开宣布说：“唐伯索夫（赵言轻）在死以前留下了一个交待材料，已经揭发了你们这个托派组织的人员名单，你是该组织里负责训练的委员。”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别的两个清党小组的人都赶到这个组的会场来围观。会场上有揭发的，有批判的，大家都议论起来，气氛十分紧张。学校领导

专门为此发出号召,要求凡参加托派组织的自觉起来向组织交代,并要大家进行揭发检举。但有一条规定,具体名单只能向组织上交代,不准对外公开。

这时,学校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积极反对学校领导的人很快分化了,有些人像余涂山、李剑如、刘子载、徐辉祖、柳步静等(他们并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沉默不响;有些原来积极参加反领导的,就转过来表示拥护学校支部局的领导,像江元清(印刷工人),宋三妹(纱厂工人),他们也不是托派,就主动找领导认错,并在大会上反戈一击,积极揭发反支部局派内部的活动问题。有些还涉及到中共代表团中某些人的问题。也有参加托派的人交代怎样利用一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乘机大肆活动……等等。结果,支持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人很快就从少数变成了绝对多数。

学校在清党过程中,对托派没有专门开会进行审查,只是在墙报上组织写文章揭露他们的问题,有些托派骨干分子,像贾重周、卞福林等人,被苏联保安人员秘密逮捕了。有些一般分子作了交代揭发,这些交代了问题的人和一般有些托派观点的人都没有被抓,对他们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学校仍然容许他们继续上课学习。党员们经过清党委员会审查研究,对认为有问题的人,分别不同情况,给予党内警告、留党察看等组织处分。但我没有看到统一公布于众。1929年冬天,学校清党工作就宣告结束了。

1930年初,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来调查“中大”的内部斗争情况和问题。组长吉尔萨诺娃(是个女同志)是联共中央委员、列宁学院院长。最后召开全

校大会,宣布调查组的结论:肯定了学校党的支部局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批评了支部局在日常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最大缺点是没有把大多数工人同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也指出和批评了反对支部局的人的错误。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两派严重对立和激烈斗争在思想上所遗留的影响和后果已无法消除了。

(叶炳南 整理)

## 50年代初赴苏学医

涂 通 今

1951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国家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医学研究生30名,每人一个专业,分配我学神经外科。神经外科研究生同其他专业研究生一样,入学前要在国内进行入学考试,入学后要在国外进行业务考核。在4年学习期间,要求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按规定要完成5—6个基本考试;最后要撰写一篇学位论文;并围绕论文的主要内容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这些我都按国内的要求和国外的计划完成,获得苏联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之后,根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转粟裕总长的指示,要我与钱信忠、潘世征3人在研究生毕业后,继续到列宁格勒学习军事医学半年,至1956年春结束在苏联全部学习任务回国。

1951年8月,我在南昌履行华中医学院兼院长职务,正忙于学院的扩建工作。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庭园内乘凉休息,忽然武汉中南军区卫生部胡登高政委来电话,他说:“根

据中南军区政治部转军委总干部部命令，调你到苏联学习，于8月10日前赶到北京参加出国考试。”胡政委希望我立即动身回部，商量出国后工作安排问题。接此电话后，我又惊又喜，喜则到苏联学习是自己多年的愿望；惊则事情来得这么快，工作和生活都来不及安排。院领导听此消息后也觉突然，经商量决定：明日通知有关各方，向省委、省政府和军区报告；明晚在院部举行便宴，以示欢送。接到命令后的第三天，我同王黎还有警卫员一行3人，从南昌乘火车到武汉，当即见到孙部长和胡政委，他们连夜召集部党委会，专门研究两位副部长出国后（张汝光去苏参观，我去苏学习）的工作安排，决定从省军区提升一位部长来本部担任副部长，准备调申涵同志任医学院院长，拟将王黎同志安排在药材仓库工作（未实现）。第二天，我向中南军区后勤首长告别，见到周纯全和杨志诚两位老部长。杨志诚部长一定要留我在他家吃晚饭，吩咐炊事员给我做湖南腊肉吃，专门送给我几十万元钱（相当于人民币250元左右），让我多准备一些御寒服装。当部长把事先准备好的钱捧给我手的时候，我心情十分激动，不禁流下了热泪。晚上，卫生部召开欢送大会，孙部长和胡政委都讲了话，表达了他们的依依不舍之情，并希望我早日学成回国。次日下午，孙部长和胡政委亲自带领各处长到车站送行，我和张汝光、何曼秋以及王黎同志心情很不安，因为孙部长年龄比我们都大，身体也比我们差，现在三位部长中有两人要走，开辟新区的许多繁重任务要他老人家承担，真有些于心不忍，但涉及中央整个布局，又有什么办法呢？

度过了一昼夜的列车生活，我们来到了北京。当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时，见到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侯震同志，他是一位老红军，是卫校四期同学，曾任二方面军卫生部长和军委卫生部医政科长。据说，这次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是贺诚部长亲自在抓，但具体工作由办公厅主管，因此，侯主任对我们特别照顾，亲自把我们接到东单安排在青年会宿舍歇息。

大概在8月7—8日，卫生部派车把我们接到后海本部，办公厅侯震、薛公绰和林士笑同志代表部首长向我们宣布任务，说部里当前紧迫的任务是安排30位同志出国学习，过两天就要在燕京大学举行入学考试，然后在那里集中做思想、组织、物质准备工作，准备在8月下旬动身赴苏，争取在9月1日前到达苏联各地学习。至于组织卫生代表团到苏联参观之事，拟在9月底安排（实际到1952年才去）。当我问起到苏联学习何种专业时，他们说：贺部长主张你学神经外科，过几日会给你发学习计划，贺部长还可能亲自找你谈。8月中旬的某天上午，卫生部把第一批派出的30名留学生集中到燕京大学考试，考试是由卫生部高教司主持，高教部派员监考，考题是有关战伤救治和疾病预防方面的题目，并不难。据后来所知，贺部长为了让一些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卫生干部能够顺利通过考试，事先还专门召集在京的一些知名专家、教授开座谈会，专门研究这些同志在部队工作多年，积累了医伤、防病的丰富经验，现在需要学习提高，但文化和医学基础理论较差的问题。这说明领导上对于老卫生干部关心。



考试完毕后,就把出国同学集中在燕京,进行出国教育,建立班组和进行物质准备工作。这次出国的30位医学研究生中,有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卫生干部。他们是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廖由洁、赵浩波、辛育龄、郭子恒、孙克顺、孙译之、王素孚、苏醒、华光、徐克、顾方舟、邹贤华、李合民、沈渔邨、张璿、徐迪、袁成业、唐素恩、梅正桐等。这些同志都是第一次出国,没有什么经验,大都没有学习过俄文。因此,卫生部、高教部和外交部负责同志专门给我们作报告,介绍苏联的社会情况和风俗习惯,强调中苏友好,强调努力学习,特别要学好俄文。在组织工作方面,把第一批出国的200名留学生统一组织起来,成立党总支,推举钱信忠同志为总支书记,我为总支委员,潘世征为医学生党支部书记,此外,行政上编成班、中队和大队。在物质准备方面,按国务院规定的使馆人员出国标准,从夏装到冬装,从衬衣到大衣全部换成新装,并派裁缝师傅给我们量体裁剪。在生活用品方面,连香皂、牙膏、牙刷、刮胡子刀等都样样俱全,为出国人员考虑得很周到。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只能随身带一部分,其余装成两大皮箱,托运到苏联。周总理为欢送出国学生,在老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为国争光。钱信忠、潘世征和我同总理坐在一席,倍感亲切。临别前贺诚部长专门设便宴招待几位红军干部,介绍他自己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切身体会,预祝我们学习成功。傅连璋部长当时住在弓弦胡同,我和潘世征专门去他家里告辞,他亲自介绍我们加入中华医学会,并当即填了人会申请登记表。在8月下旬的一天,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一行

200 多人,乘北京到莫斯科的专列从前门车站出发,到车站送行的有国家卫生部、高教部、外交部、军委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和总后卫生部的领导和留学生的许多亲朋好友,我们就在这样热烈欢送的气氛中,怀着祖国的重托踏上了征途。

## 二

列车抵莫斯科时,苏联高教部和中国驻苏大使馆许多官员在车站迎接。我们被接往莫斯科动力学院。8月底的星期天,按常规本是休息日,可是苏联高教部的一些同志主动放弃休息,在一位副部长的主持下按拟定方案分配留学生的学习单位。我被分到以布尔登科命名的神经外科研究所。

苏联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创立于1932年,是在全苏著名外科专家 Н. Н. Бурденко 领导下,在莫斯科放射诊断研究所神经外科基础上建立的。它集中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放射诊断、神经眼、耳科以及神经解剖、生理、病理等各科专家。研究所是综合性的研究单位,也是全苏联神经外科活动中心,成立了专门学会,于1937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神经外科问题》杂志。布氏是该学会的主席和这个杂志的主编。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布尔登科担任苏联红军总医师,创造性地在卫生勤务和野战外科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为保障战争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战后,他被政府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医学科学的院士头衔。1946年布尔登科因病逝世,研究所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1951年9月当我分配到该所时,研究所位于马雅柯夫

斯基广场和莫斯科木偶剧院附近的一座米黄色的大楼内，大楼正门的右侧在铁栏杆的小花园内，矗有布尔登科戴三星上将军衔的半身纪念铜像。所长是叶果洛夫，他身材魁梧，待人和善，知识渊博，具有外科医生的优良素质和学者风度，很受同行的爱戴和称赞，他和布氏一样，也是苏联神经外科权威专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全苏神经外科学会的主席和杂志的主编。1951年9月1日，当我第一次跨进研究所大门时，他的秘书很快把我引进到他的办公室，他立刻向前同我亲切握手，并用手势表示热烈欢迎，使人倍感亲切。不一会儿，秘书请他去参加早会，也把我带到会上介绍了一番。早会后，他又把我领回办公室，通过翻译询问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我除在国内担任的行政职务（如部长、院长）外，其余全部实说。因我是中共老党员，延安中国医大的毕业生，有十多年外科临床经验，并略懂英文和俄文，据此，他立刻作出决定，要我迅速掌握俄文；很快熟悉神经外科临床业务，暂且分配到肿瘤一科（即叶本人所在科）工作。第二天他又把我找去，口头测验我对颅脑火器伤的处理原则，他一再强调忌用探针探查脑深部的污染伤。接着他指定一位老讲师，领我到检查室为病人进行腰椎穿刺，我的操作技术得到讲师和病人的好评。当日下午我又到手术室熟悉手术器械，入所第三天开始上手术台，为叶果洛夫教授做垂体腺瘤切除术的第二助手，这种实习进度对外国学生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立即引人注目。不久，又把我转到肿瘤二科，学术委员会确定 Л. А. Вореница 为我的指导教师（教授），制定4年制研究生学习计划，从此工作、学习和生活逐渐走向正轨。

在工作上,苏联普遍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日从早8点(冬7:30)上班,开始参加早会,在早会上听取总值班医师(主治医师)报告全所4个临床科病人出入院情况、危重病人抢救情况、当日手术和学术活动安排。这种会议,一般只需十多分钟,但可以了解全所病人的主要情况和研究活动,我们都很乐意参加。早会之后,就是各科查房,由各科主任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教授主持,查到每个病人时,先由经治医生(包括研究生)报告病情、检查结果和进一步诊断治疗意见,然后由科主任或神经内科教授核对病人主要体征,决定下一步诊断和治疗方针,遇到疑难病症便在查房后集体讨论。本所手术室设在三楼,共有4个手术室,每天安排8台手术,一般是上下午各一台。4个手术室以斜面的形式集中在一起,什么时候,在哪个手术室做什么手术,谁做等在早会上均有通告,因此,临床医生互相参看手术,研究人员要深入手术室,以至外宾参观都非常方便。对我来说,只要自己有时间,可以随便到手术室去看手术。在下午,常常要为新入院的病人写病历,记录所管病人的临床经过,进行神经系各种检查。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可以用于学习。第一年的学习除了上述临床业务外,主要是学习俄文,一方面要把俄语作为一门课程,从词法到语法全面学懂弄通,作为研究生的一门基本考试取得优秀的成绩;另一方面要紧密配合日常的临床工作、研究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学以致用,通过俄语全面完成研究生的各项任务。医科院和研究所对我的俄语学习都很重视,外语教研室专门指定一位有经验的教员给我上课和辅导,规定每星期上3次课,每次3小时,

课后留有许多作业题,大概也得加倍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说到结合工作和生活学习俄语,在国外提供了一切优越的条件,只要自己努力,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初到研究所时,隔几天就有一个新病人入院,为了写好一份病历,开始要接触病人,询问病史,需与病人直接对话,可以学到苏联各民族语言。然后进行全身检查,特别是神经系的检查,可以熟悉许多检查方法和专科术语。最后写成病历,记录病情经过和手术经过,以及出院总结等,无不涉及俄文的词法和语法种种问题,处处都是听、看、读、写的极好机会,工作任务推动着俄语的学习。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写一份病历往往不是一次完成,而是经过草稿,上级医生审查、自己修改、誊写几次反复,然后定稿正式抄在病历纸页上。通过这样的反复,对提高专业外语确有好处。1952年暑假,医科院职工会给我们三人(潘、涂、张)各发一张疗养证到克里米亚海滨疗养所休假,在那里全是苏联人,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学习俄语的极好机会,因此,我们商定同他们打成一片,通过共餐、闲谈、游泳、旅游、跳舞等各种活动,学得了不少的生活用语。有几次还专门同休假的苏联小朋友一起玩,讲故事,学习他们语言清晰,发音正确的优点。工作单位的青年团组织,也经常组织中国学生同苏联同志一起活动,如到郊区参观游览、溜冰滑雪、登山野营、野餐、到剧院看戏、听音乐会以及各种纪念性的群众游行。我们研究所同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神经外科教研室有教学协作关系,该院神外教研室每年要办两期专科进修班,临床课和临床实习均在研究所进行。1952年下半年的进修班,我抽出时间去听了

两个月的课,从不懂到半懂,最后达到基本听懂,为以后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准备了条件。总之,结合工作和生活实地学习外文,是留学生一大优势和特点。我们还常常利用星期天召开党支部生活会,把住在附近的中国留学生集合在一起,互相谈学习情况,交流学习方法,最后大家分工合作做一顿中国饭吃。

在国外学习的同志,常常想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形,住在莫斯科可以看到当天或隔天的《人民日报》,对国内消息基本是灵通的。国内有些内部消息,也可通过代表团或访问学者知晓,在莫斯科4年研究生期间,我们去会见过王震、李维汉、杨立三(有病)、苏井观、姬鹏飞、崔义田、沈其震、王布君、李资平、薛公绰、殷希彭、鲁之俊、沈克非、朱贤益、梁伯强、陈景云、刘鲁等,在回国休假途中还遇见过耿飏同志,他们常常给我们介绍一些国内情况和国外的体会,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甚至还送一些东西解决我们生活的困难。1952年,我国第一个医学代表团来到苏联,住在莫斯科民族饭店,离我们住处很近。代表团团长张汝光、副团长叶青山和贺彪以及团员中的蒲荣钦、詹少联、洪明贵、陈真仁、向进、丁志辉等,大都是我们熟悉的老同志。他们曾向苏联卫生部建议,要我们三人(钱、涂、潘)同代表团一起参观。我和潘世征曾和他们一起参观过莫斯科郊区的精神病院和结核病疗养院,钱信忠同志还随代表团到过外地。通过参观,更多地了解了苏联医学方面的成就,扩大了知识面,但也引起了一些思想问题,过多地考虑自己学成回国后,有没有可能专门从事神经外科技术工作?这个问题,在出国前贺部长已经谈

过一些初步设想,本不该再考虑这个问题。但在参观中听到一些同志的议论,钱信忠同志经国内批准已由学外科改学保健组织,潘世征由学传染病改学普通外科,使我又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发生过一些思想波动。后经自己认真思考,还是认为应该把学习神经外科作为国家“填补空白”的任务来对待,况且这个专业自己也很感兴趣,至于今后是否专做神经外科技术工作,那是组织上考虑的问题。自1953年接到贺部长的亲笔信后,对于本专业的学习更加坚定,再没有发生过专业思想的波动。贺部长的信,一方面要我好好地学习,另一方面卫生部准备在北京组建神经外科研究所,要我在第一批留学生中物色有关专业人才,报国内批准继续深造。据此,我初步提出了几个人的名单,但他们还没有完成研究生任务,只有唐素恩在学位论文通过后,经我推荐,在莫斯科神经外科研究所进修了半年。以后,贺诚同志离开了卫生部,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 三

在4年的研究生学习计划中,要进行5门基本考试,即哲学、外语(俄语)、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生理,另外还有神经解剖作为考查。在这5门基本考试中,哲学和外语是共同的,任何专业,研究生都必须考的,一般安排在先。其他3门是围绕专业安排的,通常称之为“一主二副”,一主就是本专业,对我来说就是神经外科。二副就是专业基础课,对我来说便是神经内科和神经生理,后者又强调巴甫洛夫高级

神经活动生理。作为神经外科医师，当然应该熟悉神经解剖和神经病理，前者作为考核课程，后者列入论文有关内容。6门课程考试顺序：哲学、神经生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同时进行神经解剖的考核），最后是外语。在时间安排上，第二学年上半年考哲学，下半年考生理和内科，第三学年上半年考本专业和俄语，我全部取得优异成绩。

苏联对于学生的考试是很严格的，被称之“三堂会审”，必须专心致志地学习，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和优秀的成绩。哲学考试是由中央医师进修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统一组织进行的，他们把中国留学生单独编成一个小队，进行系统的讲课、讨论和答疑，围绕着复习提纲，做出自己的拟答方案，这样反复地学习，的确加深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理解，认识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些基本原理弄通了，才能在考场上不慌张。在50年代，巴甫洛夫学说在苏联生理学界占统治地位，该学说的核心是条件反射，是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和抑制现象，并在医疗和预防的实践中应用，只要把普通生理的原理和原则学懂弄通了，学巴甫洛夫学说是不会难的，因此在考试时我同样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他科目的考试有难有易，难易的程度取决于抽签的答题，只要充分地准备，答起来也是不会难的。本专业神经外科和俄文，可以说是天天在学天天在用，而且放在最后考，按说不应该有什么难处，可是在一些细微末节的地方不注意，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答题要求的水平更高了。

进入学习的第二年，指导老师就开始考虑我的论文题



目。有一次，他告诉我拟做“小脑脑电图探索”方面的题目。我心想，小脑脑电图，目前在临床上应用不普遍，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可是我在苏联的学习时间有限，国内在等我回去开展临床工作，我将要做很多神经外科复杂手术，为病人解除痛苦。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给研究所所长叶古洛夫教授说了，他立即表示赞成我的想法，建议我做“三叉神经节肿瘤的诊断与外科治疗”的论题，他说：这个题目有现成的部分病例，肿瘤部位涉及中、后颅凹和颅底中线的许多重要功能结构，涉及的手术方法也多，通过完成这个论题，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神经外科医师，并可找出许多问题加以研究。我答应接受这个题目，希望他和我的指导教师商定后告诉我。第二天，我向钱信忠和潘世征同志征求意见，他们意见的焦点是做不做论文？后来，我们向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请示，经他们又电话请示国内高教部后，得到的答复是：“作为研究生，如果没有做论文，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从此，我们三人横下决心做论文，并争取尽可能做得好些。叶果洛夫给我出的论文题目，经研究所学委会通过后，由指导教师正式通知我，并为我很快拟出了完成论文的工作计划，要我很快收集材料，尽可能多地收治同论题有关的病人，多做中、后颅凹手术，进行三叉节及其后根肿瘤有关病理和手术有关的解剖试验，最后整理成学位论文。按照苏联高教部的规定，待题目确定后，要围绕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在神经外科专业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以便公开讨论和避免重复研究。我在苏联《神经外科问题》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三叉神经节

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刊登在 1954 年第 6 期，得稿费 300 多卢布。第二篇是关于《三叉神经节的血液供应》，发表在 1956 年第 4 期的首页。

按研究生计划的第 4 年，上半年基本上是半天在临床、半天在图书馆。在临床方面侧重于手术。研究所通知了各临床科，凡接诊有三叉神经病和疑有三叉神经节肿瘤的病人都归我收，手术时尽量担任主刀。图书馆也为研究生提供各种方便，本所图书馆和病案室我可以自由出入（因为事先有通知），任意阅读和参考各种资料，需要外借时手续极为简单，只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图书中有些段落需要打印（那时复印机不普遍）时，只付少量的打印费即可取。到中央医学图书馆（在中央医师进修学院旁）、列宁图书馆只要有个阅览证和身份证就行，在那里有俄文和各种外文图书，旧书新书都有，藏书量很大。有一次，我为弄清第一例三叉神经肿瘤切除术是谁做的，列宁图书馆专门发信到英国伦敦国家图书馆去借原版书，经过一个多月我得到此书，并弄清第一例手术是 1846 年美国 Dixon 做的。在医学图书馆的英文杂志中，我在 1938 年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查到我国做第一例三叉神经节肿瘤切除手术的是沈阳小河沿医学院张查理先生。苏联图书馆普遍做有专题索引，查起来非常方便，研究图书馆还有作者索引，对某某作者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一查便知。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通过经常接触，他们对研究人员的情况很了解，服务态度也很好。

第 4 学年的下半年，我集中精力脱产写论文。这时，我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或在宿舍。到研究所每周只去 1—2

次,主要是向指导教师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和请示工作。B. V. Буров 和 Л. А. Коренна 考虑我写论文还会有困难,专门指定一位身有残疾在家休养的一位有经验的神经外科女教授帮助我,她叫 С. С. Брюсова,她知识渊博,经验丰富,肯帮助人。特别是对我,她认为能有机会帮助一位中国研究生,感到很光荣,她对我论文工作中的优缺点都能及时指出。论文共分 5 章 23 节,加上前言后语以及文献索引共 264 页,约 30 万字。我就一章一节地按论文顺序写,写好一章送审一章。写时一字一句的推敲,草稿写成后送给 С. С. Брюсова 教授并同教授一块儿审查,如遇不妥之处,小的地方当即修改更正,大的方面拿回来自己改。审稿时,她非常认真,从理论到实践,从内容到文字表达,甚至标点符号等从不马虎。她认为医学论文是要为病人谋利益的,是科学的记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为后人所引用。在半年期间的几十次接触中,我深感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女科学家,也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人物、国际主义者。当论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把当时我认为最珍贵的礼物“象牙雕刻”送给她老人家,她也拿出她从沙皇时代保存至今的小瓷花瓶送给我。

论文初稿完成之后,送与指导教师审查、打印,然后研究所聘请两位评阅人,写出评语,准备答辩。答辩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研究所内,本所医生以上的研究人员都参加。当我在会上把论文的主要内容报告以后,大家发言热烈,切中要害,有肯定和鼓励的语言,也有批评和指出缺点的地方,大家态度非常诚恳,热切希望我成为新中国的神经外科

学家,论文比较顺利通过。1955年7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经过4年的努力学习和最后的学位论文,要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得到认可,要在这个隆重而热烈的答辩会上通过。答辩会前在莫斯科晚报早有通告,答辩会上除在主席台坐有十多位院士、教授外,到会的不下200人,其中有不少中国同学。当主席介绍我的身分并宣布开会后,首先让我在专设的讲台上宣读论文摘要,这个论文摘要虽然备有铅印稿发给大家,但作者本人是不准照本宣科的,必需以幻灯为背景,采取讲演的方式,把摘要的内容在20分钟内讲完,并请大家提出意见和批评。接着大家发言提问,原以为提的问题很难,不料比研究所提的问题容易,因为主席团的成员不少是其他学科的专家,而本行专家在研究所答辩时已讲过,自己的指导老师似在“被告”席上,一般在会上不作过多的发言。因此,从我宣读论文开始到讨论结束不过1小时。接着是权威专家发表评语,其中B. Г. Eropon对我论文评价较高并说了不少鼓励的话。之后,宣布休会30分钟,此时,主席团进行无记名投票,论文一致通过。最后在大会上宣布通过的结果,博得与会同志热烈鼓掌。这时,研究所专家教授和同事前来表示祝贺,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鲜花送到我手里,接着就是互相拥抱和亲吻,那种热烈的场面使我终生难忘。之后,研究所同事凑钱在饭馆设宴,还把我熟悉的几位中国同学也请去参加,席间互相举杯庆祝,胜似节日气氛。研究所的苏联同志,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第一位研究生结业的祝贺,特赠我有中俄文对照的表彰状(中文是王维均同学写的)和当时难得的《列宁全集》,以作

永久留念。我的学位论文正式打印了 5 份,分送本所图书馆、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苏联高教部、北京图书馆和我自己 1 份。1 个月后,苏联医学科学院授予我医学副博士文凭,结束了 4 年的学习。

在这 4 年里,我的学习和工作是很紧张的。但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也有不少休息的日子。苏联同志喜欢户外活动,他们往往利用星期天组织中国学生出去游玩,参观博物馆、展览馆,到远近郊区去爬山、旅游、滑冰、滑雪和野餐、露宿等,锻炼身体,活跃了精神生活。苏联公民很重视假期,不论学校、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差不多都有将近一个月的休假。我在苏联 4 年 4 个假期的安排,两个在国外,两个在国内。1952 年的假期是在苏联克里米亚里海海滨疗养所度过的,在那里参观了不少名胜古迹,洗了海水浴,参加了各种文体活动,重点是自学俄语,使在休假后能够到进修班听课。1953 年的暑假,是在北京度过的,我的夫人王黎同志带着儿子小松来北京相会,我们住在总政招待所,同家人团聚,生活过得很美满。1954 年的暑假,我是在“莫斯科芭蕾舞大剧院疗养院”度过的。这所疗养院离莫斯科不足 100 公里,依山傍水,院的四周森林密布,可供游人散步,打猎,采集野果和蘑菇。南面的河流,河水清沏,水深过膝,适合疗养人员游泳。有一天下午,正当我和苏联同志兴致勃勃地向水深处游泳时,忽然听得河岸上有人喊叫,开始我不以为然,反正有事总归是找苏联人的,以后听得喊声越来越大,分明是在叫一位中国医生的。这时,我连忙游回岸去,认出她是疗养院的护士长(代理院长),专门来请我去抢救一位病人。

于是,我穿上衣服,随她一起赶赴现场。现场是一栋3层楼房的女休养员宿舍,病人住在2楼,当护士长把我领进楼门时,楼门内外和楼梯两侧挤满了人群,她们都急如星火地盼望医生来抢救。走在我前面的护士长向众人打招呼“医生来了,请让路”,我三步并成两步地上楼,一进房门时,见一中年妇女面容痛苦地用双手托着自己的下巴,不能张口说话,只能发出喃喃的痛苦声。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初步断定是“下颌骨节脱臼”。我劝病人不必惊慌,坐在床前,简要地询问她的病史,但她不能以清楚的语言对答,只能用手示意病痛所在。当我用双手触诊患者双侧下颌关节部位时,病人表现出痛不可忍的神情,完全可以判定这是下颌关节脱臼。此时,我要护士长给我准备一个凳子,端坐在病人对面;还要她预备两块纱布,以便将自己双手大拇指用纱布包缠。然后,将拇指伸入病人口内,分向左右紧贴磨牙面,双手其余4指留在口外,配合拇指掌握下颌水平部。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再令病人沉着安静,使面部肌肉放松,瞬间,我将压在双侧下齿列的拇指向前向下用力按压,以使咬肌延长,然后迅及将下颌水平部向后推托,听得关节复位的“格达”声,料想下颌关节脱臼已被整复。此时,病人立即张口,笑逐颜开,流出感激的热泪,她身不由己地扑向我胸前,双手紧紧地拥抱,使我感到很难为情。周围的观众看到此情此景,也欣喜若狂,掌声笑声溶成一片。她们窃窃私语,有的说:中国医生是好样的“МОЛОДЦЕИ”;有的说:涂医生好似一个教授,他沉着有序地挽救病人,不愧为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立刻,这个消息在疗养院当作头条新闻传开。有人

到处打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我留下在莫斯科的地址,约我到大剧院看剧等。第二天上午,病人伊万诺夫娜同她的伙伴专门到宿舍来看我,接着约我同她们一起到河里去划船,我们详细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原来伊万诺夫娜是莫斯科剧院的提琴家。

#### 四

1955年7月,我的学位论文通过,并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后,便开始作回国的准备。我将自己剩余的卢布购买了医学书籍,多余的物品留给新来的同学和外国友人,急盼回国分配工作和家人团聚。大概在7月底的某天,我国驻苏大使馆武官处(韩振纪武官),传达了粟裕总长的电令,说是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3同志在研究生任务完成之后,回国休假1个月,然后换穿军装到列宁格勒军事医学院学习半年,这显然是为了军事医学建设考虑的,作为军人,我们并不感到突然。

这次回国休假和再次出国是总后负责安排的,他们首先把我们接到总参三所(沙窝)居住,很快联系制作军装和办理出国护照等。傅连璋副部长考虑到我和家人的团聚,特介绍我到庐山疗养院疗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疗养院(中央部级)。这个疗养院在我出国前是属于中南卫生部接管的,以后我在南昌工作时也经常组织教职员工上山避暑,但我始终没有上去过。第一次去,感到庐山名不虚传,真是南方避暑胜地。我这次和王黎以及3个小孩上

去,是经中央卫生部介绍的,而且是走旅行社系统,因此,不论在疗养院或在途中的生活和安全都得到很好的照顾,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8月底,我按计划经南昌、上海乘车返回北京,仍住在总参三所。潘世征同志在北京为准备下一次出国做了许多工作,3个人的护照和两个人的机票他都拿到手。于是,我们就在9月3日乘民航班机先到莫斯科,然后抵列宁格勒,按时到基洛夫军事学院(或军事医学科学院)报到。

军事医学院是一座很古老的军事医学教学、临床和科研机构,它成立于1789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学院经过几次调整和改造,1935年以基洛夫命名,1954年获列宁勋章。当我们在1955年秋到达该院时,全院规模很大,设有4个系和60多个教研室和临床科,建筑林立好似一座医学城。我军从1953年开始往那里派留学生,到我们到该院时,已有我军留学生30多名,编成一个党支部,集中住在一个楼内,统由学院外国留学生系管辖。我军30多位留学生中,有学习各种专业的,其中进修生(1—2年)占多数,研究生占少数。医学院对我们3人(钱、涂、潘)的学习安排是很特殊的,在半年的学习中侧重于卫生勤务,对军事、后勤和卫生勤务(又叫卫生战术)采取讲课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一般上午上课,下午到保密室看文件。对其他军事医学科目的学习,基本上采取参观讲学的方法。每到一科室,首先由科主任介绍全科的发展情况,然后带领我们参观,最后提出问题共同讨论。这样,在全院几十个基础、临床和军事医学教研室基本上都轮了一遍,特别是对军事医学有直



接关系的教研室如卫生勤务、野战外科、三防、野战内科、军队流行病和军队卫生等,看得更详细些,我们提出讨论的问题也多些。通过上述讲学和参观,我们收获很大,主要是了解了他们对军事医学学科建设的重视,注意人才的梯次配备,坚持理论与实际联系,平时和战时相结合,医、教、研相结合的原则,突出本科的特点,重视各科协作等。在半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体会到苏联军事机关的组织纪律性较严,事事都要请示报告,也很注意保密。在半年的生活中,我留学生支部进行过一次改选,选我当了一届支部书记,全支部党员都能积极学习,努力工作,没有发生大的问题。1956年元月,正当我们3人的学习进入最后阶段时,聂荣臻元帅专程来到列宁格勒,一来为我军军官授军衔,二来参观此地的一些军事单位。授衔仪式举行得隆重热烈,大家非常高兴。2月,我们3人结束了在列宁格勒的学习,回到莫斯科住了十余天,参观了苏军总医院和军事医学研究所,然后乘莫斯科到北京的专列回国。

# 在西花厅周总理身边工作

吴 群 敢

我于1950年6月底从上海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财经组工作，在这个全国政权的枢纽机构工作了5年多。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比较接近领导核心，但所接触的大多是浩繁事件中的一个侧面、一个瞬间，难成系统篇章。事隔40多年，仅就记忆所及，对当时有关情况作些回忆叙述。

## 一、党中央对全国政权的领导

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首先是在政策方针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后来历次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都是政府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指针。当时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书记处，由前三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更从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对全国政权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制定法律、规定国家施政方针、通过对外条约、任免政务院总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

都曾对政府工作发出公开的指示和号召。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只设办公厅处理内部事务，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政务院成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有权颁发决议和命令，协调、指导政府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工作，并领导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

就具体的领导形式来说，党中央对全国政权的领导，在建国初期曾经历了一个从设立到撤消政府党组的变化。1950年1月9日曾设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共党组干事会（1952年8月10日改为中央人民政府中共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统一领导中央各部委的中共党组。在这个党组干事会中，还分设政法、财经、文教等分党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等中共党组也受其领导。但在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消政府党组，政府各部委的中共党组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政府各部委一切重要的方针、计划和重大事项都必须先经党中央的讨论决定和批准。同时，政府各部委和党中央的有关部门，也按业务性质分别归口，由专人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例如，除财金贸仍由陈云负责外，高岗主管计划、工业，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兼管铁交部，邓子恢主管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政府农林水等部门，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兼管党中央宣传部和政府文教各部门，饶漱石为党中央组织部长兼管政府劳动部等。这样，党中央对政府各部委党组的领导，就由过去把政府工作切成完整的一大块，改为分切若干专业性的小块，并同党中央的有关部门结成一体，由各口分别向党中央负责。这是党中央对政府领导体制上一个不小的变化。后来在1954年组成的

国务院，大体上也沿用这种体制。国务院从一办到八办分管政法、文教、重工、轻工、财贸、运输、农林水和对资改造，另有国家计委、科委等综合部门，有不少是由副总理兼任主管，其中二办、七办、八办分别同党中央的职能部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和统战部的结合最为密切。

对于这种具体领导形式改变的原因和得失，党中央怎样有效地领导全国政权，是应该探讨研究的。最近偶然在党史刊物中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在列举上述1953年3月10日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前后的变化时认定：“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和分工，无疑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严重批评。根据这个决定和分工，周恩来对政务院的工作除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外，实际上他所直接领导的只剩下一个外事口了。”我认为这个论断有失偏颇，很值得商榷。

第一，周恩来作为党中央书记处中名列第三（仅次毛、刘）并分工主管政府工作，这个根本性的前提并未改变。从而，凡是报送党中央审定的政府各口、各部委的请示报告，而且不仅政府部门还包括军事、党务、群众团体等工作，周恩来都要在党中央书记处会上参与最后的审定。当时党中央书记处经常甚至每晚都要开会，我们往往要等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见周恩来回来批阅文电。周恩来办事精细明快，积极主动，实际上是党中央承上启下、沟通各方的秘书长。而且，除在党中央参与决策，周恩来对政府工作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凡是用政务院名义颁发的任何决定、法令等文件，都必须经他本人审定签署。即使在抗美援朝最繁忙的时刻，

或者党中央已经核准的文件,他都始终履行不渝,并对我们说:“中央分工让我主管政府工作,我不能不管。”他为此还曾和陈云共同商定过。

第二,当时认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必须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各中央局撤消后许多有经验的方面大员调集北京,也为充实、加强中央的领导创设了条件。例如,邓小平调来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我们都十分庆幸,认为他曾同周恩来一起工作,一定会合作得很好。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东北也较有工业经验,由他担任国家计委主席并管工业各部,也是适宜的。而原有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统管政府的所有部委,因业务各异,人数又多,难以共同深入探讨各个部委的工作问题。在我印象中当时开会也不多。我在1950年末由于讨论预算问题曾参加协助记录一次。看来只有讨论预算、计划之类共同性的问题,或者统一传达党中央的决定、指示,才较适宜。因此,我认为撤消原有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改按系统、有原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直接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不失为加强党中央对政府工作集体领导的一种积极的尝试。

第三,1953年初对新税制“阅报始知”的批评以及反对分散主义的举措,对于这次领导体制的改变,不能说毫无影响,但似不应估计过重,至少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当时党中央主要核心是团结融洽的,周恩来被公认为勤于请示汇报,不难判定其新税制问题仅是偶尔疏漏;即使后来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对周恩来错误的批评也从未强调任何“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问题。周恩来是勇于承

担和检讨错误的，但据我记忆，他在主持 1953 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包括他所作的结论并未检查他所应承担的领导责任，当时我也不感到他承受着什么压力。我的理解，当时是在纠正财经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更重要的是以此为镜，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提高对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并不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尽管在批评中对当事人的指责是严厉甚至过分的。

第四，从事实上看，政府党组即使在设置期间，对重大问题如财政预算等仍需报请党中央审定。而在政府党组撤消后不久，周恩来仍主持全国财经会议、协同筹划统购统销、审定苏联援助建设项目（特别是军工项目），这些都是关系全局的。在 1954 年解决高饶问题和组建国务院后，政府各口以及国家计委多由副总理兼任领导，更便于周恩来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统筹安排。1955 年时毛泽东还曾指示周恩来应多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各部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进行协调、预审。各部委的报告大多是写“总理并报中央”，由周恩来核转。特别是在“一五”后期、调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历次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财政预算、粮食调拨等，都经周恩来主持反复研讨才报中央审定。这些都是在撤消政府党组干事会以后的事。

综上所述，我认为 1953 年撤消政府党组主要是为了加强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集体领导，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在此期间，不论党中央对政府工作具体领导形式有什么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党中央仍是通过周恩来领导全国政权的。

当然，对于政务院的日常工作说，1953 年撤消政府党

组后一时曾有不小的影响。这就是每周例行的政务院会议议程突然出现了“真空”。原来政府各部委送来的工作总结及今后方针之类的请示报告很多，政务院可以自行选定列入政务会议议程。现在，所有这些文件都需先经党中央审批核准才能提交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在党中央审批以前政务会议便无议程可列。当时经办政务会议议程的齐燕铭十分着急，赶来和我们商议，我处恰有一个人民银行关于金银管理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我认为内容比较简单，牵涉面不大，除即送党中央审批外似可同时列入政务会议议程，以免政务会议停开。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将此件送刘少奇批示，结果刘少奇还是批待中央审定后再提交政务会议为好。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政务会议只好为此停开了一次。但这毕竟只是体制转轨中的一个短暂的小插曲。政府各部委的报告、部署等，经党中央审定核准后，凡需要或可以提交政务会议讨论、颁发的，很快就又列入政务会议的议程上了。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政务会议。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政府某些部委中，都有一些知名的爱国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和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某些部委的正副负责职务。我们称之为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让他们在《共同纲领》的准则下有职有权、参与政要。周恩来十分重视同他们合作共事，每次政务会议只要他在北京都亲自主持，即使已由党中央审批核准的文件也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耐心加以解释说明。政务会议是从下午3时开始，只要

是周恩来主持，一般都要晚上8、9时或更晚些才能结束，所以不但散会后备有晚餐，下午5时后还上些点心。当时只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才备有便餐。周恩来在政务会议散会后还曾对我们称赞党外人士所提的意见，说某某由于过去有地方工作经验了解一些实际，某某文字修养好、抠得细等等。他是把政务会议当作进一步斟酌修定文件，并倾听党外声音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的场所。

## 二、全国政权的运转枢纽

当时的总理办公室，是隶属于政务院编制的的一个机构，设在周恩来居住、工作的中南海西花厅内，直接为周恩来服务。总理办公室的人数不算多，除按规定设置的警卫、生活、机要秘书外，各业务组的秘书最多时约有十余人。由于周恩来在党中央的身分和职责，业务组的设置除了与政府部门对口的政法、文教、外交、财经等组外，还有与中央军委联系的军事组，并设专人或兼任同党中央宣传、统战、情报以至工青妇等方面的联系。各业务组的业务内容，主要是党内的。凡是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都有周的一份，甚至注明“请周办”；政府各部委负责人签署的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一般也先送周恩来，写明“总理并报中央”；主席、少奇的批件，凡用中央名义的，一般也要周恩来圈阅后发。所有这些都通过我们办公室运转。因此，总理办公室名义上属国家行政机构，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党内机构的成分。



就政府工作来说，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批复、指示，总理与副总理、秘书长会商，总理对部委负责同志约谈、指示，都由办公室分别处理、安排。有个时期周恩来还指示我们同时为邓小平副总理、习仲勋秘书长服务，在西花厅内腾出房间让他们办公，每天来看周恩来在凌晨批示“请邓、习阅（办）”等文件。至于需要以政务院名义讨论、颁发的文件，我们则根据周恩来指示送请秘书厅办理。可以说，总理办公室确实是全国政权核心的一个运转枢纽。除了党中央领导人之间会谈和电话磋商外，在具体操作上沟通了党中央与政府之间，政府领导核心之间以及同各部委、各地区的联系网络。这在下述业务组的某些职责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我们当时的职责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领导指示和实践中探索，主要的可列举如下：

第一，区别轻重缓急。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处的文电报告数量最多、信息量最大。在纷至沓来、堆积盈筐的文电中，如何做到要事、急事不耽误，可稍缓送的不干扰，应是我们业务秘书的首要职责。这需要一定的政治敏感。好在周恩来对许多要事、急事心中有数，也常提醒我们注意、催办。记得1955年春时，有一次我值夜班，周恩来在审批文件中停笔抬头对我说：“今年上半年毛主席要亲自抓两个重点，一个是肃反，一个是粮食问题，这两个重点中就有一个（粮食问题）在你这里。”所谓轻重缓急，只是相对而言，凡应送批阅的很少是不急要的。如有时毛泽东谈到一些报告、反映，其内容本不一定很急要，但如周恩来恰恰没有看到那就不大好了。不过总的说来，我们对区别轻重缓急还

不大发愁，为难的倒是明知为急要件却一时送不上去。有些简短的口头请示还较好办，周恩来在盥洗间或主持会议时我们闯进去口头请示或递个条子，他都立即指示办理，从不责怪。有一次他正在盥洗间刮脸，为了说话答复处理，还把脸刮破了。至于需要坐下来认真审阅的文电报告，特别是财经方面常有的大本子，周恩来只有午夜从中央开会回来后才能审阅。这时他已连续工作了10个多小时，各组都有一批急要件，值夜班的很感为难，有时只好从各组分抽几件送批。在他凌晨休息前总有一些文件来不及审阅，几天积累下来在他办公桌上就堆成高高的一叠。对这些待批的积件，他定期进行清理，或在星期天加班，或经他同意转请有关同志审处。有些文件待批的时间长了一些，经向有关部门解释也能得到谅解，紧急、特要的文件则从未有耽误。

第二，力求精简扼要。不论口头报告还是文电送请批阅，都应精简扼要，决不能浪费总理的宝贵时间。这可以说是我们业务秘书的一项基本功。我拙于言辞，如需口头报告就要预先想好怎样用两三句话先把事情的关键讲清楚，然后再补充叙述几句情况，或待总理询问时再作解释。至于送请阅批的文电，我们更要附上书面摘要。当时总理办公室专印了摘要纸，左侧约2/3是内容摘要，右侧约1/3是留供总理批示。一般两三千字的电文，经过概括综合，摘成三四百字就可以了。如有各地区、各部委同类问题的报告，传达中央会议或政治运动情况等，更可夹在一起，分别摘其突出之处。财经方面文件多为大部头，数字很多，总理对数字又感兴趣，我们在摘要时除了概述总的情况外，另将主要数字列

成简表，阿拉伯数字表明的指标、速度、百分比等，要比文电中汉文表述简明得多，总理看后很高兴，认为这样“一目了然，并便于记忆”。当然，我们的摘要并不能代替原件，原件仍附在摘要后面，并需将其中重要之处用笔划出底线，以备总理认为必要时查核。记得我初来办公室时，有一份河南省委的综合报告，提到一处地方国营煤矿发生事故，我只摘了“没有伤亡、已作处理”，不料总理看完摘要又将原件中有关部分从头到尾圈圈点点看了一遍。至于不少需要全文审阅核批的正式文件、请示等，我们不必摘要，只在前面附个便笺，说明一下内容或需斟酌之处就可以了。新华社每日随收随送的国外电讯，为了及时送阅，也只在重要处用红蓝铅笔标出。

第三，弄清来龙去脉。凡是我们的送批的文件或口头请示，一定要先弄清楚事情的来由和问题，数据、文字有无谬误，以及有关部门意见是否一致等等。因为总理精细过人，一眼便能看出问题，而他在未弄清楚前决不批办，有时半夜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就是为了澄清他所疑惑的问题。如果我们回答不出，势必要退回查询明白后再送批，那就要多延误、浪费总理审批的时间了。所以，每逢总理按电铃叫我时，总感到很紧张，不知他要问的是什么问题，生怕答不上来。记得我最狼狈的一次，是1955年春发行新人民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讨论时，总理从远处突然大声喊我的名字，问消费物价指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毫无思想准备，虽知大概却因紧张忘了有多少品种，也未想到请在场的统计局局长薛暮桥说明，只好老实说不清楚。总理对此虽未说过什么，

但我很感愧疚。为了做好工作，我们当时业务学习的压力是很大的。

第四，主动反映、建议。周恩来很鼓励我们多去参加分工联系部委的会议，一则便于熟悉业务，二则可以及时反映情况。各部委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是中央领导所关切或准备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他们的正式报告往往需经逐级审定、会签、打印，总要好几天，而且文字措辞颇多斟酌，有时不便充分暴露矛盾。我们参加会议后当天就写出数百字简要汇报送阅，坦率反映会议上讨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争论和决定。当时办公室除摘要纸外，还印有汇报表，左侧约2/3是汇报内容，右侧约1/3留供总理批示。汇报表的用途很广，凡需向总理汇报的都可一事一报，我们在外参加会议后所写的汇报也是其中一项主要的用途。周恩来对这类会议情况汇报很重视，大多批示即送主席、刘等领导同志阅后退周处。毛泽东当时对此也很重视，记得有一次在我所写的情况汇报上，不但对汇报内容圈圈点点，还在我的名字下面用铅笔划了一个粗黑的横线。周恩来认为总理办公室不仅是为他个人服务的，其中也包括这种情况汇报可使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政府部委工作的一项。许多部委的领导也欢迎我们这样做，希望我们帮他们“通天”、“下点毛毛雨”，如有重要的会议总要打电话坚邀我们参加，可惜我们事忙只能相机择要参加。此外，周恩来还很鼓励我们多提建议，对报批的文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当然，我们所能提出的大多是文字、技术方面，或在文件内用铅笔试改，或在文件前附个便笺说明自己看法和拟办意见，甚至对较简单的问题试

拟复稿附供参考,目的都是为了力求节省总理审批的时间。总理对我们提得不对的,从不说什么,而对可采用的都以毛笔照改、签署,甚至赞赏“有水平”,多年后还提到。

第五,联系约集会谈。这原是所有当秘书的通常的工作。周恩来这里独特之处是约谈特多。他处在众多矛盾交叉的中心,为了承上启下、照顾全局、协调各方、排忧解难,他需要亲找有关方面商议解决。他每天下午约谈的事项和时间,由值夜班秘书根据他的指示在桌面台历上写清楚,台历写不下就另附便笺。由于预定的项目多、时间紧,往往前一项约谈未完,后一项已按时来到,有时还有紧急临时安排的。有些友好国家的使节,还有半夜紧急求见或应邀来谈的。我个人估算,在周恩来的工作时间内,各种接见、会谈至少要占 $\frac{1}{3}$ ,甚至达到 $\frac{1}{2}$ ;参加书记处会议和批阅文件,各都可能略少于 $\frac{1}{3}$ 。我们业务秘书每天上午上班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总理休息前批了哪些自己送阅的文件,有没有需由自己经办的约谈。如果有的话,都必须立即转达、通知,不得有误。周恩来在约谈时,业务有关的秘书大多参加旁听,但他从来都是亲自记录,我后来发现他在便笺上所记的要点又完全又清楚,他更着重的是让我们熟悉业务,便于配合工作。

我们在办公室最省心的一件事,就是不必动手起草讲稿。建国初期,周恩来经常在怀仁堂向各方面干部作形势报告,也常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但所有这些讲话、报告,周恩来总是自己写了几页纸的简短提纲,就气势磅礴讲上几个小时。他在讲话前最多只是让我们索取一些会议中反映的问

题或经济形势方面的数字。至于准备正式发表的重要报告，周恩来更要亲自动手。我所知道的一是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的总结报告，周恩来连续奋笔疾书了两三个夜晚。其中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两段的文字表述，都是周恩来亲用毛笔在便笺上分别誊写即送毛泽东审定的。我在旁只是待命查找依据、辞典等。二是1954年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由于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大作报告，并需总结建国5年的政府工作，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最初曾由中宣部的3位同志分别执笔写个初稿，周恩来看后很不满意，决定自己动手，还向我谈了他的思路，让我收集资料。但他在连续工作约两昼夜后，我们感到他太劳累了，经向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反映，中央决定请胡乔木代笔，周恩来才能得到休息。他虽未最终完稿，但这种身居高位仍事必躬亲的奋发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 三、领导核心间的团结、融洽

首先，也是最突出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敬重和维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

一是约在1950年底的政府党组干事会上讨论各部委1951年度财政概算草案，当时一面正在展开抗美援朝战争，一面国内百废待兴，许多部委都陈述自己的困难，有的还讲得相当激动，要求增拨一些经费。最后，周恩来发言说：“你们讲的都有道理，但是，现在中央的总预备费只有这点，

我们是这么一个大国，又处在战争时期，中央不能不掌握一些预备费作为机动。我不能在这里做‘好人’，把这点预备费分掉了，让中央、主席为难。现在，概算草案只能这么定；反正这个概算草案还要到中央、主席那里最后商定，你们如果还有意见的话，还可以到主席那里去讲，要做好人也只能让主席来做。”我当时只是叹服他既能坚持原则，又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尊重与维护之情。

二是在1955年春的一个凌晨，我坐在周恩来办公桌的对面执行值夜班的任务，等待他批阅文件，他突然抬头对我叹息地说：“中央内部的水平真是参差不齐呵！毛主席可以列在全世界马列主义最高水平之林，而有些同志却……。”他所说的“参差不齐”和“最高水平之林”的提法，使我很感新颖、印象特深，这也表明了他对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的推崇和敬仰。

毛泽东对周恩来也很器重和关心。尽管他们在书记处会议上商谈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从文电核批运转的情况看，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都批“请周酌处”，对周恩来拟办送批的都批“同意”或“原则同意”，只略作修改。记得当时还听说这么一件“小事”，即周恩来专机需要飞越某友好国家国境，外交部拟了一个电稿照会该国政府，也提到了周恩来出访的目的。这个电稿经周恩来核定送毛泽东圈阅后发出，电文发出后毛泽东感到不甚妥当，因为当时出访目的对外还需保密，对飞越国境的国家告知周恩来专机的时间、航线也就可以了。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批评任何人，只是谈了上述意

见，还说此稿经他看过，他也有责任。这使我深感党中央主要领导核心间团结、融洽，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

记得毛泽东还曾来过西花厅看望周恩来。那是周恩来患急性盲肠炎需即送医院做切除手术，手术本身并无多大危险，但毛泽东闻讯后即赶来西花厅看望。我们当时都被告知不要出来围观，只在办公室内隔窗看着毛泽东离开西花厅后周恩来才被抬往医院。

周恩来同朱德之间的情谊，更非一般。我曾目睹他们在西花厅的一次简短叙谈。那是在1951年春，周恩来、邓颖超正在吃晚饭，忽闻警卫报告总司令的汽车已驶进西花厅前院的大门，报告刚完朱德就出现在饭桌旁边。他的来访是无需预约的。他说已吃过晚饭，看来是想利用周恩来进餐的空暇时间叙说他在外的见闻和意见。朱德慈祥和蔼的眼神，周恩来时而微笑倾听，时而放怀大笑，使我深感他们之间的真挚和坦诚，没有任何的拘束和客套。

周恩来对陈云是很尊重的。记得约在1950年底或1951年春，为了商议政务院发布管制、征用美国在华财产、企业的命令，周恩来坚持要亲往看望陈云，陈云认为应由他来西花厅商议，双方秘书刘昂和周太和在电话中反复磋商都难一致，最后陈云只好让步。后来还有多次，周恩来都面嘱刘昂亲往陈云家中转述或征询对财经问题的意见。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前期，陈云因身体不好在北戴河疗养，为了让陈云进一步了解会议情况并征询意见，周恩来特把周太和召来西花厅，面嘱向陈云汇报的内容。在恢复时期、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往后1956年反冒进、60



年代初经济调整中，周恩来都十分倚重陈云的卓越见识，密切配合很是默契。

周恩来同邓小平之间也是如此。记得邓小平调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第一次来西花厅时，我恰在场，周恩来同他亲切交谈，除了介绍情况请他来西花厅办公外，还含蓄而又风趣地微笑着说：“你笔头又快，主席一定很快就会赏识你的。”后来的许多事实，也证明了他们之间亲密的友谊。

#### 四、紧张欢愉的生活

在西花厅工作，是很紧张的。一是压力大，二是时间长，一般上午八九点钟就要来到办公室，看看有无急件、批件或约谈安排，如无急办的争取外出参加会议，午饭后因总理将起床办公也不敢多休息，一般都要午夜吃过夜餐把送批的文件夹子交给值夜班的秘书后才离开办公室。这样每天工作的时间一般要有12个小时；如遇自己轮值夜班或有必须在旁待批的急要件，那时间就更长了。当然，其中也有空隙，那就是自己应送批阅的文电已办完，总理还忙着办别的事；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需在办公室待命，唯恐万一总理临时有事要找我们。

我们虽然接近首长，但一切待遇都按照规定，不容特殊。以用车、住房为例，当时我是行政14级，按规定行政13级以上才能因公用车，我因外出开会常要带机密文件和笔记本，又要赶时间，坐公共汽车很不方便，但也没有办法，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请行政领导批准派车。我结婚前

和人合住一间约 10 平方米的平房,由于作息时间不同,很影响休息。结婚后,在西花厅院外的新建平房中分到一间,约 15 平方米,后因有了孩子要雇保姆才增为两间。许多级别较高的同志也都只住两间。我们当时都按供给制后改为包干制待遇,加班再多也没有加班费或补休,唯一的“福利”只是按规定标准提供的夜餐。记得 1954 年时,国营商业同供销合作总社因业务分工有些争执,程子华火气较大,周恩来让姚依林、程子华、陈国栋三人在一起谈谈,嘱我也前往听听,似是在陈国栋那里谈到半夜,要吃夜餐时也就是每人一碗挂面,卧了一个鸡蛋,加些盐、味精和葱花。在那个年代,决想不到要外出公款宴请,联络感情,或利用手中权力进行什么交易。

在西花厅,周恩来始终关怀着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他曾亲自担任办公室理论学习的组长,组织我们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布置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有关中国的章节。他曾批评办公室有点“无为而治”,提出自己要参加财经组的党小组,过普通党员的组织生活。周恩来还曾亲自抓我们写个人小结。那是在 1955 年的春节或五一节的前夕,他要我们把个人的工作、思想小结写好交他,以便他在节假日审阅。这是他原就布置好了的,当晚他检查问有谁不能交时,我因晚上要同许明到怀仁堂参加陈毅主持的关于公私合营问题的座谈会,怕来不及写完,便随口说我“有可能来不及交”,周恩来听后很生气,训了我两句,他喜欢回答准确明快,对模棱两可的话很反感。这是我在西花厅唯一一次当众挨总理批评,想想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亲自抓我们写个人小结，并利用节假日审阅，使我终生难忘。

周恩来对我们在工作上是高标准、严要求的，但在关系上又是平等相待、亲如家人。他像一个慈祥的父辈、亲密的朋友那样，坦诚地关怀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只忆述与我个人直接相处的几件事。

一是坚邀我共餐。记得是在1951年春政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的前夕，周恩来在签署时认真审阅、反复斟酌，从下午3时开始眼看在晚饭前还完不了，我当时在旁备询、查找资料，他便吩咐告知厨房留客吃饭。我一再推辞说我可以到食堂吃饭，很快就可以回来，他也不回答我，只是再次按铃检查通知厨房作准备了没有。可能是缺少思想准备，我在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吃饭时，感到很拘谨，不知说些什么好。幸而朱总司令来了，缓解了我的窘境。记得当时餐桌上有煨汤的鸡，两笼扬州汤包，米饭和两个清淡的炒菜，这显然是两次示意要留客加菜的结果。像我这样在办公室级别较低的普通干部，周恩来坚邀共餐，显示了他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平等而又亲切的情谊。

二是教育我参加土改。约在1951年秋，周恩来走进我们的大办公室，看外交组的人都不在，只有我坐着看材料。我正要起立问有什么事要办，他却先走到我办公桌前愤慨地说：“地主阶级真是无耻！在中央苏区有一次红军攻打一个地主的土围子，地主眼看抵挡不住便把老婆、女儿剥掉外衣排列在围墙上，并向红军喊话，要红军过来，每人一个老婆。真是太无耻了！”他讲完后即回他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

当时很纳闷，想不出周恩来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些多年前苏区的往事。不久后组织上对我谈，考虑到我从未参加过土改锻炼，希望能去体验一下这场变革。此时，我才明白周恩来对我上述一番话的用意。原来他已闻此事，找外交组的同志不在，就利用短暂的时机，以当年苏区反对地主武装中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事实来教育我。

三是关怀我的婚姻、家庭。也是在1951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有家的都回家了，我没有什么事独自在办公室内，周恩来这时进来了，他也正在散步休息，看到我这种状况便转身向随行的何谦说：“星期天应该为年青人组织些活动嘛！”何谦很能悟解，也很热心，很快就同李逸云商议，替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即在协和医学院的孙国贤。1952年8月我们趁周恩来出国办公室不那么忙时办了婚事。当时考虑到协和医学院还有林巧稚大夫等参加，我们在西花厅水榭内布置了一个冷餐酒会，把大家凑份帮我买室内用品的钱用来请周恩来的厨师代制酱牛肉等冷菜，还拿了几瓶周恩来的藏酒，何谦还特向我说明“总理就不再送什么东西了”。参加的约三四十人，邓大姐也来讲祝贺。这在当时算是相当隆重并有些铺张的。周恩来回国后很快就来看望我们，就是这一次由于孙国贤夜班回来，午睡时间长了些，他在门外就像一个普通的来访者，默默等待我们穿衣叠被、收拾房间有几分钟之久，我们深感羞愧，他却若无其事。他问孙国贤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说是浙江湖州人，他随即便说“那跟陆瑾（饶漱石的妻子）是同乡嘛”，缓解了我们的窘态。后来，他又多次来我家闲谈，孙国贤很喜欢谈她工作中本不重要的情

况，他却很有耐心听完；有一次在院内遇见我母亲时快步上前问好，有一次我患重感冒他闻讯嘱人提醒我要同孩子隔离……

周恩来位高事繁，在日理万机之中仍像慈祥父辈、亲密朋友一样关心着我们办公室的所有人员。他对家属院内谁家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都了如指掌。他在审看文艺、电影节目时也喜欢我们参加，听听我们的反映，当时这类活动每周都会有一两次。至于各方面送来的晚会招待券、入场券，那就更多了，只要我们有时间都可以前往，这也算是我们当时唯一的“特权”。

当时在西花厅，尽管在工作上压力很大，也甚劳累，我们的情绪和生活一直是振奋欢愉的，这同周恩来在许多方面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特别是平等友爱相处，是密不可分的。

# 流放西伯利亚的25年

——访王一同志

王林育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大批的共产党人和热血青年,纷纷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有的学成归国,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回国无门,在异乡辗转飘流,备尝艰辛。王一同志,这位当年由向警予介绍入党的18岁小姑娘便是其中的一个。如今,这位进入耄耋之年的89岁老人,孑然一身,生活十分清寂。但她从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回首在异乡那些艰难坎坷的岁月,她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深感欣慰与自豪。

记者:您是哪一年去莫斯科的?

王一:1927年9月。当时我在汉口做工运工作,直接领导我的是我的人党介绍人向警予和曹祥华同志。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党决定派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记者:路上情况如何?有没有遇到危险?

王一: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同行的5个人编成一个小队,从汉口码头上船,一路上,大家躲在货舱里,互相不打招呼。到上海后,住进一家小旅馆。大约过了三个星期,苏联的货船来了,我们和其他几个小队的人陆续上船,都被安置在低舱。轮船驶进日本海后,我们才有机会到甲板上活动活动。又过了两天,轮船到达海参崴,我们被安排住在国际饭店。在海参崴等待了一段时间,凑齐200来人,我们便乘上一列火车,在西伯利亚旷野上行驶12个昼夜,才到达旅途的目的地——莫斯科。

由于当时缺煤，火车运行是靠燃烧木柴作为动力的，在运行时，要边停边伐木柴补充燃料。火车上也不供应开水，要喝的话只能到站台上去打。我记得，有一天火车停站时，一位男同学提着水桶去打水，由于天寒地冻，不小心滑倒在地，被另一辆开来的火车压断了一条腿。大家急忙把他抬到附近的车站医院急救，后来虽然保住了性命，却造成了终生残废。

漫长的旅途虽然十分艰苦，但由于我们对未来充满向往，也不觉得寂寞。有些曾去过苏联的老同学，给我们讲十月革命的战斗历程，教我们唱苏联革命歌曲，教我识俄文字母。我们在火车上度过了十月革命节，大家又唱又跳，气氛十分热烈。

**记者：**当时您从国内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来到莫斯科，在相比好得多的条件下学习，感到换了个新天地吧？

**王一：**是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环境优雅，校园美丽，教室和宿舍很宽敞，文体设备也比较完备，冬季有滑冰场，夏天有游泳池，假期还可以到黑海旅游圣地疗养。学校伙食也很好，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个大食堂，西餐供应白面包、肉、蛋和各类小菜。为了适应中国学生的饮食习惯，主食还经常更换大米饭和面条。这样优厚的条件与国内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已是严冬了，学校为我们准备了大衣、外套、帽子、皮鞋、内衣和其他生活用品，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去报效祖国。

**记者：**您还记得当年的课程设置情况吗？

**王一：**开始每人发一个学生证，上面写着俄文名字、性别和年龄。我的俄文名字是“嘎斯萍娜·塔吉雅娜·帕芙洛夫娜”，这样，我就成了中国籍的苏联人了。我1908年出生，这年刚好19岁。我们这些同学，每四五十人分成一个班，我被分在第四班，帅孟奇同志也在这个班上。学习的课程记得有俄文、世界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和列宁主义理论等。当时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记者：中山大学虽说学习生活条件优越，但也不是世外桃源。苏联 1928 年至 1929 年进行的反托派运动也曾波及到它。您在那场运动中是否受到冲击？

王一：当然受到啦。那差不多改变了我以后的命运。

记者：请您谈谈具体经过。

王一：当时的校长是米夫，不过学校的许多大事是由王明一人说了算的，他是支部局书记，米夫很赏识他。那时学校支部局规定：所有中共学生党员，都得转为联共候补党员，而其他从资本主义国家来苏学习的共产党员，却都转为联共正式党员。这个决定引起了很多中共老党员的不满。对此我也很不理解。王明这个人，专横不讲民主，喜欢拉帮结派，打击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在教务处工作的俞秀松、董亦湘对王明的错误作风进行过批评帮助，他就怀恨在心，诬陷他们搞“江浙同乡会”。王明这样搞很不得人心。1929 年秋天，在全校近 400 名党团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山大学召开大会，讨论支部局的工作路线。少数王明追随者拥护王明继续当支部局书记，大多数同学极力反对。会议开了 10 天，得不到结果。特别是在讨论教学大纲时，没有把中国革命低潮时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列入大纲，学生们把主张列入大纲的签名议案呈交支部局，我也在这份议案上签了名。那年年底，联共到中山大学清党，王明趁此机会大搞宗派活动，把反对他的人划分为“江浙同乡会分子”、“工人反对派”和“先锋主义派”，给予残酷迫害。这些人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送到工厂劳动，更多的被遣送到西伯利亚，也就是流放，我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和您一起被流放的还有谁？

王一：有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和我丈夫任岳等同志。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丈夫任岳的情况。

王一：他是湖南人。1921 年，他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又随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先在安源煤矿党组工作，后来到广州参加北伐军，给鲍罗廷为首的苏



联顾问团当秘书和翻译。大革命失败后，任岳再次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教员班，为我们这些新生当俄文翻译。不久我们结为终身伴侣。在异国他乡长达25年的艰难岁月，我们一直是携手共度的。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工作，虽然1952年终于如愿以偿，可惜由于积劳成疾，两年后，他就患急性心肌梗塞去世了。

**记者：**你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什么地方？具体做什么工作？

**王一：**当时，中苏边境西伯利亚的斯列金斯克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砂金，数以万计的华侨工人，长年在荒凉寒冷的矿区中从事采矿的苦役。我们的任务是到沙河托马金矿场，向那里的华侨做宣传和教育工作。1930年1月，正值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之时，我和任岳等同志从莫斯科坐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先到伊尔库茨克，再换车到斯列金斯克城，我们找到在市党部工作的中大同学张逸凡，在他那儿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奔赴金矿区。

**记者：**去金矿区您是乘火车还是坐汽车？

**王一：**什么车也没有，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拉的雪橇。当时通往金矿场的路上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只有凹凸不平的林间小道，小道两旁是高大浓密的白桦树。这里冬季长达8个月，从头年的10月到次年的5月，白雪覆盖，从不融化。我们雇用的雪橇夫是当地的行家，熟悉地形，不会迷路，否则遇上土匪或掉进雪坑，就有生命危险。一路上虽然颠簸得很厉害，但能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也不感到疲劳。

**记者：**你们中途在哪儿歇脚呢？

**王一：**就在当地农民家。夕阳西下时，我们赶到一个农家。女主人大约50几岁，有两个儿子，他们刚从田间收工回来。房子是木头的，但比较暖和。主人用砖茶招待我们，煮了一大盆土豆作为晚餐。这里农民若不养牛，是喝不上牛奶的。我们拿出面包和块糖，共同凑合着吃了顿晚餐。

**记者：**您觉得当地农民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王一：**可以说非常艰苦。农民们一年只能收一季麦子或土豆作

为主食，没有水田，根本吃不上大米。蔬菜也只有洋白菜、洋葱和胡萝卜。年成好时，勉强够吃，若收成不好，连土豆也难以保证。机械炉烤制的面包是买不到的，农民只有靠自制的土炉来烤面包。这种土炉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中等的差不多有一人多高，像个大方桌，上面有一个烟囱，直接通到室外。烤面包时，先用木材将炉子烧热，然后把炉底扫干净，再把切好的面团放入炉内，半个钟头后，即可食用。有意思的是，那天晚上，我是在烤面包炉上过夜的。因为主人家只有一张床，他们都习惯睡在地板上。大概因为我是女同志，才破例享受这样的优待吧，任岳他们就睡在地板上。

记者：您坐雪橇去金矿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

王一：整整两天。

记者：在西伯利亚，冬天一般在零下 20°C—30°C，有时甚至可达零下 40°C。地上积雪过膝，北风寒冷刺骨。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作长途旅行，你们靠什么来御寒呢？

王一：我们穿上厚厚的大衣，脚上穿着毛毡靴，这种靴子一直护到膝盖，再套上一件专为上路用的羊毛外套，头上戴上大皮帽。不过即使这样“全副武装”，到达目的地时，我们也已冻得半僵了。

记者：沙河托马金矿场的华侨工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到自然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做苦工呢？

王一：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北方，是黑龙江对岸的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为生活所迫，跑到隔着一条江的苏联领地淘砂金，再回去换些钱养家糊口。沙俄时期边境管制不严，他们还可以来去自由些，十月革命后，边境管严了，偷跑过来的工人，不准回去。苏联政府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为金矿场淘金，换取外汇，以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这些工人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又不识字。他们在矿井工作，一天少则 10 小时，多则 10 几个小时，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差，工作之余，根本不想再去学习和参加其他活动，开始时见了我们就远远避开。

记者：这对你们开展工作显然十分不利，请问你们是如何改变

这种状况的呢？

王一：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我和任岳同志一起深入到矿井去了解情况，发动群众。了解工人，和他们建立感情，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白天，我们在矿井和工人一同劳动；晚上，我们深入到工人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一段时间的接触，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淘金工人的同情。

淘砂金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淘金工人下到矿井，用摇钻工作，收工时工人把砂金背上来，再用水淘洗砂子，沉淀的砂金，由监工收在盒子里上锁，交到金矿局。

为了了解工人的工作情况，我们亲自下到矿井去体验生活。井下空气稀薄、潮湿，几盏煤油灯，发出昏暗的光。水滴从坑道顶棚的裂缝中滴下来，地上到处都是积水。工人们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衣，脚上穿着破旧的胶鞋，有的为坑道打木桩，有的用手摇钻钻矿砂。活儿最重的要算搬运工了，他们把钻下来的砂子，一筐筐地从井下背上来，淘洗工用水冲洗砂子。一年 360 天，工人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机械劳动着。

淘金工的生活条件之差更是难以设想，居住的房子四面透风，下雨漏水；每天的食量是按所交砂金数量的多少来分配的，一些劳动能力差的淘金工很难以此养家糊口。

记者：请具体谈谈您在沙河托马金矿场做的工作。

王一：我和任岳同志工作的金矿是沙河大门金矿。这里的工人文盲多，所以我们从扫盲开始，工作的难度非常大，又没有必要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用品。为了争取一点文化、娱乐经费，任岳同志不知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精力，经常同矿局的总管争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总算争取了一点经费，不足的部分就用我们的工资补贴。首先，我们利用一间小会议室办起了识字班，并买了一些书刊，供工人业余时间阅览。后来，我们组织起工人俱乐部，我和任岳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一起，组织了一场话剧演出，这次演出轰动了整个金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个人烟稀少、

文化落后的山沟里，为疲惫不堪、身心憔悴的工人，做一些精神生活的补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值得一提的是，工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同样令人难忘。当时，我和任岳正处于候补党员考验阶段。按照苏共党章规定，候补党员转正时要有5个介绍人，其中2人必须具有10年以上党龄。由于我们与工人关系密切，群众关系好，所以在支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不久，我俩在区委领到了正式的联共党证。

**记者：**您当年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流放西伯利亚，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您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全身心地为党工作，这的确需要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和自我奉献精神，十分值得钦敬。那些和您一同流放的人，你们是否还有来往？他们的境遇如何？

**王一：**我们在金矿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有些中大的同学从其他金矿和边疆来看望我们，大家在一起交流心得、商量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分在不同金矿工作的中大同学很多，比较熟悉的有秋茨卡也夫、加深、阿其可夫、马特维也夫、列日略夫等。他们其实都是中国同胞，和我一样，在进中大学习时起了俄文名字。他们所在的工厂，都属于斯列金斯克市，行政属伊尔库茨克边疆金矿总局领导。由于大家的境遇心情都差不多，所以能够互相帮助彼此照应。秋茨卡也夫调到伊尔库茨克矿务总局任职以后，利用培训的名义，把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学陆续调到伊尔库茨克，分配到各个机关任东方工人指导员。不过，大家的生活都很艰难。秋茨卡也夫同一个苏联妇女结了婚，生有一子一女，还要赡养岳母，一个人工资维持五口之家，生活很艰苦。马特维也夫也是同一个苏联妇女结了婚，妻子没有文化，他自己在广播电台工作，参加金矿业余学院函授班学习。妻子生下儿子后，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到工厂去干零活，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只好独自关在家中，屋里放点硬面包和水，饿了自己啃着吃，困了就倒在地板上睡。天真可爱的孩子被折磨得傻呼呼的，完全失掉了儿童的稚气。列日略夫从财经学院毕业后，

在 1936—1938 年的大清洗中受到迫害，在苏联北方流放了 10 年……

**记者：**您和任岳调到伊尔库茨克后担任什么工作？

**王一：**比较起来，我和任岳的生活条件是最好的。任岳在边疆党部任东方工人指导员，我开始任训练班主任兼教员，后来到中文《突击报》工作，报社总共有 4 个工作人员，其中也有苏联人，大家在工作中结成了朋友，互相帮助和支持，亲密无间。1931 年 10 月，我和任岳的女儿出世了，我们给她起的俄文名字意思为“十月”，以寄托我们的理想，直到现在女儿用的还是这个名字。

过了一段时间，任岳和我被派到赤塔工作，同去的还有张逸凡、阿列也夫和妻子赵玉蓉。后来又通知我们到莫斯科另行分配工作。在莫斯科，我们被安置在不同的旅社里，等了一个月。一切安排妥贴后，组织上通知我们到新疆工作。能够回祖国去，我们真是喜出望外。虽然我们当时只知道新疆是中国的地方，其他一概不知。

**记者：**苏联政府为什么要派你们到新疆工作呢？同去的还有哪些人？

**王一：**盛世才当上了新疆的统治者后，一心想脱离国民党中央的统治。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又与苏联有较长的交界，盛世才深知只有投靠苏联才能稳住政权，于是亲赴莫斯科晋谒斯大林，要求给予各方面的援助。斯大林答应给新疆以经济、武器和人才的支援，我们这些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去新疆的。1935 年春天，我们得到立即去新疆工作的通知，组织上告诫我们不要在社会上公开暴露苏联籍华人的身分，一律声称是由上海经苏联来新疆的。任岳化名刘贤臣，我化名高秀影。同行的有张逸凡（化名万献廷）、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稽直、郑一俊和赵玉蓉等 25 人。这些人都是中大的学生，联共党员。

**记者：**既然盛世才打出“反帝亲苏”旗号、宣布“六大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势必对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存有戒心。

加上他实行法西斯统治、多疑残暴的个性，一定使你们在新疆的工作难以开展，而且处境十分危险。

王一：的确是这样。开始时盛世才还把我们安排在较重要的岗位上。他知道张义吾（早在1930年他就被联共派往新疆了）是学炮兵的，就把他分配到军队当炮兵营长，并把夫人的干女儿嫁给他为妻。后来又委任张义吾为新疆省公安管理处（后改为保安总局）处长，任岳为副处长。盛世才把公安处抓在手里，一切国内外的情报都要亲自向他汇报，当然张义吾和任岳也要向苏联领事馆汇报。久而久之，便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为了监视张、任的行动，盛世才在苏联领事馆对面开了一个小卖部，特务们随时监视着公安处与苏联领事馆的一切活动。不久，有人诬告张义吾、任岳阴谋杀害盛世才，盛世才便撤了他俩的职，把他们送回莫斯科受审。

我被分配到新疆女子学校，担任小学部主任兼任师范部的物理教员。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是女子学校校长，掌管着学校行政和教务大权。为了配合她丈夫的政治统治，她提出重新编写教材。教育厅长工作能力差，就选举我当教育会的主席，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我团结了从内地四面八方来新疆的教育界同仁，改编了适合新疆多民族地区特点的教材。我还在学生中组织演讲会，以扩大新教材的影响。不久，就有人扯我的后腿，说我煽动民族情绪，不符合盛世才的三民主义和“六大政策”。其实，盛世才只是口头上服从国民党和信仰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在新疆搞独立王国。在他的独裁统治下，我们开展工作步履维艰。早在1930年和张义吾等人一同来到新疆的竺清旦，是大革命时期浙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我在武汉的老相识。有一次他到督署开会，被盛世才开枪杀害了。当时大家真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

记者：这种白色恐怖气氛后来有所缓解吗？

王一：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演越烈。1937年，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延安路过新疆时，盛世才把我们25人的照片拿给王明认，王明当即诬指俞秀松等人是托派。盛世才为了讨好斯大林，陆续将

这 25 名联共党员撤职、逮捕,先后送回苏联审讯。稽直原任新疆交通处长,后因帮助苏联同延安通电通邮而被撤职。郑一俊先当县长,后到南疆任行政长,1938 年被捕入狱。担任新疆日报社社长的张逸凡先被贬到喀什当行政长,后调回迪化被捕入狱,被判刑 10 年,流放到列宁格勒北边的沃尔库塔严寒地带服苦役,这鬼地方在北极圈里,半年白天,半年黑夜,张逸凡的工作是照管停尸房。俞秀松原是新疆学院院长,兼任全疆反帝会秘书长,又是盛世才的妹夫,但同样难逃厄运,和张逸凡同机押回莫斯科受审,在严刑拷打下惨死狱中(我们党已于 1962 年为俞秀松烈士平反昭雪)。张义吾和任岳的罪名是阴谋杀害盛世才,我和他们一起于 1937 年被送回莫斯科受审。想当初,我们满怀喜悦投身报效祖国,万没想到,时隔两年,竟是这样的结局。

记者:您这一代共产党人在异域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经历的坎坷太多了,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37 年正值苏联肃反高潮,在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大清洗运动中,你们远在新疆尚且难逃厄运,如今回到莫斯科,等待你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王一:是长达八个月的秘密审查。查来查去,实在查不出我们有什么重大错误,我们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又不允许,审查结束后,通知我们重回伊尔库茨克。

记者:张义吾也回伊市了吗?

王一:没有。对他的审查半年以后结束,诬告罪名被澄清,苏联当局派他去外蒙古工作。当时外蒙古是从苏联到延安的重要通道,中山大学的学生回国大都是经过蒙古辗转与中共取得联系的。张义吾到外蒙古工作后,为很多领导同志顺利到达延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他先去大连工作两年,又到东南亚,最后落脚天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苏联特务受到残酷迫害,本来患有心脏病,这时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直到 1987 年去世。

记者:您和任岳重返伊尔库茨克后,是否见到了昔日中大的老同学?

王一：过去并肩战斗的那些中大同学在肃反运动中都被清洗干净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阿其可夫的家，男主人失踪了，只有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生活。没过多久，女主人也失踪了。两个孩子生活无着，只得卖掉家具，搬到莫斯科的姨妈家去。由于受不了姨妈的虐待，万般无奈重返伊城。秋茨卡也夫一连几个月不回家，他妻子去保安部门打听，才知道人已死在狱中了。马特维也夫从冶金学院毕业后，回原金矿当工程师。由于思国心切，一天，他驾着雪橇从冰冻的河上驶向黑龙江对岸，被边防军开枪打死了。看到、听到这些情景，我们成了惊弓之鸟。只能把回祖国的愿望，深深埋在心底，集中力量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

记者：伊市的有关部门没给你们安排工作吗？

王一：没有。重回伊尔库茨克实际上是再度流放。斯大林肃反时期，整个伊市经济萧条，到处是失业者，我们两个外国人，找工作谈何容易！只得先把一些日用品和衣物卖掉，勉强维持生活。后来，任岳总算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临时性工作，做食堂管理员。虽然工资低微，但毕竟有些收入。而我因为是女的，很难找到工作。我不甘心当家庭妇女，决定报考医学院，碰碰运气。

记者：您为什么要学医呢？这和您以往学习工作的内容大相径庭呀。

王一：这不过是我的谋生手段而已。当时正赶上医学院招生，伊市的有关当局为准备考医学院的青少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我参加了，努力学习数学、语文等入学考试科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1938年3月，我正式上了医学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负担更重了，莫斯科我女儿所在的幼儿园来电，幼儿园要关门，让我们把孩子接回。我们就把女儿接到伊市上小学。一家三口的生活负担，全压在任岳一人身上。他积劳成疾，患上了淋巴结核，后来发展到颈部溃疡。结核病的治疗离不开营养和休息，而我又因在医学院学习，分担不了他的重负，觉得十分内疚。1942年，我终于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被分配在安卡拉河对面一个



新建的医院工作。而这时，任岳的病情日益严重，被医生告之不能工作，定为三级残废，休养了一年多。这段时间，我便负担起全家的生活费用。

记者：以您和任岳的才学、能力，本来可以为党为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工作，苏联的肃反运动使你们丧失了这一机会。二度流落伊尔库茨克后，终日为生活奔波忙碌竟成了你们最大的困扰。

王一：不，这不是我们最大的困扰。其实人的生存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况且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最令我们困扰和恼火的，是我们的党证问题。由于我们的党证被留在莫斯科，伊市的党组织不承认我俩是党员。而在基层报到填表时，有些情况需要保密，不能如实填写，没有党证，又不能说是非党员，真是左右为难。后来，我们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反映我们的处境和要求。经过不厌其烦的申诉，总算有了一个奇怪的答复，我们可以到基层党组织领一个候补党证。真令人哭笑不得。我1928年就是候补党员，还有，在金矿场的党员转正算不算数呢？任岳同志，是在加入共产党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加入国民党的，由于这层关系，他必须有两个10年党龄以上和三个普通党员作介绍人才能转正，而我则需有两个十月革命前入党和三个10年以上党龄的介绍人。幸亏当时我在学习，结识了很多苏联朋友。我找到两个十月革命前入党并已退休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做我的介绍人。经过两年的准备，各党委的层层审批，我和任岳坐了5天5夜火车到莫斯科，得到联共中央批准，拿到了正式党员的党证。

记者：您和任岳在伊市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们是否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王一：参加了。我因为学医，就参加了救护伤员的工作。战争胜利后，苏联政府向所有保卫苏维埃的人颁发“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功”奖章，我们夫妇每人都获得一枚。

记者：您是哪一年回国的？

王一：1952年。在飘流异乡的25年中，回祖国参加革命和建

设始终是我们最大的心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立即去莫斯科提出申请，有关部门说我俩是苏联公民，不能直接找中国大使馆联系，只能听候批复。两年后，我们再去莫斯科，找红十字会办理了侨民回国手续。为了自筹回国路费，我们兑换了所有的公债，变卖家用什物，怀着无法形容的激动心情，回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的心脏——北京。

**记者：**您的女儿也一同回国了吗？

**王一：**没有。她当时还在苏联上大学。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医院做医师兼任耳鼻喉科主任。不久，组织上派我护送一位副部长到苏联治病。任务完成后，我把女儿带回国来。她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地图系测绘专业，回国后分配到测绘总局研究所。后来，组织上送她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她与同班的一位印尼留学生苏巴尔曼相爱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当时，印尼局势动荡不定，身为印尼共产党员的苏巴尔曼在一次回国中惨遭杀害。“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迫害，女儿也饱受精神折磨，回国17年的女儿晶晔（她的名字就是日日思念中华的意思），不得不离开祖国回苏联去了。

**记者：**您在异乡飘泊的25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伊尔库茨克度过的。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伊尔库茨克在贝加尔湖之滨，正是汉代苏武牧羊的北海。当年苏武“苦忍十九年，牧羊北海边，渴饮雪，饥吞毡……”而您竟比苏武还多坚持了6年。苏武“留胡节不辱”，您的革命信念也从未动摇。以您的坎坷经历，需要有比苏武更坚定的意志和信心。与此同时，那些和您们一同到苏联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已经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业绩。相比之下，您是否觉得失去的太多呢？

**王一：**我当年到中山大学学习，是为了追寻革命真理，从没考虑过个人得失。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磨难和不公正对待时，我们也感到心情压抑苦涩，但是，对祖国刻骨铭心的思念使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不甘沉沦。再说，和那些冤死的同志相比，我和任岳的境遇还算是最好的。后来能够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看到亲爱的祖国日益繁

荣富强,我们倍感欣慰。回首往事,想到自己没有虚度此生,能够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 金融建设

张 晓 军

## 一、晋察冀边区金融建设的历史背景

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城隆重开幕。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选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晋察冀边区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区,拥有36个县的民主政权,人口1000万<sup>①</sup>。有了政权、辖区和人口,便为边区的金融建设提供了现实条件。

晋察冀边区建立以后,在财政方面,由原来在合理负担原则下各自筹款筹粮,依靠政治动员或打土豪、分田地等办法,改为统筹统支制度。具体措施是:停止县合理负担,试行村合理负担,适当恢复田赋制度,发行救国公债,多征收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卷烟特税、外货入境税、印花税、营业税等六种税收。但是,要保证抗战的需要,仅靠上述税赋及发行公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边区已取得了局部合法政权的前提下,建立边区银行,以军事发行来支持抗战,便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此外,国民党政府早在1935年11月实行过币制改革,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废除

<sup>①</sup> 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2页。

银本位,以图统一全国货币。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割据,经济上也是“诸侯割据”,各霸一方。法币并没有独占市场,形形色色的土钞、杂钞依然在流通领域中使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省有省钞,县有县钞,而那些有权势的钱庄、银行乃至商号、货栈、当铺、酒店也都发行了流通券,数额多少不等,多的竟达几百万。金融混乱之状况,严重阻塞了商品的流通,影响了边区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给边区筹款筹粮、组织军需造成很大的障碍,危及着抗战救亡事业。因此,建立边区银行,统一货币市场,已提上了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

## 二、边区金融建设的内容和历史进程

### 1、边区银行的成立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边区为统制与建设经济得设立银行发行钞票决议案》,决定整顿金融货币市场,建立并发展信用制度。

经过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的精心筹划,晋察冀边区银行于1938年3月20日诞生了,行址设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村晋济寺。关学文被任命为经理,胡作宾为副经理,吕东为造币厂厂长。边区银行成立的当天便发行了边区货币。边区银行的成立与边币之发行,标志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边区银行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边区银行成立之时,“只有一个总行,下属机构都没有,职工和印刷工人总共只有20余人”<sup>①</sup>。边区银行成立之初是一无资金,二无设备,八方筹措得资金十余万元<sup>②</sup>。印钞票没有印刷机器,是采用石印。没有印钞票的纸

---

① 石雷:《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生活片断》,载《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②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8页。

张,就想方设法,冲破层层封锁从敌占区运来。

边区银行成立以后,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了分支机构。银行组织系统的设置是:总行——分行——支行(或办事处)——营业所、代办所——兑换所——派出所。总行设在边区政府所在地。冀中、冀晋、冀热辽各设分行,为该地之管辖行。最先设立代办所的县有唐县、五台、平山、阜平、灵丘等。总行与分行,分行与办事处实行垂直领导,总体的业务方针、工作部署由总行制定,但分行等下属机构又有工作的灵活性、机动性。

边区银行不论在组织机构上,还是在本身业务上,又与边区政府紧密相联,并接受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边区银行总行第一届党支部于1939年11月在阜平县麻棚村正式成立,支部书记武子文,副书记李一平。边区银行与政府是两个不同的职能部门,在抗战期间,两者的关系如何处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41年6月在《关于政府与银行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银行的各分行、办事处、代办所,除受上级银行的领导外,并受同级政府领导。同时还规定了银行的办事处、营业所的设置与撤消,一律由边委会批准。这就明确了边区政府与边区银行的关系,从而保证了各项制度、政令在全边区范围内的统一。

金融建设包括银行的建立和各项业务的开展,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边区银行担负着推行边区货币金融政策的艰巨任务:统制金融,提高边币的信用;调剂金融,流通资金;开展经济,办理贷款及投资;保存金融势力,吸收保存金银、硬币、法币。它的日常业务包括储蓄、汇兑、贷款和兑换。存款的活期利息为三厘,定期为五厘。边区银行汇兑规定从20元起汇,汇费为1%,千元以上收5%<sup>①</sup>。在晋察冀边区境内可以通存通汇,冀中、冀南以及其他游击区,银行委托游击队代办。边区银行各项业务的开展,方便了人民生活,有利于边区生产事业的发展。

---

<sup>①</sup> 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第67页。

边区银行还代行金库的使命。金库亦称国库，它是经营国家财政收支的机构，国家财政收入，全部纳入金库，国家的支出亦由金库拨付，或由国家银行代理。边区银行成立不久，就有办理各级金库暂时章程的制度，金库负责边区公款及地方款的保管和支付。边区金库制度的建立，更好地发挥了银行的监督作用，边区的财务收支也更加制度化，财政金融制度日臻完善。

## 2、边币的发行

边币的发行是以粮食、棉花和法币作法定准备金的。1938年3月20日，边区银行成立的当日即发行了边币，票面额有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数种。1940年又发行了十元的钞票。钞票的印工与图案设计十分精美。边币的发行和使用范围很广，除平北、冀东外，在边区70多个县里流通<sup>①</sup>。各县的银行或代办所都担负起了“推行边币”、“维持边币价值”、“吸收法币”、“破坏敌人金融”的任务，使边币的发行得以顺利进行，边币阵地不断扩大。

边币发行的基本方针是：

第一，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1942年12月，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sup>②</sup>金融建设作为财经工作的重要一环，认真贯彻了这个总方针。通过货币的发行，大力扶持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解决军队和工作人员的供给问题。

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生产是农业，而发放低息贷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政策。从前，农村中的贷款主要是高利贷，其盘剥程度是严重的。而边区银行为农民提供了资金依赖，发放低息农贷，提高了我党的威信，使广大农民有了金融安全感。农业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耕牛、农具、肥料等。农业贷款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银行贷款对纺织、缝纫、造纸、

<sup>①</sup> 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第71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印刷、炼铁、采煤等工业和手工业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农业和工商各业的发展,使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物价自然回落,促进了货币物价的稳定,同时使贷款得到及时回收,银行存款增加,盘活了货币流通。

第二,坚持稳定通货、有计划的发行方针。

首先,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把握边币发行的“饱和点”,发行适当数目的货币。边币的发行额,受到流通领域商品价格总额的制约,如果货币发行量超过市场流通的需要,币值就要下降,物价就要上涨。因此,要保持通货的稳定,必须根据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发行。当战争不断进行时,根据地时常扩大或缩小。扩大时,增发货币,以满足流通的需要;缩小时,回笼货币,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变化,秋后大量农副产品上市时,增发货币,防止物价下落;春荒时,出售库存物资,防止物价上涨。其次,货币发行,要掌握一定数量的重要物资(主要有粮食和棉花)作为发行的主要保证。掌握物资,调节供求,能有效地平抑物价。

第三,独立自主和独占的发行方针。

根据地的货币实行独占的发行方针,只准许流通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其他一切土杂钞、法币、伪联币、伪储币以及各种金属货币(主要有银币、铜币),都不准自由流通。为了逐步巩固边币的信用与地位,需要联合在金融上势力最大的法币以打击杂钞。因此,规定边币以法币作基础,边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一比一。严禁奸商私运法币、现银出境,禁止伪钞入境或流通。以上措施是以武力为后盾,依靠边区政权作保证,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动员群众来执行的。

### 3、货币市场的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存在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国民党统治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敌占区殖民地经济。流通着三种不同的货币,即边币、法币和伪币。三个经济体系、三种不同的货币同时存在,且流通在晋察冀三



省的各地市场上,形成了相互角逐的局面。

当时,晋察冀边区边、法币同时流通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主要缘于下列因素:

第一,外来法币直接输入边区。如国际援助、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各界的募捐、工作人员的汇款、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等。

第二,外来商品的输入。由于边区经济力量薄弱,生产不能自给,需要从边区外输入大量的商品才能满足基本需要。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用法币到国统区购买商品到边区销售,如果他销售所得不是法币而是边币,纵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但也不能再去国统区购进新的货物。为了实现下一个资金周转,他必须把边币兑换成法币,或要求销售的货物用法币支付。

第三,边区与国统区有犬牙交错的边界,约占边区40%的地区的人民生活与国统区经济紧密联系,许多边界地区又没有集市,90%的输入和输出都要到国统区去进行<sup>①</sup>。在那里,法币是唯一的交换媒介。

当时要想使边币独占市场也是困难重重。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推行其所谓的战时财政,实行法币膨胀政策,对边区经济建设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一,影响边币的稳定。

边、法币的同时流通,造成边区货币市场的紊乱。两者相比,法币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法币流通时间长,流通范围是全国性的。另一方面,由于边区靠银行的军事发行来筹措大部分的财政经费,加之进出口贸易的人超,对法币的需要量多,因而法币价高,边币的币值呈波动的下跌趋势,损害了边币的信誉。

第二,加速边区物价上涨。

在边、法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下,每当国统区的商品大量涌入边

---

<sup>①</sup> 王思华:《再论如何稳定目前金融》,1944年1月5日,《摘编》第286页。

区之后,对法币的需求量增大,边币币值随之下跌。边币比值价格一下跌,进口商品的价格便上涨,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了。

### 第三,影响边区生产的发展。

抗战期间,边区生产不能自给,许多必需品要靠外边进口。而边区工农业生产都因商业高额利润的存在而受到严重影响。经营商业的公私商店,利用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的经济条件和边、法币比价之差额,从事货币和商品的转买转卖,从中牟利。商业利润要比同期工业利润高出许多,因此,投资工业方面的资金必然向商业方面转移。在农村,有余钱的农民也不愿追加农业投入而愿意作买卖。这样势必影响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第四,增加财政困难。

抗战期间,边区财政除了征税、发行救国公债、收公粮、义务运盐之外,主要还借助于银行的军事发行。但由于法币在边区内流通,边币受到一定的排挤而缩小流通范围,造成边币币值下降,财政出现赤字。

综上所述,统一边区金融货币市场已势在必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循序渐进地、逐步统一边区金融货币市场。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逐步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基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边区政府对法币分阶段、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阶段,边区银行成立之初,允许法币在边区市面上流通。第二阶段,从1938年6月到1941年1月,对法币采取保护政策,允许私人保存,但禁止法币在市面上流通,交易前必须到边区银行兑换成边币。第三阶段,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采取排斥政策:

其次,清除各种土杂钞。这项工作自1938年6月开始,至1940年初完成。察钞是以十余万元的边币予以回收,晋钞是分阶段予以肃清,对于冀钞和各种杂钞,分阶段予以贬值,然后兑换成边币。

再次,打击伪钞。边区政府对于携带伪钞入境者,一经查出,除

没收钱票外,并以汉奸论罪,使敌人的阴谋一个个破产,使伪钞在边区毫无市场。对伪钞的斗争,不仅在根据地内全面、深入开展,而且深入到了敌占区。边区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以自己所掌握的粮食等物资,动摇敌占区伪币的信用,造成物价暴涨,引起市场恐慌。时值1939年华北发生大水灾,粮食欠收,边区政府严格禁止粮食外运,并且杜绝了敌人用各种方式和渠道来边区套购粮食。敌占区粮食奇缺,人们拿钱买不到粮食。1940年春,以伪钞为领导的物价,如脱缰之马,敌伪经济陷于严重危机。边区货币市场的统一,稳定和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三、边区金融与根据地的发展

#### 1、金融建设与改良人民生活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会议”上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并在“建政”项下规定了自力更生的财经工作方针。在经济上提出了从长远着眼,爱惜民力,增加对工农业和农村副业生产的投资。

晋察冀边区银行每年都要发放大量贷款,支持工农业和农村副业生产以及商业、合作事业。1939年即有商业贷款2776883元,1940年除商业贷款2397792元外,增加了合作贷款28430800元,比商业贷款多11倍。1941年又增加了生产性贷款14575000元,1942年工业放款为2214339元,农业放款2214339元,救灾放款1550000元<sup>①</sup>。合作贷款中,因各地需求不一,用途也各异,冀西主要用于运销合作,冀中着重于生产合作。边区银行的贷款利息很

<sup>①</sup> 《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6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

低,月息仅四厘,而同期国统区和敌占区一般高达一分二厘<sup>①</sup>。

经过边区银行的大力支持,边区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自救取得可喜成果。历史上一向依靠进口的香烟、肥皂、洋油等日用品和一切奢侈品,在市场上基本都不见了。边区军民自己生产的香烟、肥皂等日用工业品足够全边区党政军民自给有余,还有部分出口。

“边币在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军事胜利,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展边区的生产和商品流通,改善人民生活中充分行使了它的价值尺度、支付、流通和储藏的功能。”边币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就是用边币可以表现出各种商品的价值,边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是衡量商品价值或对商品进行估价时发挥作用的。每一单位的边币代表着社会商品价值中相应的具体部分。边币作为流通手段是边币对商品流通发挥媒介作用的职能。边区商品交换仍然是采取商品——货币——商品的形式;边币还发挥着支付的职能,人们在领取薪水、接受劳动报酬,部队干部、战士接受生活津贴以及人们交纳房租等各种费用时,边币即充当支付手段;边币有时还退出流通领域发挥着贮藏的职能。边币在两个方面发挥着这一职能:一是边币的信用可靠,币值稳定,人民乐意把边币作为家庭财富保存下来。二是人们在边区银行的储蓄存款。

边区一切经济建设和对敌伪的经济斗争,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其组织性与计划性,就在于边区建立了健全的金融机构——边区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统一了边区货币市场。边区货币随着商品的流转而深入到了每一个经济组织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货币也就对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起着影响和作用。边区金融建设推动了整个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的发展,保障了人民生活,促进了边区社会生活的稳定。

## 2、金融建设与支援抗战

<sup>①</sup> 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第68页。

边区银行的军事发行,有力地支援了八年抗战。当时,边区的财政收入,除粮食收入能够自给外,现金收入是很少的。边区所需军政经费,主要是靠边区银行的军事发行来筹措的。根据地创建初期的1938年到1940年间,各年财政经费支出中(货币部分)有70%—90%是靠银行的军事发行来解决的。1941年边区开征了统一累进税,情况好了一些。1941年到1943年边区财政经费支出中,仍有40%—50%依赖于军事发行。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财政支出增加,当年财政经费支出中,军事发行又回升到62%。1945年更增加到70%以上<sup>①</sup>。边区银行的军事发行,是边区政府在特定的战时历史条件下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特殊手段,它有效地动员、组织了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 3、金融建设与巩固边区民主政权

金融建设的各项成就巩固了边区的民主政权。边币的发行与边区货币市场的统一,恢复了边区内的经济联系,经济的统一又促使政治的统一得到加强,使各阶层的人民更加拥护抗日的边区政府,边币所到之处,就体现着党和人民武装的力量之存在,巩固了抗日的根据地。

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自1940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减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减租为25%),取消了一切正租以外的诸如杂租、小租等额外附加的超经济剥削。利息减至社会信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实行分半减息(即年息减为二分五厘),废除了高利贷剥削。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保存地主、债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对富农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因而团结了一切能够抗日的力量,扩大

<sup>①</sup>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边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

#### 四、晋察冀边区金融建设的基本经验

第一，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利用政治的力量，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首先，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一方面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普遍的“与众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政策执行人员以及有关人员的信心。例如，边币发行之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深入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反复强调，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也是保卫人民自己身家性命的一个基本条件，经过宣传，边区人民认识到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是“抗日票子”，他们以拥护团结抗战的热情来拥护代表他们利益的“抗日票子”。

其次，是充分运用政权的强制力来予以保证。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了金融建设这一活动，边币发行之后，边币在边区内法定流通。同时，边区政府明令禁止法币的流通，清除各种土杂钞，打击伪钞，统一边区金融货币市场以及对于走私货币、伪造边币、扰乱金融者予以严厉制裁或以汉奸论罪等等，都是依靠边区政府政权的强制力来保证实行的。

再次，是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边区金融建设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总的政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策略和措施，如减租减息政策、统一货币市场、对敌进行货币斗争、实行对内贸易自由、对外贸易管理、适时适度组织货币投放与回笼等等，都是经过认真、反复调查研究制定出来的，并且通过试点示范、逐步推广实施，实践证明这是切实可行的。

第二，在保证政治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边区的金融货币市场保持着稳步的发展。稳定币值的前提是掌握货币发行规律，使市场货币实际流通量与市场

货币实际需要量基本相符。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经济手段来控制货币流通量：

首先，适时适度组织货币投放与回笼。边币的发行，主要是以物资作保证的。因此，货币的发行与生产和物资的储备结合非常紧密。毛泽东说过：“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sup>①</sup>边区银行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注意货币与物价的变化情况，掌握货币的发行工作。发行边币，掌握物资储备，再通过生产、贸易支持财政，保障抗战的物资供应和人民生活需要。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结果，积累了雄厚的物资，这些物资又成为支持边币、巩固边币和稳定币值的牢固基础，使边区货币物价基本平衡，未出现大的起落。

其次，实现对内贸易自由，对外贸易管理的政策。这里所讲的“对外贸易”是根据地内外之贸易。对外贸易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有利的交换，即以边区不大需要的物资，换回敌占区重要的物资，特别是边区紧缺的物资。并且争取一个有利的进出口价格，即高价输出，低价输入。对外贸易管理的原则和办法，是按照商品的类别、根据敌我不同的需要程度，分别实行限制、奖励或禁止输入、输出的政策。对内贸易自由，就是通过公私商在内地的正常贸易往来，商业交易，搞活流通，调剂供求，稳定物价，方便人民生活，发展边区生产。鼓励输出，限制输入，保持对外贸易和财政收支的平衡，是平抑物价，稳定金融的主要经济杠杆。

第三，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巩固边币阵地，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阵地斗争就是与敌人争夺货币流通阵地，亦即流通领域的斗争。一般说来，根据地扩大，流通领域也随之扩大；根据地缩小，流通领域也随之缩小。但是，争夺货币流通阵地之关键还在于货币发行管理工作与政治、军事斗争密切配合，该进则进，该退即退，机动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灵活,运用自如。每当根据地扩大时,商业贸易和银行等有关部门即迅速行动起来,排挤驱逐敌币,建立和扩大本位币市场。反之,如果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暂时不利,我军需主动转移阵地或组织战略退却,所引起的根据地的缩小,这时亦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把积存的商品物资和有关后备力量组织抛售,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保持边币的信用,防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阻止或延缓敌币的猛烈扩张。

比价斗争,就是稳定、提高本位币币值,打击、压低敌伪币币值所进行的斗争。衡量敌我两种货币币值的主要标志是敌我两种货币购买力的高低(即敌我两区物价之高低)和进出口贸易状况及由此所引起的货币供求状况。对敌进行货币比价斗争,主要是由当地银行紧密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出口贸易部门,及时掌握各种经济情况,根据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和敌我两区物价的变化,适时地、恰当地调整敌我货币比价。

反假币斗争是边区对日伪货币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日伪曾大量制造假法币和假边币,以此扰乱边区金融阵地。边区政府于1940年8月3日发布了“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附有真假法、本币鉴别表、样张及说明书。通令规定,对滥用假币的,如果系有意破坏,就严加惩处;如果是无知受骗,将假币没收。经过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使敌人以假乱真、扰乱边区金融的阴谋宣告破产。

晋察冀边区的金融建设是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并在战火中发展壮大起来。它是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巨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党早期财政工作的一个伟大尝试和成功的典范,为我党由战时的经济转向和平时期建设的经济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为以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金融人才。边区金融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特别是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今天仍值得我们财经工作借鉴。



#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农业税征收情况

李 成 瑞

解放战争中,依靠“农援”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依靠“美援”的国民党反动派。这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财经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本文打算根据有关资料作一概括的回顾。主要说解放区农民在财粮方面的负担和贡献,同时,简要地谈到农民在战争勤务方面的负担和贡献。

## 一、尖锐的矛盾与解决的方针

早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存在着保障战争供给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负担能力之间的矛盾。但当时主要是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战争,军队人数较少,后勤保障的要求比较低。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为了完成“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军队人数必须大大增加,军队的装备和后勤保障水平必须大大提高,因而,使保障战争供给与根据地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负担能力之间的矛盾大大地尖锐化了。请看北方五个解放区从1945年8月至1947年年底负担的脱离生产人数(其中2/3至3/4为军队人员,其余为地方党政人员)变化的情况<sup>①</sup>。

---

<sup>①</sup> 本文第一节所引用的资料,除另有注明者外,均引自中共中央财经部1948年6月整理的《财政收支与人民负担》。

表 1 北方五个解放区负担的脱产人数(1945- 1947)

单位:万人

	合 计	晋冀鲁豫	晋察冀	山 东	晋 绥	陕甘宁
日本投降前夕 (1945年8月)	90	30	19	25	4.5	11.3
1946年上半年	138.5	45	30.8	45	9	8.7
1947年上半年最多时	202.5	55	30.8	90多	12	15
1947年12月战略进攻后	160	31.26	31.6	70.3	26.9	

从表 1 看出:日本投降前夕,表列五个解放区脱离生产人员不过 90 万人,约占当时解放区总人口 6000 万人的 1.5%。1946 年 3 月增加到 138.5 万人,比日本投降前夕增加 53.9%;最多时达 202.5 万人,比日本投降前夕增加 125%,占当时总人口的 2.53%。1947 年夏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北方五个解放区脱离生产人员减至 160 万,但比日本投降前夕高出 77.8%,占总人口 8000 万人的 2%。这是按总人口计算的,如果按负担人口(负担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80%,因为一部分敌我交错的地区要两三个人折合一个负担人口),则 1947 年 12 月脱离生产人员的比例要达 2.5%。

问题还不止此。解放战争时期每个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标准比之抗日战争时期不能不作较大的提高。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1942 年、1943 年,每个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标准折合小米 7 石(每石小米 160 市斤);日本投降后的 1946 年增加到 14 石,1947 年实增加到 28 石。这就是说,解放战争时期的供给标准比抗日战争时期增加了三倍。

支持这样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主要依靠解放区农民缴纳的农业税(有的叫公粮、土地税、田赋)。当时农业税收占解放区财政收入的比重,晋冀鲁豫为 74.9%(1947)、79.8%(1948),晋察冀占 76%(1948),晋绥占 73.2%(1947),山东占 50%至 66%。这些解

放区除解放战争后期外,只拥有一些小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而这些城市在战乱中经济萧条,征税有限。只有东北因拥有若干较大城市,农业税比重较低,但仍占39.7%(1947)、41.8%(1948)<sup>①</sup>。当时的农业税,以粮食缴纳的部分约占70%—80%,其余部分以棉花、油料、饲草或现金缴纳。

当时解放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是很低的。据1947年典型调查估算,华北解放区每个农民平均收入折合小米2.5石(400市斤),西北解放区每个农民平均收入折合小米2石(320市斤)。

怎样解决战争需要与经济条件之间尖锐的矛盾呢?中共中央制定了如下的正确方针,在各解放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第一是坚决彻底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从这以后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土地法大纲》之后,进一步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之后,踊跃参军入伍,缴粮纳税,使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第二是开展大生产运动。重点是增产粮食,同时鼓励种植棉花、蓝靛,奖励农民纺织织布。为了提高生产力,各解放区帮助农民以互助组等形式组织起来,生产发家;发放大量贷款,帮助农民解决资金困难;兴修水利,并且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1948年山东解放区粮食产量为119.8亿斤,比1946年增加18.9%;东北解放区粮食产量1159.7万吨,比1946年增加66.4%。虽然,这中间有解放区面积扩大的因素,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占主要地位。这一年解放区人口扩大到18720万人,耕地68981万亩,共产粮833.6亿斤(原粮),产皮棉5.1亿斤,每人平均粮食445斤,棉花2.7斤。各

---

<sup>①</sup> 东北的数字引自《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795页。

解放区粮棉产量如表 I ①。

表 I 各解放区 1948 年粮棉产量

单位:万市斤

解放区名称	粮食产量(原粮)	棉花产量(皮棉)
华北解放区	1979331	17200
山东解放区	1198000	8000
东北解放区	2374132	430
西北解放区	27400	3000
苏皖解放区	510000	11700
中原解放区	1518375	10000
冀察热辽解放区	482909	1200
合 计	8336747	51530

第三是从取之于民、取之于己、取之于敌多方面筹集财粮及其他物资。取之于民,主要是农民缴纳的农业税。此外,在城镇中开征了各种工商税,包括营业税、烟酒税、契税、进出境货物税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工商税收的比重逐步增长。取之于己,主要是部队进行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运输事业。取之于敌,即从战争缴获来解决武器装备和财粮供给上的困难。例如,1947年晋南战役的胜利,就缴获子弹 180 万发及其他武器多件,粮食 3 万石,食盐 15 万斤,棉花 20 万斤。在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之后,取之于敌的部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缴获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壮了解放军。

第四是精简节约,一切为了前线。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提出:精减地方人员,充实部队,军队在脱离生产人员中至少应占 3/4,

① 引自中共中央财经部 1949 年 6 月编印:《全国粮食及各种特产历年产量统计》。

地方党政人员不得超过 1/4；全部财政开支中，军费应占 85% 以上，地方经费不得超过 15%；在军队中，精减后方机关，充实前线；地方机关中，精减勤杂人员；尽量减少民兵民伕开支。同时提出严格财粮管理制度，反对任何浪费现象；供给标准，军队高于地方，前方高于后方，野战军高于地方军。

## 二、农业税的征收政策

### 第一，关于军民兼顾的原则。

军民兼顾，就是财力物力的动员，即要保证战争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民的负担能力。1947 年的华北财经会议，提出三个控制比例：(1) 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 15%—20%；(2) 养兵需要，可能达到人口的 1%—1.5%；(3) 一个士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 16 石左右。这三个比例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负担水平、供给水平控制在这几个比例之内，战争需要可以基本满足，也不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1947 年根据典型调查推算，华北地区每个农民每年收入约折合小米 400 市斤，按负担占其生产量的 15%—20% 计算，可负担 60 市斤至 80 市斤小米。农民剩余的 340—380 市斤小米（按男女老幼平均计算），可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当时一个士兵一年供给 16 石小米，是在竭力节约的原则下确定的。其中包括：每天粮食 1.5—2 市斤，油 5 钱，盐 5 钱，菜 1 斤，每月猪肉 1—2 斤，每年单衣 1—2 套，鞋子 4—6 双，棉衣 2 年 1 套。当然，这个供给标准比抗日时期是提高了。按照上述负担标准和供给标准，养兵数目大体可以达到总人口的 1%—1.5%。<sup>①</sup> 按照当时解放区 13000 万人口计

<sup>①</sup> 根据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财政收支与人民负担》所提供的详细材料，华北财经会议文件中所说每个士兵的生活水平约需 16 石（2560 市斤），是指吃饭穿衣，再加上军工、作战费用，每个士兵平均约需 9 石（1440 市斤），两项合计 25 石（4000 斤）。养兵占人口比例 1%—1.5% 是按 25 石计算的。

算,养兵可能达到 200 万人,而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可以增加兵员的数量。

### 第二,关于公平合理的原则。

1946 年 5 月“五·四”指示发布前,解放区继续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民主政府在征收农业税时仍沿用抗日时期的政策。“五·四”指示下达,特别是 1947 年 10 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土地改革逐步深入。随着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消灭,原来由地主富农缴纳的农业税,绝大部分就相应地转由农民来负担(由间接负担转为直接负担),这时主要是处理好中农与贫农之间的合理负担问题。1947 年土改高潮时,部分地区在分配农业税负担时,曾发生只由贫雇农小组决定,过分加重中农负担的偏向。毛泽东针对这样情况,于 1947 年 12 月指出,土地改革中要同时贯彻“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两项原则,并说:“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sup>①</sup>。任弼时于 1948 年 1 月的讲话中指出:“负担必须做到公平合理。例如公粮负担、支援前线以及其他种种人力、财力的动员等,绝对不能因为地主富农不能负担就通通加在中农身上去。这是中农最害怕的,也是不正确的。对贫雇农在负担上适当照顾是必要的,但也不能与中农相差太远,而且一切负担的分配,最后应在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上讨论通过。”<sup>②</sup>根据这些指示,调整了中农与贫农的负担。1948 年老解放区在土地平分完毕的基础上,普遍实行了农业税收制度的改革。除了极少数贫苦农民和无劳力的烈军属户口外,都负担了农业税的战争勤务,负担面(负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扩大到 95% 以上。

### 第三,关于支持和奖励生产的原则。

多数解放区在农业税征收中规定了这样一些奖励生产的办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51—1252 页。

<sup>②</sup>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4 页。

法：(1)农业税按土地的常年产量征收，不因勤劳增产而增加负担；(2)垦种生荒地或熟荒地在一定年限内免税，以鼓励农民扩大耕地面积；(3)为了解决军民穿衣问题，在缺棉地区规定种植棉花、蓝靛的，收入在一定年限内减税或免税；(4)农民利用农闲经营家庭副业的收入一般不征收农业税，以活跃农村经济；(5)规定了对兴修农田水利的优待；(6)针对当时战争勤务较重，农民不能养牲畜的情况，对养牲畜户规定了一定的优待。这些规定对于推动解放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第四，关于控制村款负担。

乡村政权为了解决本身的经费，需要向村民摊派一部分款项和粮食。这种负担是必要的。但如果管理不严，往往造成摊派数量过大。解放战争初期，许多地区管理放松，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农民负担加重。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针对这一情况，再次强调整顿村财政，节约开支。整顿的办法，主要是由民主政府统一规定开支标准，区公所加强管理，乡村自筹自支，按期结算账目，送上级审查并公之于众，村款的负担量要求做到每人每年不超过小米6市斤。经过整顿，大部分地区村款负担控制在相当于农业税征收额15%—20%之间。

### 三、农业税的征收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因解放时间先后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地区：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区，叫作老区；日本投降至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这两年解放的地区，叫作半老区；转入战略进攻以后解放的地区，叫作新区。这三类地区，由于民主政权建立的时间和群众工作基础不同，实施土地改革的时间不同，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和收入情况各异，农业税的征收制度也有所不同。

#### (一)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完成前的征收制度

先说1946年的情况。这时的解放区全部是老区、半老区。这一年刚刚着手进行土地改革。从整体上看，在秋收征粮时地主经济和旧式富农经济仍然存在。因此，各解放区基本上沿用了抗日战争末期的农业税征收制度。新建立起来的东北解放区也参照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制定了临时征收办法。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各解放区处于敌人的分割、封锁之中，各个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农业税的具体征收办法也多种多样。大体上有这样几类：(1)按资产、收入统一累进征收的，有晋绥边区、陕甘宁的延安等部分地区、晋察冀的大部分地区、晋冀鲁豫的大部分地区；(2)按土地产量(有的折成“标准亩”或“中亩”)累进计算的，有山东解放区、东北的合江省；(3)按田亩等级定额征收的，有苏中、苏北地区，东北的松江省；(4)按农业收入(或产量)计征的，有东北的辽宁省、吉林省、安东省；(5)按农副业收入累进计算与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征收的，有陕甘宁的另一部分地区；(6)按地亩累进征收的，有晋冀鲁豫的部分地区和绥蒙地区。以上各种办法，具体办法虽有不同，但一般贯彻了累进原则，体现了不同阶级合理负担的政策原则。

再说1947年。这一年是老区、半老区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一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工作条件的不同，各地方土地改革的进度和深度很不平衡。根据多种情况，各解放区采取了不同的过渡性的办法。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办法是逐级分配任务，民主评议征收。由农会领导农民群众评定各户负担额。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简便易行，有利于保证征收任务的完成，但如果评议工作掌握不好，容易发生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采用这种办法的主要是土地改革比较彻底的地区，包括陕甘宁、晋察冀的大部分地区、东北的松江、嫩江、黑龙江和吉林等省。第二种办法是将原来的累进税制加以修订。山东、绥蒙东北的辽宁省，将累进税等级间的差距缩小，将最高累进税率降低。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和太岳区将原来的统一累进税率，修订为有免征额的较为缓和的累进税制。第三种办法是基



本上年的征收办法,主要是土地改革尚未开始或刚刚开始地区,如苏皖地区和晋冀鲁豫的部分地区。

## (二)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完成后的征收制度

1948年,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彻底完成后,各阶级、阶层的土地已大体平分。原来的地主、富农得到大体相当于全乡平均数的土地;某些中农原有土地略高于平均数的仍予保留,部分贫农土地少于中农。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分配是以乡为单位进行的,因此,乡与乡以至县与县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也不可能比土地改革前缩小。

根据土地改革完成后的情况,各解放区经过调查研究,颁布并实施了新的农业税征收条例,进行了农业税制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把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同时随着各个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征收办法的统一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具体的征收办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实行有免征额的比例税制。采用这种办法的有华北解放区(由原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

所谓“有免征额的比例税”,就是每一农户计算税额时,先按人口扣除一定数量的收入(例如华北解放区规定每人扣除10市斗谷),所余部分按同样的税率比例征收(例如各农户同样按20%的税率征收)。这种税制,形式上是比例税率,但实际税率(征收额占土地产量的比例)都带有一定的累进性质,因而对不同地区之间,对中农与贫农之间,仍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农业税的税率,在当时战争环境下是由民主政府根据当年战争的形势、供给的需要与农民的负担能力,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例如华北解放区规定,1948年每个“负担亩”征收小米25市斤,地方粮5市斤;山东解放区规定每个“中亩”征收公粮20市斤(另有少量“田赋”)。

第二种,实行比例税制。采用这种办法的有东北解放区、晋绥

边区和内蒙古解放区。这种办法不扣除免征额，按农户全部土地的常年产量作比例税率计征。税率的规定，各解放区有所不同。1948年晋绥规定比例税率为15%；内蒙古规定为20%。东北解放区考虑到各地区土地多少与产量情况的不同，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实行这种征收办法的地区中，晋绥、内蒙古解放区于1949年也改为有免征额的比例税制。

以上两种农业税征收办法，一直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八年，即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

### （三）新解放区的农业税征收制度

在新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税收政策，除对少数重要的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并没收财产外，不分配土地，不分浮财。在负担上，要使地主富农多出钱出粮。这样做，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有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有利于保证战争所需要的财粮供应。1949年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曾颁布《1949年公粮合理负担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曾颁布《陕甘宁边区新区征收公粮暂行办法》，都采取累进税制，最高税率为40%。

## 四、农民在财粮上的重大贡献

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认真执行党的负担政策和民主政府的征收制度，广大农民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缴纳农业税（公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具体负担情况，由于各个年度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战争的需要不同，解放区的负担人口不同，负担的多少也有所不同。请看以下的统计资料：

表 III 陕甘宁边区 1946—1948 年农业税征收情况

年度	人口 (万人)	耕地面积 (万亩)	农业产量(折 细粮,万市斤)	征收税额(折 细粮,万市斤)	每人平均负担 税额(细粮, 市斤)	征税额 占产量%
1946	160	1514	54900	4890	30.5	8.90
1947	120	1150	27000	7380	61.5	27.33
1948		5300	195600	30000		15.33

资料来源:西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编印:《陕甘宁边区农业税资料汇编》,第 360 页。“细粮”指小麦、小米。

表 IV 山东解放区 1946—1949 年农业税征收情况

年度	人口 (万人)	农业产量(原 粮,万市斤)	征收税额(原 粮,万市斤)	每人平均负担 税额(原粮, 市斤)	征税额占 产量%
1946	3112	993645	155108	49.84	15.61
1947	2260	973441	220247	97.5	22.51
1948	3542	1180291	239717	67.7	20.31
1949	3871	991069	227237	58.7	22.92

资料来源:山东省财政厅资料。

表 V 晋察冀边区 1945 年 7 月—1948 年 9 月农业税征收情况

年 度	人口 (万 人)	负担 人口 (万人)	农业收 入(万市 斤米)	征收额 (万市斤 米)	每人负 担农业税 (市斤米)	每人负担 村款(市 斤米)	每人共 负担(市 斤米)	负担 占收 入%
1945 年 7 月—1946 年 9 月	1796	1541	788927	57088	37.12	16.8	53.9	10.53
1946 年 10 月—1947 年 9 月	1511	1164	651916	72956	62.72	20.80	83.5	14.90
1947 年 10 月—1948 年 9 月	1511	1180	472000	90771	76.93	11.47	88.4	22.10

资料来源: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材料。

表 VI 华北各区 1949 年农业税征收情况

地 区	负担人口 (万人)	耕地 (万亩)	常年产量 (万市斤米)	农业税征 收额(万市 斤米)	每人平均 负担(市斤 米)	负担占常 年产量%
冀 中	703	3023	312910	54847	78.0	17.52
冀 南	752	2952	327345	58523	77.8	17.87
冀 鲁 豫	721	3040	205426	52932	74.5	17.91
太 行	475	1595	185302	32922	69.3	17.76
太 岳	210	794	81900	14577	69.3	17.79
北 岳	518	2167	176120	29430	56.8	16.71
晋 中	249	1092	90000	14038	56.4	15.60
石家庄市郊区	9	13	3825	700	84.4	18.30
阳泉市郊区	6	7	828	47	7.9	5.67
合 计	3643	14683	1383656	258016	70.8	17.63

资料来源：华北人民政府 1948 年财政会议材料，表中是计划数字。石家庄市郊区很多是水浇地，产量高，所以负担比例也高。阳泉市郊区每人平均耕地少，单产低，所以负担比例低。

从表列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解放战争时期农民负担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6 年为第一阶段，1947 年和 1948 年为第二阶段，1949 年为第三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解放战争决胜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民负担最重、贡献最大的时期。

#### (一) 第一阶段——1946 年的农民负担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在前方，就是针锋相对地进行军事斗争，在后方，就是要抓好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以帮助人民克服长期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

为着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支援自卫战争，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指出：“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 1946 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重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

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制,以利持久。”<sup>①</sup>“现在一面要为战争动员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违农时,应当研究调节的办法。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sup>②</sup>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各地适当地安排了1946年的农民负担。农业税征收额占农业产量比例,陕甘宁边区为8.9%,山东为10.53%,晋察冀边区为10.53%(见表Ⅲ、Ⅳ、Ⅴ),晋冀鲁豫边区为12.3%,晋绥边区为12.75%,东北和热河约为20%<sup>③</sup>。由此可见,除东北和热河达到20%外,其余各解放区在9%—16%之间。按照华北财政会议提出的农民负担能力最高可达15%—20%的比例来看,1946年解放区农民负担一般还不算重。

这一年农业税的征收,仅从上面表中所列的陕甘宁、山东、晋察冀三个解放区的数字计算,共计21.7亿斤小米。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完成支援了初期的解放战争,保卫了解放区,并为以后转入进攻准备了条件;同时,抓紧抗日战争胜利后短暂的相对和平的时机,适当减轻一点负担,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积蓄力量,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二)第二阶段—1947年和1948年的农民负担

1947年和1948年是解放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战争在解放区进行,农民的家园遭受严重破坏,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根据地财政经济十分困难。1947年7月转入战略反攻以后,战争转入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有所扩大,但为了保证解放决战的胜利,主要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财粮需要猛增。当时,在“一切服从战争需要”,“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各解放区不得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这个阶段是农民负担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6页

② 同上,第1173页。

③ 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热河材料引自董必武:《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1947年8月27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山西省档案馆资料。

重的阶段。

从前面的表Ⅲ、表Ⅳ、表Ⅴ中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1947年征收额占农业产量的比例为27.33%,1948年为15.33%;山东解放区1947年为22.51%,1948年为20.31%;晋察冀边区1947年为14.9%,1948年为22.1%。另据晋冀鲁豫边区的典型调查,太行区10个县所属13个村为14.08%,太岳区5个县所属5个村为14.6%,冀鲁豫8个县所属10个村为21.18%,冀南5个县所属6个村为23.27%。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农民负担一般在15%—20%之间,许多地区超过了华北财经会议提出的15%—20%的比例。

当时农民负担最重的地区是敌人重兵进攻的地区。蒋军胡宗南部以30万之众,进攻只有100多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边区90%的地区受到敌人的烧杀抢掠,土地荒芜360万亩,青苗被毁50万亩,边区农业产量由1946年的54900万斤,突降到1947年的27000万斤。这是1947年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突然升高到27.33%的主要原因。1947年春敌人又以大量兵力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原来拥有人口3100多万,在敌人重点进攻时人口缩减到2200万,即减少1/3。广大地区惨遭敌人蹂躏,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这一年农民负担达到22.51%。

还应指出,在一些战区或邻近战区的地方,由于大军云集,需用紧急,当地人民的负担自然比一般地区重一些。在“三大战役”中,我方军队及民伕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所需粮食、烧柴、马草、副食品数量之大可想而知。除了需要大量运力外,在远处调运不及的时候,不得不向当地人民征借,待以后归还。在敌我激烈的斗争中,农民为了保家保命,保卫土地改革中分到的田地,无不踊跃承担。

关于这一阶段的征收额,据中共中央财经部材料,1948年五大解放区共征收122.6亿斤,其中东北48.6亿斤,华北31.8亿斤,华东17.5亿斤,西北3.2亿斤,中原15.4亿斤,华中6.1亿斤。其中华

北、西北是折合小米计算的,其余地区是混合粮。如果都折成小米,约为105.6亿斤<sup>①</sup>。

### (三) 第三阶段——1949年的农民负担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基本胜利,大部分国土陆续解放,人民政权普遍建立,这就为保障战争的供给创造了有利条件。原来战争的财粮供给主要依靠老解放区的农民,随着新解放区的扩大,国家可以从新解放区的农民和城市工商业方面取得一部分收入。这样就有可能稍为减轻一下老解放区农民的负担。

但是另一方面,战争还在进行,国家在财政经济上面临着严重困难。新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压榨下濒于破产,那里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在负担上还必须加以照顾。城市工商业在战争时期遭受严重破坏,加上交通阻塞,城市税收为数不大,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物价尚未稳定。新接收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人员,需要“包下来”给以饭吃。因此,减轻老解放区农民的负担仍然是有限的。

从前面的表VI可以看出,1949年华北各区农税占产量的比例,冀中区为17.52%,冀南为17.87%,冀鲁豫为17.91%,太行为17.76%,太岳为17.79%,北岳为16.71%,晋中为15.6%。从表IV中看出,山东1949年负担比例为22.92%。另据西北地区材料,1949年陕甘宁边区负担比例为17.89%,其中老区、半老区为15%;晋西北老区、半老区为15.99%<sup>②</sup>。由此可见,1949年的农业税负担,除山东因受灾减产,负担比例仍然超过20%以外,大部地区在15%—18%之间。这较之第二阶段已有明显减轻,陕甘宁的老区、半老区减轻尤为显著。由于广大新区的陆续解放,当时虽然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负担调剂平衡,但在解放较早、已经建

<sup>①</sup> 中共中央财经部:《财政收支与人民负担》。

<sup>②</sup> 见西北大区财政局编印的《陕甘宁边区农业税资料汇编》(1954年10月)、《1949年西北解放区公粮计算及1948年负担表》。

立统一政权的华北地区,各个解放区的负担比例已趋于平衡。

1949年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农民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仅山东省和华北解放区就征收农业税48.5亿斤。这对于支援百万大军渡江作战和向华南各地进军,起到了保证作用。

#### 四、农民在战争勤务上的重大贡献

征集劳力服勤务是比征集粮食、税款更为复杂繁难的工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就制定了符合当地情况的“战争勤务负担办法”。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分散的游击战争变为大兵团的运动战,战争的需要是紧迫的、集中的、大规模的、迅速活动的;而交通运输工具是落后的,供应来源是分散的、迟缓的、零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一度发生管理不善、浪费民力的现象。各解放区及时总结经验,修订了“战争勤务办法”,使问题逐步得到缓解。

各解放区规定的关于战争勤务的具体办法不尽相同,但一般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战勤负担者主要是18岁—55岁的男子,妇女则负担缝纫、炒干粮、站岗放哨等勤务。有运输能力的牲畜和车、船也是战勤负担者。战争勤务一律记分算账,发给“工票”,并可与劳动互助、为解放军烈属代耕互相变工,以免因支前妨碍生产。城市居民可以折款代服战勤。战勤的范围和征收单位都有严格规定,禁止滥征滥用。一般分为平时勤务和参战勤务两大类,平时勤务主要是后方的武器弹药运送、公粮收发翻晒、为缺少劳力的军人和烈士家属代耕等。参战勤务主要是前方武器弹药转运、伤病员抬送、战争带路送信、修筑军工事、破坏敌之军事建筑及交通线等。后一种勤务18岁—45岁的男子负担。凡连续出勤三天或四天以上的,由政府负担供应食用。

解放战争初期,大体是平时一兵一伙,战时一兵二伙或一兵三伙(即一个兵需要两个或三个民伙服勤)。后经屡次改进,尽量严密



组织,节省民力,多数地区做到了平时三兵一伙,战时一兵一伙。

各解放区农民战勤负担因战争形势的不同而不同。西北地区1947年和1948年战争勤务负担很重。据晋绥边区不完全统计,这两年共用人工12599217个,畜工1830721个,车工207798个<sup>①</sup>。这主要是敌人大举进攻,内线作战时间长,解放区的大量粮草,在敌人到来时要紧急疏散,而我军大部队一到又要迅速集中供应。一散一聚,需要大量人力畜力。加之西北地广人稀,负担就要加重了。

华北地区,从1946年6月蒋军发动全面进攻,到1949年华北全境解放,共经历了几十次战役。据有关材料估算,华北解放区约有劳力1600万个,动员支前劳力一般占15%—16%;有运输能力的牲畜266万头,有5%左右长年运输支前。这就是说,整个华北已经常有240—256万人、13万头牲畜在为战争服勤<sup>②</sup>。

华北地区,据山东省支前委员会统计,自1946年7月解放战争开始至1948年9月济南解放止,在这两年零三个月中,全省共出动支前民工580万人,约合日工26480万个。民工们在敌机、炮火威胁下,日夜不停地输送弹药、粮食,抢送伤员,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

淮海战役中,在中共华东局、华北局及各级支前委员会的组织下,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五省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据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统计,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达225万人,担架73900副,小车41万辆,大车3000多辆,挑子42400副,牲畜6300头,船只13630艘,汽车250辆。广大民工用落后的运输工具将57000万斤粮食、320万吨弹药,及时送到前线<sup>③</sup>。单是粮食一项,用小车载运,每车装200斤,若把这些小车排列起来,可以排成从南京到北京那么长距离的五行<sup>④</sup>。人民的支

① 《晋绥军勤材料》,山西档案馆。

②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第650页。

③ ④ 《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232页。

援，使部队在物质上得到充分保证。当时，在双堆集包围圈内外，蒋军处于绝境，吃马肉，啃麦苗，而解放区人民给子弟兵送来的大批大米、白面、猪羊肉，战士们吃不完，陈毅将军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渡江京沪战役共动用人力 320 余万人，用粮 34399 万斤。随军常备民工 16 万余人，由山东、苏北、皖北农民组成<sup>①</sup>。他们配合解放军进军江南，直到南京、上海解放才还家。这些民工中，绝大部分是土改中翻身的农民。他们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为革命战争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我国有一句老话：“自古兵差无善法”，那时还指的是古代的战争。而在近代大的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中，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政府的严密组织，依靠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的高度政治觉悟，竟然找到了“兵差”的“善法”，动员和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支前大军，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

<sup>①</sup> 华东支前委员会：《济南、淮海、渡江京沪三大战役支前工作总结》，载《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 6 辑，第 253、267 页。

## 纪检监察战线上的钱瑛

刘克境(执笔) 王 钧 李 捷

编者按：被人们亲切地称做“大姐”的钱瑛，一生有不少传奇式的经历。她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和地下党的工作，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全国解放后，曾在华中局、中南局工作，1953年后历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党组书记、部长，内务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7月26日逝世，享年70岁。

本文节选自全面描述钱瑛生平经历的《钱瑛》一文，集中介绍钱瑛在纪检监察战线上的工作情况。

1952年底，钱瑛奉调中央单位任职。

当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是德高望重的朱德，钱瑛担任中纪委专职副书记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冬至1959年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党组书记、部长。在她主持和参加下，为许多好同志平反冤狱，为党纪、政纪的整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3月25日，钱瑛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在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同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钱瑛上述报告，要求“根据此件加以检查，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将自己过去所发命令、指示中犯有错误的部分，迅速加以纠正。因为报告中所指示各项不能容忍的坏事，或类

似的坏事,除了个别事件,例如盐民、渔民问题及种蔗问题,只是在广东及其他若干省区存在以外,其余各项是带普遍性的,几乎每省(市)都有,只是件数多少不同而已。这些事件,很多是发源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其次就是省人民政府和专署的有关部门。而发生了这些事我们还不知道,有些甚至部长也不知道。由此可见,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中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钱瑛同志的报告要给各司、局长同志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务必迅速加以检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纠正各项不能容忍的错误”。同年11月11日至28日,中纪委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钱瑛在会上作了《两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总结了1951年4月第一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两年来的工作,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明确执行党纪的方针和政策界限,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有关党、政部门的关系,安排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具体工作。会议制定了有关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些规章制度。1954年1月17日,中央批发了这次会议的三个报告和有关业务工作方面的三个文件。

1953年,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历史上是非常繁忙的一年。当时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有29人,其中包括工勤人员7名。机构也只有一个处下设3个科。在中央和朱德的领导下,钱瑛作为仅有的一位专职副书记带领着大家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紧张而又稳步地工作着,分别到华北、华东及广东直至海南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呈送过多项业务、专题报告,其中得到中央批转的就有五个报告,还召开了全国纪检工作会议。

1954年,钱瑛带领工作组到东北地区,考察了3个省、6个市、20多个主要工矿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并着重了解了工矿企业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以及执行国家生产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分别向中央写了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中央很快批发给全党。

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钱瑛敢于直书直言,秉公处理。她于1955年7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

言中提到,有些工矿企业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忽视质量,导致出产大量废品,造成很大损失,如沈阳重型机器厂1954年全年废品达2800余吨,净损失152.5万余元,并影响到89个兄弟厂矿的生产建设。粮食部门有些单位,因加工和仓储保管不善,造成粮食损失严重,仅辽宁省监察厅1955年上半年新检查的14个县、市粮食仓库即有生虫的粮食1亿零4000余斤,完全霉烂不能食用的粮食1.8万余斤。湖南省1955年1至3月份共发生粮食被盗事件375起,被盗粮食4.6万余斤;失火事件52起,烧毁粮食15.45万余斤。她指出,造成上述浪费、损失的原因,有些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领导上疏于督促检查,有些则是由于工作人员思想作风不纯,严重不负责任;也有的是反动分子的破坏所致。

1955年3月9日至24日,中央纪委在北京召开农村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时,朱德作了重要讲话。4月,中纪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农村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的报告》。5月,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和朱德的讲话提纲,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产生的重要决议之一是一致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董必武担任书记,钱瑛是副书记之一。1955年5月6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在北京同时举行,到会的有中纪委委员和中监委委员、候补委员。会议由董必武主持,钱瑛汇报了五年来的纪律检查工作。朱德讲了话。同日,钱瑛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的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钱瑛作为八大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她在会上就党在国家的监察工作方面作了发言。她在肯定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的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指出,目前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

滋长着官僚主义的倾向，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许多危害，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刻警惕的。

1959年春监察部撤销，是年钱瑛奉命接替谢觉哉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和党组书记。兼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

1960年冬，钱瑛被调离内务部，专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同年11月下旬，中央工作组由中监委、中组部和公安部联合组成，钱瑛任组长赴甘肃检查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贯彻情况。钱瑛亲自去张掖、酒泉地区了解到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肿病死人很严重。她当即发电报，把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紧急调拨救灾粮食——救命粮啊！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迅速调拨救灾粮，空投给当地人民群众，解救人民群众的倒悬之危。

1961年1月5日，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作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

1962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会议）揭开了安徽省委所犯严重错误的盖子，刘少奇让钱瑛同他一起参加这个省的会议，帮助与会人员解除顾虑，向党中央如实反映了情况，改组了省委领导班子，以后，钱瑛率中央监委工作组到安徽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

1962年4月，钱瑛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遵照邓小平指示，由中监委、中组部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中央很快把这个通知下发全党。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钱瑛和她带领的工作组下到省之后，看到等待处理的案件数以万计，范围遍及全省，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都很混乱，顾虑重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关键在于省的主要领导的霸

道作风。有三个省一级领导干部就是因有不同意见被打倒的，也就是省里的三个最大的案件，又由此株连了更多的人，形成了更多的案件，一直株连到最基层的干部和群众。钱瑛决心从这三个大案入手。对这三个案件，凡是原结论认定了的问题，一件事，一句话都一一查对核实再定；对有关的当事人，一个个地去谈话；对有关的证人要亲自去访问；对原专案组的领导人、办案人，一一亲自或派人去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别召集座谈，最后查明三个案件都是错案。

在办这些大案的甄别工作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有人提醒钱瑛，这三个大案是铁案，碰不得，其中一名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当时右派问题是禁区，连他本人的申诉都不能受理，更何况复查？！另一名省委领导干部刘秀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还有一名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被定为反党分子，是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点过名的，这种案子怎能再碰？！

钱瑛深知此中风险，她做好以身殉职的准备，以大无畏的精神带领工作组的同志尽快把处理这三个案件的经验总结起来，为下一步处理直接受株连的案件找出了工作捷径。三个大案解决了，受这三个案件株连的一串串的案件也就失去了立案的依据，像摘葡萄似地被“摘”掉了。

钱瑛就是以这样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党的监察工作战线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和邓小平等同志的鼓励。刘少奇说，钱瑛是“有领导能力，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干部”，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我们的包公”，群众由衷地称赞她“女青天”。

1962年7月，钱瑛离开安徽后，曾试图通过安徽甄别工作的实践，总结有关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她曾召集中央监委去安徽的同志议论过此事，后因1962年9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翻案风”，就未能进行。全国的甄别工作也停了下来。但是，钱瑛认为，虽有少数人翻案，而主要的还是

该甄别平反的未甄别平反。她和中监委的全体领导同志都主张甄别工作应当继续搞,要善始善终,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同。1962年12月,党的监察工作会议据此制定了《中央监委关于善始善终地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

1963年、1964年,钱瑛先后到江西、福建、上海、辽宁、宁夏、内蒙古等地视察党的监察工作,认真贯彻1962年末召开的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精神,强调甄别工作要善始善终。她还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教育,着力研究处理“五反”问题的政策界限,为党风建设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钱瑛一生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是五级干部,每月自己名下存不了多少钱。她住的房子里,除了公家给她配备的极普通的几件家具外,没什么贵重东西。她逝世后,专案组把她的全部私人衣物用品作为“叛徒”的遗物卖给信托商店,总共只卖了800元!她真正可贵的遗物是多年勤奋工作积累下来的100多册笔记本(指仅在北京工作期间的),可惜,都被专案组给销毁了。但是,她的伟大精神、高尚的情操是永远长存的,是任何人也毁灭不了的。



## 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张耀祠

党中央决定：粉碎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做到一网打尽。

这项行动，由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部署，汪东兴同志负责组织实施。

从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交待任务。

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找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的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

我当时对汪东兴说：“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江青一伙正在蠢蠢欲动，加紧篡权，党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是在这关节点上。我们必须先下手。

当我们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一看表，才下午4点，离晚上8点还有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中，勾起了我许多往事的回忆，越发感到江青罪大恶极，恨不得马上就去抓她。等呀等呀，觉得这四个小时特别漫长。

时间到了，我们随即出发。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201号楼，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我和武健华等人在晚上8时，先

到毛远新的住所，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了起来，马上关了电视。

我即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宣布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不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的住所很近，我和武健华 20 点 30 分来到了她的住所。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对江青极大的愤恨，我当时说的“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说的话。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这样几个字：“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作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江青平时用的小车和一直跟着她的司机在外面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

其实，早在 1975 年 5 月 3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

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但是,它表明了毛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时间。在他生前没有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在他逝世后的第 27 天,在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摘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 张国焘另立“中央”与私刻“中央”大印

——西路军三枚木质“中央”大印由来考辨

曹定云

## 一、大印的发现及其特征

1996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第四版载: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三枚大印在西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被重新认识。三枚大印均为木质:一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径10厘米);一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径9厘米);一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直径9厘米)(见图)。据载,这三枚大印本早已发现:“1955年,西宁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南郊凤凰山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对各处的万人坑中的烈士遗骨和遗物进行集中和清理,当时就发现了这三枚大印,但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又被人们重新认识。这三枚木质“中央”大印,



无疑是当年被害的西路军烈士的遗物。

报载：据有关专家鉴定，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同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三枚铜质中央大印对比，式样基本一致。为此，笔者特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在展览大厅，看到了三枚铜质的中央大印，与报上刊登的三枚木质“中央”大印相对照，发现二者之间大致相似，但仍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现分述如下。

1、“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其木印图案右边麦穗芒长，而铜印图案右边麦穗芒短；铜印图案中心部位之镰柄上部似有“△”纹样，木印无。

2、“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铜印图案右边麦穗三支芒大致齐平，而木印图案右边麦穗有两支芒明显前突；铜印周边一圈内之两个“五星”与两头文字之距离靠近，而木印则较远。

3、“国家政治保卫局”印章：铜印图案右边麦穗芒较长，而木印麦穗芒较短；铜印周边一圈内之两个“五星”与两头文字之距离靠近，而木印则较远；铜印铭文中的“局”字左下撇下部不上挑，而木印则上挑；铜印“卫”字右下直笔外斜，而木印则内斜。

根据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木印与铜印虽然在形状、大小、铭文内容、图案花纹之布局上基本相似，但在一些细部，如麦芒之长短，“五星”与两头文字之距离，以及个别文字之风格则呈现出差异。这说明，铜印图案与木印图案是出于不同人的手笔，木印当是仿照铜印而刻，其镌刻的时间也会有先后之别。

中央大印本归中央所有，而这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却出于西路军中，确实令人蹊跷。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下令组建西路军，由红四方面的九军、三十军、红四方面总部机关和红一方面的五军团组成，共21800余人。因此，有的同志提出了如下推测：“一是中央红军保管三枚大印的同志派到红五军工作，随五军参加了西路军；二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加强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从一方面军派出了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到四方面军

工作,掌管大印的同志也在其中参加了西路军。”<sup>①</sup>以上两种推测,都是以这三枚木质“中央”大印本是中央之印为其前提的。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它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中央之物,同红一方面军人员毫无关系。红军长征途中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尤其1935年6月14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尖锐而激烈的斗争,有不少细节恐怕至今还鲜为人知。张国焘曾经另立过“中央”。既然如此,他有没有私刻“中央”大印?如果有,大印又流落何方?这些都是党史、军史中的一个“迷”。在此情况下,这三枚木质“中央”大印,究竟是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的党中央的?还是属于张国焘另立的伪中央的?就不得不认真考辨了。

## 二、大印不是中央之物

自古以来,官印是国家政权权力的象征,尤其是中央大印,是国家中央政权权力的象征。它庄重、严肃,用料十分考究,多为玉质或金属质,罕见木质。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三枚铜质中央大印,完全符合中央大印为金属质之惯例。

西路军所出的三枚“中央”大印则是木质的,与“中央”是最高权力机关之身分很不相称,与三枚铜质中央大印亦形成强烈反差。对此,有“专家认为三枚木质大印可能是行文时所用”<sup>②</sup>,这值得商榷。历史上,所有官印都是为行文所用,尚未听说一种官印是专为珍藏而不行文使用的道理。就事物本身而论,三枚铜质中央大印肯定使用了很长时间,故不存在行文时再用木质大印的问题。再者,铜质中央大印本身并不大,直径分别为10厘米和9厘米,不存在

---

<sup>①</sup> 刘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印怎么到了青海》,《光明日报》1996年10月25日。

<sup>②</sup> 刘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印怎么到了青海》,《光明日报》1996年10月25日。

因大印过重而使用不方便的问题,即便在行军途中,也不会因为几枚铜印而形成累赘。所以,中央没有必要在三枚铜印之外再刻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基于上述理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并非中央之物。当然,事物本身非常复杂,人们的各种疑问也很难一下子统统消除。笔者现在仍假定,中央曾经有过木质中央大印。那么,木质中央大印会不会落入西路军烈士之手呢?我们不妨就长征中的历史情况,一一进行分析。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军委和中央机关编为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叶剑英、李维汉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是第二野战纵队的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谢觉哉同志,以及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都随“红星纵队”行动。中央政府的大印自应由“红星纵队”保管,为临时中央书记博古所控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这样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通了的。有的人还想不通,凯丰(何克全)就是一个。“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这样交出去!’博古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他的态度还是照顾大局的。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当时中央是有几担装着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由此可知,中央的大印一直是由中央机关(红星纵队)保管着,并不在任何一个私人手中。遵义会议后,“红星纵队”一直是由陈赓为团长的红色干部团担任警卫,大印处于严密的监护之下。

现今发现的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分别是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军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保卫(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个最高权力机关的大印。这三个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朱德、邓发。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时,毛泽东、邓发以及整个中央机关都随右路军前进,后胜利到达陕北,中央大印自然也就到了陕北。朱德虽与张国焘随左路军前进,但因中央大印是

由中央机关保管，故朱德不会将中央大印带入左路军。朱德只是军委主席，就假定他能带走军委大印，也无权将政府和保卫部门两枚大印带走。况且，长征途中，军事之最高指挥权，并不是朱德。遵义会议之前，是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遵义会议之后，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所以，朱德根本也不可能将军委大印带走。

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确曾有过人员的交流：红四方面拨出一部分兵力补充到红一方面军；而红一方面也曾派出一些政工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中去，以提高红四方面的干部素质。但是，这些派到红四方面的政工干部，都是军团以下的政工人员，他们根本无缘接触大印，故决不会将中央大印带入红四方面军中。

是否是红一方面掌管大印的机要人员被派到红四方面而将大印带去呢？这也不可能。大印是随机关而动，并非随哪个人员而动。人离必须交印，这是自古以来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所以，不存在掌握大印的机要人员连人带印被派到红四方面军中之事。

中央是否为了指挥方便，将木制的“中央”大印授予张国焘，让他享有中央指挥之权呢？这同样不可能。中央是统一的中央，权力不应分割。如果中央仅仅为了指挥方便，而将中央大印授予张国焘，让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那就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决不会干这种事。况且，毛泽东、党中央对张国焘争权之野心早有防范。会师之初，张国焘一心想当军委主席，朱德也曾提出让给他，毛泽东不同意，而是让张当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在毛儿盖会议期间，毛泽东要朱德对张国焘小心警惕。所以，党中央不会将中央大印授予张国焘。后来，张国焘搞分裂，携部队南下，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一再电令张国焘北上，就是中央权力不曾分割的明证。

红一方面真正编入西路军的只有红五军团。这个军团是以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部队为骨干组成的，该军团是红一方面下属的一个军团，长征途中多数情况下均担任后卫，故不可能携



带中央大印。

总之，中央的大印不可能进入西路军。三枚木质“中央”大印不是中央红军人员的遗物，也不是中央授予张国焘的。如此，只剩下一种可能：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原本是红四方面人员的遗物。“中央”大印出现在红四方面军中，这就不能不与张国焘另立“中央”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三、大印是另立“中央”的必然产物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封为“主席”，并作出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还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朱德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借以进行拉拢和诬陷。

张国焘成立伪中央以后，12月5日竟然打电报给中央，狂称：“（一）此间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等等。另外，张国焘还曾以“中央”和“军委”名义，向红二、六军团发过指示电，俨然以“中央”发号施令。他的个人野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国焘宣布成立伪中央，要以“中央”发号施令，没有大印怎么行呢？因此，镌刻“中央”大印，就成为张国焘另立“中央”后首先要解决的一件大事。这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刻出来的。我们推断三枚木质“中央”大印为张国焘伪中央之印，决不仅仅是根据单纯的逻辑推理，而且还以木质“中央”大印之下列情况为根据。

第一，木质“中央”大印为什么是三枚，而不是多枚？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一号之公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有外交人民委员会、军事人民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会、财

政人民委员会等九个部门，加上国家政治保卫局，故中央的大印应该有十一枚。而西路军发现的“中央”大印只有三枚。这是为什么？因为，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军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保卫（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三枚最重要的大印。政府和军队两枚大印，是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的集中体现。拥有它，就可以调动、指挥一切部门和军队。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大印，则代表了当时的专政机关；它不但负责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安全，而且对国家干部有隔离、审查和处置的权力。由此，不难看出，政府、军队和保卫三枚大印是张国焘首先要刻的大印，这对巩固他的统治休戚相关。至于其他的大印，对张国焘来说，因无关大局，只待以后再说了。

第二，三枚“中央”大印，为什么是木质的？这是因为受条件的限制。张国焘另立“中央”，何曾不想用铜质的大印？但铜印镌刻，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工艺过程：先要刻出印模，然后将铜溶化再进行浇铸。张国焘是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这里是川西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山下大部分时间天寒地冻，人烟稀少，条件极为艰苦。在这样的地方，实不具备浇铸铜印的条件。而且，军队处于紧张的行军、作战之中，更无法去创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只好用木头镌刻他的“中央”大印了。

第三，三枚木质“中央”大印，为什么不另刻，而是仿刻呢？这是因为，张国焘是一个阴谋家。为了证明他这个“中央”的“合法性”，为了欺骗广大的干部、战士，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就必须要求他的木质“中央”大印同铜质的“中央”大印基本相似，以造成是真正中央印章的假象。这正是张国焘阴谋家本质的反映。从1935年6月4日懋功会师开始，到8月2日毛儿盖会议上分左右两路军时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有过频繁的接触，中央也会发布各种文件、文告，张国焘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这三枚中央大印的图样（相反，其他的印章图样则不容易弄到），仿刻之条件完全具备。

综上所述，三枚木质“中央”大印，确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所刻。木质“中央”大印所具备的那些特征，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时

间、地点及所预舍的阴谋，都是互相吻合的。

伪“中央”消亡后伪中央大印并没有销毁，而是继续保存。

西路军失败以后，被俘的红军指战员 5600 多人被马步芳敌军解押到西宁，1600 多人被杀害，其中 1500 多人是被集体活埋的。三枚木质“中央”大印，就是在被活埋的烈士遗物中发现的。携带三枚木质“中央”大印之烈士究竟是谁已很难考证。由于红四方面总部机关也在西路军中，这位烈士极可能是红四方面总部机关中掌管机要的工作人员，也有可能是陈昌浩、李特、黄超手下或身边的工作人员。由于西路军的失败，三枚木质“中央”大印随烈士而被湮埋，直到 1955 年才被清理出来。在隆重庆祝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之际，又被人们重新认识，让人们重新回忆起长征路上那段惊涛骇浪的历史。

## 对斯诺 1936 年赴陕北采访 出发地的考辨

史 纪 辛

美国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6 年 6 月—10 月赴陕北对苏区进行了数月采访,根据采访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对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采访活动的历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得比较细致、丰富,在斯诺的其他有关文章中,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也有提及。其中对于斯诺赴陕北采访的出发地都记述为从北平出发,经郑州中转至西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要从北京向西南坐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紧接着,斯诺还描述了他在火车上的见闻,文字十分生动。斯诺在后来的《复始之旅》中还写到:“我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让我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赞成我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我此行的全部费用……我便到上海去,再次去拜访孙逸仙夫人,我请她帮助我,以便红军起码把我作为一个中立者来接待,而不把我当间谍。一九三六年春,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宋庆龄为我作了安排。通过她,我与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同西安府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从斯诺在《西行漫记》和其他文章中记述看,斯诺是一个人去的西北,而没有提及与他同去陕北苏区的马海德大夫。但是在后来的马海德及其他人的回忆中,则证

实了是马海德与斯诺两个人共同去的陕北苏区，如马海德在1982年回忆说：“1936年6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通过宋庆龄的秘密介绍，让我把斯诺带到陕甘宁边区。我是去参加革命的，斯诺是去报道革命的。我对斯诺说《西行漫记》中不要提我的名字，给我保密呀！所以，你们看到《西行漫记》，一个字也没有写到我”。“我们两个出发前不在一块”。“我从上海出发，斯诺从北京出发，约定在郑州换乘陇海线的火车，在火车上接头”。马海德在这里讲到了他同斯诺去陕北苏区出发的经过，也说斯诺是从北京出发的。

但是笔者则从所找到的一份当年的秘密报告及另外的有关电报中，看到斯诺赴陕北的出发地是上海。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党中央派遣从陕北苏区秘密前往上海，建立上海联络局并开展工作。5月28日冯雪峰从上海向中央写出了第一次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斯诺及马海德赴陕北苏区一事，有关原文如下：“前次要进来之外国医生坚决要来，现在已送来，他名字叫S·G·Hattem<sup>①</sup>，另有一个叫Edgar Snow<sup>②</sup>的美国记者亦来，此人系来参观，三月后即要出来，此二人均十分热情并十分可靠，尤其是医生他买了三四百元的药带来……收到此信后，即刻请派人到延安接两个外国人——Hattem与Snow，他们六月三日从沪动身，估计六月十三四日一定可到延安”。冯雪峰在报告里还告诉中央“托余君<sup>③</sup>”，“上海方面的情形可请余君再报告一些”。

斯诺、马海德等人到西安后，刘鼎于6月12日将情况电告宙<sup>④</sup>：“余振农、医生、记者等三人抵此……振农可于两日后由象三（刘象三）带人苏区……医生与记者下次来”。7月7日在一封发给博古、彭德怀的未署名的电报中说：“两个美国人（一医生、一记者）

① 即乔治·海德姆，亦即马海德。——笔者注。

② 即埃德加·斯诺。——笔者注。

③ 即余振农。——笔者注。

④ 化名。——笔者注。

由沪来,明日可到安寨”。同日,周恩来也将此事电告博古、张云逸并作出安排“白区一二日内,有两个外国同志进苏区,一如医生可住卫生学校,一如新闻记者须住外交部”。

上述史料中明确提到斯诺和马海德赴陕北的出发地都是上海,而且写明了出发的具体日期。这就同斯诺本人记述和马海德回忆的情况发生了矛盾。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冯雪峰的报告和有关电报是对当时情况最及时的记录,与斯诺公开的记述和马海德的回忆相比应该是最权威的。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冯雪峰的报告等为依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冯雪峰的报告等与斯诺、马海德的记述和回忆相矛盾的情况呢?在此笔者试分析原因如下:

1、斯诺、马海德赴陕北苏区是在宋庆龄和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成行的,但是我党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是极为秘密,不能暴露的,斯诺《西行漫记》的写作与出版时间距采访后的时间并不太长,这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下,斯诺是不会也不应在书中提到的,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党也是会对其有所交待的。在这里笔者找到的另一则史料可以佐证这一点,即中央在给上海冯雪峰的一份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带党外的人进苏区”及“在目前上海站不住的党员”,“愿来苏区的,也可以代为转送,但须向他声明,这不是党的介绍,只是同志关系的帮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保护处在严酷环境中的党组织所采取的措施。斯诺和马海德的情况完全可能包括在内。另外,虽然宋庆龄当时同上海中共地下党和陕北中共中央有联系的情况国民党方面可能知道一些,但是在行动上也还是要十分注意的,斯诺在写作时也是应注意的。我们从斯诺书中的描写也能感到是这样的。直到我国解放后,斯诺于1957年、1958年在他于美国出版的《红色中国杂记》和《复始之旅》两本书中,才谈到此事与宋庆龄有关。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判断的情况,可能是斯诺陕北之行由北平出发之说的主要原因,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有关人士和党组织。

2、除《西行漫记》的记述外,斯诺在50年代出版的有关书中,

“斯诺的《西行漫记》”

仍然是说从北平出发去陕北。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多年,影响很大,出发地问题无碍全书大局,作者没有必要对出发地的记述再做更改。只是将宋庆龄曾安排作者赴陕北这一情况公开说出,作为对原书的补充。但在斯诺50年代出版的有关书中仍然没有提到乔治·海德姆的名字。这些也说明斯诺在《西行漫记》等有关书中并非记录了“全部事实”。

3、马海德在80年代的回忆中也说斯诺去陕北是从北平出发,这可能也是马海德考虑到斯诺的书写得非常生动,影响很大,而且斯诺本人没有改变出发地的说法,因此可能马海德也认为无需就此改变说法,而与斯诺的说法一致为好。

《西行漫记》是斯诺的优秀作品,影响广泛、深远。作品的优秀不仅是因为斯诺的文笔功底,更在于斯诺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光辉形象和艰难历程,是书中所反映的客观史实内容感动了广大读者。笔者认为,对斯诺赴陕北苏区出发地问题根据史料进行探讨,所得出的判断结果,即斯诺将出发地写成北平而不是上海,也恰恰可以说这是对当时严酷环境的真实反映。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现实下,为了保护党的组织和革命人士的安全,斯诺对出发地的写法只能以写成书中的方式,即斯诺当时的居住地北平为最好。另外,既然根据史料判断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的出发地是上海而不是北平,那么书中对火车上情节的描写,就应该可看做是斯诺根据当时社会现实进行的“创作”了,或是斯诺把在其他场合曾有过的相似经历,用到此书中来了。无论是哪种情况,关于火车上这一段的描写,都是对当时中国现实和人民思想的真实反映。

《西行漫记》是斯诺在1937年出版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它记录了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从北平出发,经西安、延安、陕北苏区,最后返回北平的全过程。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也是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窗口。

——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研究》,2008年第1期

## 关于确定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问题

钟 惠 玲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有的文章认为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将原准备在1950年1月1日成立新中国的时间改为1949年10月1日<sup>①</sup>。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新中国的建国日期是党中央独立自主确定的,与斯大林无关。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党内《情况的通报》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时间问题,指出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间未成熟,毛泽东预计在我们取得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间大约在1949年内实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份起,各方面代表开始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筹备工作。同年11月3日中央提出因为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林伯渠来中央工作。12月26日,林伯渠到达西柏坡。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

<sup>①</sup> 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经过》,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重申了“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定都北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在1949年内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于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成立。毛泽东在筹备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地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新的政协筹备会议，在准备成立人民政府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需要和苏联共产党交换意见，故决定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向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并提出要求。中共代表团是7月2日出发的。代表团从北平乘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乘飞机经朝鲜上空抵伯力，后又乘火车于7月7日抵苏联首都莫斯科。在赴莫斯科的途中，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于7月4日写给联共和斯大林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国革命战争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该报告还说：“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报

告指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的，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 23 个单位共同筹备召集的，而且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同时这次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这说明刘少奇在未见到斯大林以前，已经提到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问题。刘少奇访苏还未结束时，毛泽东于 7 月 31 日给刘少奇去电报，要求他早日回国。经过加紧的工作，刘少奇于 8 月 14 日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28 日回到北平。

9 月 21 日至 30 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 月 27 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暂用《义勇军进行曲》，国都设在北平改为北京，纪年改用公元。9 月 29 日大会通过《共同纲领》。9 月 30 日，大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并通过了宣言和公告。10 月 1 日下午 2 时，在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3 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成立新中国的时间问题，与斯大林没有任何关系，刘少奇访苏前政协筹备会已经结束，并在年初已宣布新中国的成立定在 1949 年。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而确定的。

## 二万三千公里的夏日之旅

[越]胡志明 著 洪左君 译

**编者按：**1959年7、8月间，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苏联、中国休息和参观游览。回国后用PH·K·A·笔名，以第三人称格式，写了长篇游记《二万三千公里的夏日之旅》，于同年9、10月份在越南《人民报》连载。这是文章中有关中国之游的内容，编者作了删节。

胡志明一生笔耕不辍。像其他已发表的文章一样，这篇珍贵的游记使人读后尤感亲切。

文中有的小标题是译者加的。在《在北京》这一节中，有些段落前面的导语亦是译者加的。

### 由阿拉木图到新疆

8月1日晨，伯伯告别苏联，乘飞机赴中国。

从阿拉木图到乌鲁木齐770公里。飞机飞越沙漠、天山。天山顶有白雪，下有青翠树林，在晨曦辉映下，景色极美。伯伯拿出纸笔，当即写了一首汉文诗：

遥望天山风景好  
紫霞白雪抱青山  
朝阳初出赤如火  
万道红光照世间

飞机在乌鲁木齐机场降落。前来迎接伯伯的有新疆区党委书记兼自治区政府主席（原文为省委书记兼省长——译者注）赛福

鼎,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陶峙岳上将,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干部。前来迎接的还有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中国少年儿童给伯伯献花和哈达。

到宾馆用过午饭后,他们带伯伯去参观地质馆、“八一”农业大学与拖拉机厂。这家拖拉机厂原是修理汽车小厂,去年增添了机器设备改成拖拉机厂。全厂有4个车间和一个试验厂,工人2500名。

“八一”农业大学设有畜牧、水利、农业机械、农业经济等7个专业,有教师325名,学生2000名。学生边学边参加劳动,或在校属的1000公顷土地干活,或在军队办的农场和人民公社干活。

地质馆陈列了新疆的各种土壤和矿产品。有些矿产品是很珍贵和稀有的。看了之后,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无限丰富的资源。

下午,正放暑假的幼儿园儿童和学生在宾馆花园中表演歌舞欢迎伯伯。

晚上8时,主人请伯伯看民族文工团演出。维吾尔民族文工团演员能歌善舞,艺术水平相当高。

第二天早晨,伯伯同赛福鼎、陶峙岳和其他许多高级干部,由张仲翰副政委带领到离乌鲁木齐150公里的石河子解放军农场参观。

“石河”的意思是石头河。在这个季节,河里只有石头,水很少。

石河子从前是一块干旱的沙漠地,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居住。1949年秋,驻新疆解放军一面进行国防建设,一面进行开垦。由于干部和部队的忘我劳动精神,原是沙石荒芜的石河子,如今已成为一个能生产玉米、红薯、棉花、稻米的繁荣农场和拥有60万人口(40万为部队和职工,20万为部队家属)的城市。

我们随伯伯去参观几个棉花、玉米、蔬菜、高粱种植区,因水利工程很完善,所以每一种作物长势都很好。对此,我们很钦佩,因为这是一处“上有天地有沙”的地方。

翌日离开石河子,途中经过南山。这座山高1500米,是天山山脉的一部分,风景秀丽,气候凉爽(气温15度)。赛福鼎主席夫妇请

伯伯和其他同志在这个供休息的地方(类似我国的三岛<sup>①</sup>)用午餐,席上又是马奶、烧烤羊肉……

这里的农民已作好准备赛马和追捉羊助兴,但因天雨而未能举行。

在返回乌鲁木齐的路上,伯伯参观一户住家的帐篷。帐篷是中亚一带牧民的住房,下面呈圆形状,尖顶。帐篷用兽皮或帆布做成,绑在木料上而支撑起来,像小型杂技表演场。帐篷便于迁徙。公社牧民夏天住帐篷,冬天住木屋。主人请我们吃西瓜,喝马奶。过了一会,村中的男女老少都来向伯伯致意,尔后唱了歌曲《快乐的草原》,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一边唱一边打拍子。

这一天晚上,有40多位高级干部和苏联领事夫妇参加的便宴结束后,赛福鼎夫妇赠送伯伯一套很漂亮的维吾尔民族服装。

抵达乌鲁木齐这一天正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伯伯致电刘少奇主席表示祝贺。刘少奇主席答谢伯伯的祝贺。

## 访问甘肃酒泉

8月4日清晨乘上飞机去兰州,飞机经过吐鲁蕃、哈密、玉门……。这些地方不大,但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中午12时,飞机到了距酒泉30公里的嘉峪关机场。

酒泉是一座小县城,但是由于有以下原因,使它很出名:

1、万里长城从这里开始。

2、这里每座房样式一样:屋顶是平的,门居中开,门的两侧各有一窗户。一排房子就像摆得整整齐齐的火柴盒。

3、公园里有一个泉眼,像口井,水从下面涌上来,称为酒泉。相传西汉时,霍去病打了胜仗,汉武帝奖赏他3坛酒。他认为这是整

---

<sup>①</sup> 三岛,即三岛山脉,在河内西北部永福省境内,此山脉有3座高1300--1400米的山峰,状似海岛,故称三岛。因地势高,气候凉爽,是避暑的好去处。——译者注。

个军队的功劳，不能独自一人领受皇帝的恩赐，于是将酒倒入这泉水中，同士卒一起喝。从此，就把这个地方称为酒泉。

来到这里，我们又多知道一件事。唐朝著名诗人王翰有一句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我国一些儒学学者把“夜光杯”解释为晶莹的酒杯在夜晚闪闪发光。但实际是这样的，在酒泉有一种黑色或白色的石头，用来制作酒杯，玲珑悦目，叫夜光杯。当地同志赠送了几个夜光杯给伯伯做纪念。

在这个地区，经常有尘土横扫，有时尘土满天飞扬，相隔几里的村庄和山峦都看不见。因此从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不便乘飞机。

## 到 兰 州

下午2时，乘坐特别火车离开酒泉。第二天上午10时抵达兰州。

在火车上，甘肃省委的萧善民同志向我们介绍该省情况。

列车驶近兰州，就可以看到一大片崭新的工业区生产繁忙的景象。这里有自来水厂、炼油厂、化工厂、机械制造厂等，还有对来自邻近5省货运火车进行调度的车站，车站的机关和仓库连接起来长达40公里。

下午2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霍维德陪同伯伯参观炼油厂。我们跟伯伯上了73米高的调度塔，由上俯视，看到整个工厂布局十分科学。

参观了化工厂后，伯伯到“五泉”游览。这里有一道泉水叫“抱子泉”，迷信者说，女人膝下无子，饮了这一泉水后将“双生贵子”。

这一天晚上，伯伯去参观西北民族干部学校，尔后去观看戏曲演出，其中有一出京剧，一出越剧和一出地方戏。

8月6日上午9时，伯伯去参观科学院兰州分院。这所科学院除了研究地质生物外，还在研究如何使祁连山上的冰雪提前10天

或15天融化,以便及时灌溉农田。

之后,去参观黄河边的兰州市雁滩人民公社。

在公社一个开阔而宁静凉快的果园里,有几批学生正在这里度暑假。有一些少儿在唱歌跳舞,伯伯和各位领导同志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公社赠送伯伯几个特大的瓜果。

兰州对于我们来说,有几点是新奇的:

1、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清楚黄河。黄河水比我国的红河水更红、更浑,水流更急。来到这里,我们中的一位诗人兴趣盎然地吟了李白的一句诗:“黄河之水天上来。”

2、为了不让雨水滴得过急,人们把黄河两边的山腰挖成阶梯形状。这样一来,雨水使兰州地势变成凹凸不平,一阵大雨过后,从山上冲下来的泥水淤积街道。

3、人们把卵石铺在菜地上。他们说:卵石可以抗旱御寒,保持地温。所以在菜地铺上卵石,就可以提高产量。

4、来到这里,看了秦岭之后,才了解杜甫(杜甫应为韩愈之误——译者)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诗句的意思。

5、女警察。在其他城市也有,但是今天我们才第一次注意到。她们都读完初中(我国为七年级)。她们的任务是指挥市内交通。

## 访 西 安

8月7日上午8时,火车到达西安。到车站迎接伯伯的有方仲如、王林、杨拯民(杨虎城将军的儿子)以及其他领导同志。

西安是一座很古老而又很新的城市。

伯伯决定用较多的时间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

上午8时,我们上街看市容,并登上了钟鼓楼。钟楼和鼓楼为明朝洪武帝(公元1348年)所建。楼为3层,底座1377平方米。自底座至屋脊高36米。在古时,分“夜五更,昼七刻”。这个楼按时敲鼓打钟,向人们报时。钟鼓楼修建很好,600多年来仍坚固如昔。

这里的博物馆很大，有 14 个展览室。陈列品中有原始人使用的石斧、石刀等，还有自周朝、秦朝、汉朝直到现在的铜器、石器、瓷器。参观这些展览室，就像听了几堂社会进化史课，很有补益。

“碑林”有 6 间房子陈列了自汉朝至清朝的近 2000 块石碑。有一部 13 卷的经书全部刻在石碑上，共 250252 个字，用石板 114 块。这是唐代（公元 837 年）的出色杰作。最古老的碑为《周易书》，是蔡邕（蔡文姬的父亲）雕刻的，距今已有 1773 年历史。

唐太宗的 4 匹石马，雕得惟妙惟肖，如同活马一样。这群马原有 6 匹，但是在 1914 年被美帝国主义盗走 2 匹。

下午 2 时，伯伯去参观光学仪器厂。

紧接着去参观位于西安东边的半坡村。这里是 1952 年由考古队发现的，面积 2700 平方米。考古学者认为它的存在距今约 5000 年。房子有的为方形，有的为圆形，但都朝南。在房的正中有一厨房。

用具有用石头做的刀、剑、斧、箭等。鱼钩是用骨头做的。杯、碗、瓮、缸用瓷土烧成。水坛为圆形，有两个把手，底部呈尖状，酷似现代埃及人用的水坛。

村的北边是埋葬死人的地方，有埋葬 1 人的，也有 2 人或 4 人合葬。被葬者大部仰卧，也有趴着的，但头部都朝北。小孩死了装在缸里埋在住宅附近。

现在，“半坡村”可以说是已发现的古代人最早的村落。这对研究人类历史有许多帮助。

5 时半，去参观离市区约 8 公里的慈恩寺和大雁塔。这座寺院建于唐代，距今 1500 多年。从前原有 10 院、1897 房间。后来屡遭战火，被毁坏了很多。解放后为保护历史古迹，政府已修复了 40 间房子。

公元 645 年，高僧玄奘（三藏）自印度归来，就住在这寺院译佛经。人们在寺院旁边修建一座 5 层的塔，用来收藏佛经与佛像。公元 701 年，武则天称帝，将塔身加高两层，成为 7 层，高 64 米。后来



寺院被毁坏了，但是该塔仍保存完好。登上第七层眺望，眼前是一片青山绿水。

晚上8时，伯伯出席了有党、政、军干部和少年儿童1000多人参加的欢迎会。

翌日晨去参观搪瓷厂，工人同志向伯伯赠送几个水杯、脸盆以及一些画有伯伯肖像的盘子，画工精美。

9时半游览骊山，离市区50公里。骊山风景秀丽，有许多历史古迹。由于时间紧，只看了几个地方。首先看“捉蒋亭”。这个亭是纪念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捉蒋介石的地方。

华清池在骊山中间，有温泉，水温43度。传说距今约2700年前，周幽王曾在此。周幽王昏庸无度，为取悦宠妃褒姒“烽火戏诸侯”，最终被犬戎所杀。到了唐朝，唐玄宗为杨贵妃所迷，因而更加浪费。他用大白玉石为杨贵妃修建浴池，形状如盛开的海棠花，故叫海棠池。

骊山附近有秦始皇陵墓。秦始皇登基后便强迫70万老百姓修建这座墓（真墓在附近的山岭中，今尚未找到）。墓建成后，高50丈，周围5里。经过2000余年风吹雨淋，现在墓高只有10丈，周围200丈。

归途中看了杜甫庙。旧庙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已被烧毁。现在这庙庭是1804年重建的。庙的主体有三间，庄严肃穆。庙周围园地，种了许多花。

这一天晚上看了一出地方戏。这出戏是根据崔护一首诗的内容展开的。诗写道：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剧情梗概如下：

一书生路过某村时，看到一位农家姑娘。两人邂逅，油然生情。书生回到自己家里，姑娘亦回到自己家中。整整一年，双方互相思念。书生去找姑娘。他来时刚好是三月清明节，姑娘去扫墓，家中无人。书生就在门上写了上引的那首诗，姑娘回家看见这首诗，误解为辞别书，一时十分悲切，继而病得“十死一生”。“害相思面容憔悴，什么心病而需这药那药”。越数日，书生复至，姑娘的病立即痊愈。最后两人结为百年夫妻。

8月初，伯伯寄信至国内，号召我国农民积极参加变工组和合作社，以大力促进生产，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参观苏联农场和中国人民公社的日子里，伯伯常常想到我国农民同胞，并考虑如何使我国农民像兄弟国家农民那样过着欢快的生活。

## 赴江西九江

江西省同志恳切邀请伯伯到该省访问。他们说，在九江附近有许多胜景。伯伯接受了邀请并于第二天成行。

九江是县城，城市不大。但其附近有许多美丽风景。从九江坐汽车到庐山，只需1个小时。

庐山最高处为1543米，平均高度1100米。

首先，庐山使人感受到的是气候凉爽宜人。夏天，九江的气温高达39、40度，而庐山则只有19、20度。冬天最冷时也不过是零下4、5度。诗人白居易写诗这样赞美庐山的气候：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其次，使人感到迷离的是云彩。这里的云是胜景的一部分，变幻无常，时而几片薄云在山谷间轻飘，像是美女脸上抹的一层粉，时而云朵变得像海浪一样黯黑，把庐山的容颜遮住。突然云朵尽失，只留下几条淡白色云带缭绕在树梢上。早晨和傍晚，山麓被撒下的云朵覆盖着，高处山峰看起来像海中岛屿，人们称之为“云

海”。庐山不仅有“风景”，而且还有“云景”。

瀑布亦是庐山的特色，有高有低，有长有短，自山上流下。有时像雷鸣，有时像弹琴。李白有许多描写这种景致的诗。例如：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庐山有许多名胜古迹。

牯岭是庐山的一座娇小玲珑的小城，许多房子和花园被林木环抱。牯岭外围 1.5—8 公里全是风景区。

“花径”自唐朝就有，这里是一个大而美的公园。

仙人洞是一个大的山洞，洞内有一口泉水称为“一滴泉”，几千年来，泉水一滴一滴地流出来，不增亦不减。

在各个瀑布下面有潭，如白龙潭、黑龙潭、黄龙潭等等。潭中石头杂乱无章，水流清澈。

这里许多地名很古怪，如什么英雄坡、姑娘城、婆媳塔、舍身瀑、会仙亭，等等。

在动物园有一种有趣的鸟，像乌鸦那样大而黑，名叫“鹩哥”，会模仿人笑和说一些简短的中国话，如“你好！”“来，来，来！”“再见！”等等。

在天池，有一种鱼很奇特，头大，有 4 只脚，前脚有 4 趾，后脚有 5 趾。腰部呈黑色，腹部黄色。这种鱼像小姆指大小，只生长在天池。曾拿到别的地方试养，都未成功。

植物园有一种奇特的树，叶很臭，但花却很香。

距庐山 10 公里处的一块丘陵地上，树茂叶密，有几幢古时的房子，这就是白鹿洞书院。这座书院在唐朝就有。到了宋朝，朱熹（我国儒学学者通常称他朱子先生）在此再办书院和教学。因此白鹿洞成为一个文化和学术中心。相传有人在这里饲养了一头很机灵的白鹿，需要购买什么物品，就把品名写在一纸上连同钱一起拴在鹿角上，白鹿就到村里或市上把东西买回来。现在书院还有鹿的石雕像。“洞”是名称，不是通常理解的一个“洞穴”。书院前有一条

深溪，溪中有许多巨石。朱熹在许多石头上刻的字保留到现在。

以前的庐山是有权势的人玩乐的地方。现在这里有7所疗养院和15所供夏天避暑的招待所，每年有15000名从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先进工作者来此休养。当年曾有1000名越南少年儿童来庐山学习与休息。

庐山有600多种树木，2500种草；有许多种水果，如桃、苹果、杏、梨；有一种茶叶，叫“云雾茶”，只有经常有云雾的山上才有这种茶园，这种茶喝起来像龙井茶，味香且有滋补。

## 在 北 京

8月13日，从九江乘飞机飞往北京。到机场迎接的有陈毅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越大使何伟，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范平，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干部。

北海幼儿园。8月15日，伯伯参观北海幼儿园。这里有150多名自3岁到6、7岁的孩子。

8月16日上午，有20多名男女小孩来看伯伯，8、9岁的女孩平平<sup>①</sup>，一手搂着伯伯的肩膀，一手拿着一个盒子。

她问：“伯伯，你猜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伯伯回答：“糖果。”

小女孩说：“伯伯再猜一次。”

伯伯回答：“饼干。”

小女孩说：“还不对。伯伯再猜一次。这个东西是发出咪咪的声音。”

伯伯说：“会发出咪咪声音的，那一定是猫了。”

孩子们高兴地叫了起来：“对了。伯伯猜对了。”

---

① 平平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女儿。——译者注。

这时平平打开盒子，拿出9只瓷猫。每只猫神态各异。她亲了一下伯伯，并说：“这是我们送给伯伯的礼物。”

接着，有的孩子送一朵花，有的孩子送自己刚画出来的画。伯伯同孩子们愉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

**看望越南学生。**8月18日上午，伯伯看望正在中国学习的近千名越南兄弟姐妹们，并同他们作了亲切谈话。

**作客刘少奇家。**8月21日，刘少奇主席邀请伯伯到他家里作客并设宴招待。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周恩来、彭真、陈毅、聂荣臻、王稼祥、何伟同志。各位领袖之间亲如同志，爱如兄弟。我们得知，刘少奇主席在30多年前已认识伯伯，那时他们两位都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伯伯约在40年前还年青的时候，就结识了周恩来、陈毅、聂荣臻……。

此行在北京，雨天多，晴天少。当有几天好天气，伯伯来到天坛、颐和园、十三陵水库、军事博物馆参观、游览。

**游天坛。**天坛是从前皇帝祭天的地方，这是一座宏伟的圆形建筑。古代科学认为天是圆的。这座建筑高大，但是建筑时没有用一颗钉，说明其技术很高超。坛前面有一条用宽石头铺的路，长数十米，延伸至两座砖墙。这座墙是没有机器设备、没有电线的“电话”。一个人站在墙这一头说话，另一个人站在墙那一头，把耳朵贴在墙上，就像听电话那样清晰。天坛周围是一大片园子，有许多生长了几百年的古树，有的松树长得曲里拐弯，像盘曲的龙。现在天坛已不是用来祭天，而成为一处供人民游玩的公园。

**颐和园的旧事和新事。**颐和园楼台宏伟，景色秀丽，许多人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恕不赘述。我们只想提一件旧事和一件新事。

H同志给我们讲了这样的旧事：满清宰相李鸿章欲向外国贷款建立海军。一个亲近西太后的贵族告他：“想要得到批准同意，则必须博得太后欢心。你应搞一笔贷款修建一座花园，供太后游玩……。”李鸿章听了之后，便用相当大的一部分贷款来修建颐和园。但是，钱用光之后，花园仍未修好。李鸿章只好继续贷款下去。当

颐和园建成后,贷款已花得精光,无法建立海军。

新事:这一天,许多放暑假的学生在颐和园划船。他们看到伯伯的船后,便跟随和护送伯伯的船划了一程,许多女学生边唱歌边划船。一位年轻的母亲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当靠近伯伯的船时,小女孩大声叫“胡伯伯!胡伯伯!”接着要求过到伯伯的船来。小弟(3岁)看到姐姐(5岁)被伯伯抱着和亲着,也要到伯伯的船上来。最后姐弟两人要求跟着伯伯,不肯回到母亲身边……。过了几天,伯伯收到这两个孩子家庭的一封表示愉快和感谢的信。

造福万代的十三陵水库。所以叫“十三陵”,是因为在这周围的山岭中,有明朝13个皇帝的陵墓。

这里原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山麓,全是大石和卵石。每到雨季,山洪爆发,温榆河泛滥成灾,淹没这里的田园村舍。党和政府决定把害水变为益水,修建一座容量6000万立方米的水库。整个工程于1958年1月底开始,需修筑一条长618米、高29米的大坝,坝底宽179米,顶部宽7.5米,还要挖250万土石方。

工程完成后,将把最大的洪水流量从2200立方/秒减到610立方/秒。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各位领袖同志、部队指战员、工人、农民、妇女、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学生、演员、工商业者,一直到大使馆人员,都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劳动时间短的几天,长的3个月。

奋斗5个月,造福万代。“十三陵”水库的水可灌溉2万公顷耕地,使坏田变良田。年产鱼1250吨。水库周围成为一个公园。每天可容纳50万人来此游览乘凉。首都北京增添了一个优美风景区。

参观军事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是为纪念解放军32年的功勋而修建的,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楼两翼各4层,中央7层。顶层有塔座,塔顶上托着嵌有“八一”两字的直径6米的红星。博物馆广场中心有一个装饰12朵莲花的喷水池,两侧有两座塑像,东侧为海陆空军,西侧为工农和学生。

伯伯参观时受到全体工人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博物馆的负责人领着伯伯参观并作了扼要介绍。

一层东侧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馆，陈列了从南昌起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料。西侧是抗日战争纪念馆。二层陈列反蒋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史料。三层陈列抗美援朝史料。六、七层是办公室。

由于时间不多，伯伯只参观东侧的几个展室。伯伯又一次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同志的图像。

## 回 国

8月25日，乘飞机回河内。在北京机场欢送伯伯的有周恩来、彭真、陈毅、王稼祥及中央其他许多同志。苏联和越南驻华使馆的同志也前来机场欢送。

伯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访问了苏联10个共和国和19个城市，访问了中国5个省和7个城市，行程23000公里，使用的交通工具具有飞机、轮船、火车、汽车。伯伯会见了许多旧相识和新朋友，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参观了许多农场、工厂、学校。伯伯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看儿童宿营地和幼儿园。

俗话说：“赶一回集，学一分乖。”我们不敢说已学了多么“才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各兄弟国家人民的坚韧不拔的努力，持续不断的竞赛，无穷无尽的干劲，飞跃一般的进步，通过耳闻目睹，使我们更加深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我们祖国和我们的将来灿烂辉煌。

#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五十年 评述(1946—1996)(续)

张会才 韩凤琴

## “展 开”阶 段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是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展开”阶段。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3个时期,即前期(1957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期(1966年下半年至1970年)和后期(1970年至1977年)。

“展开”阶段的前期,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时,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的中共党史学界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两条研究道路。

由于中国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后来中苏之间又展开了大论战,使得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产生一些疑惑。最大的疑惑是从对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和“大跃进”等国内外政策的观察中逐渐加深的。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什么不与批判斯大林合作?为什么认可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为什么急于建设共产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日本学者在探索一条新的研究道路。石川忠雄、德田教之等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借用美国的中国研究方法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史就是探索新道路的尝试。似乎可以说,中



苏论战引起中苏两党两国的分裂这一事态,大大助长了日本引进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开始形成当时曾流行一时并对后来产生一定影响的研究道路。

应该说,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该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1964年由石川忠雄、小田英雄译成日文,由庆应通信出版),是对日本中共党史学界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大的冲击。然而,由于1962年的亚洲财团和福特财团向日本的中国研究提供资金问题引发的一场争论,从1964年开始有些日本学者对美国的中共研究方法进行批判。

日本学者认为,这个时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体制还很薄弱,处在尚未确立中国现代史研究方法的状态之中<sup>①</sup>。

“展开”阶段的中期,日本围绕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研究领域里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也就是战后第二次大论战,争论焦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于学者的背景不同和研究角度的差异,日本人的观点常常很不一样。但是,研究成果甚丰。

今堀诚二在评述这个时期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发表了许多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论著。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从神化毛泽东到为林彪唱赞歌,还有追随“四人帮”的。今天,回过头来研究这些论著,谁也无法否认,在这几百篇文章中,尽管作者费了不少心血,但是大多数文章是无用的,或者说是有害的。当然,也有一些著作至今依然很有价值,那是个例外<sup>②</sup>。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肯定、赞扬过“文化大革命”的外国朋友和学者,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承认由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对中国有好感的朋友和学者肯定和赞扬“文化大革命”是不奇怪的。

<sup>①</sup> 平野正:《史学杂志》1958年5月号。

<sup>②</sup> 今堀诚二:《探索中国革命的本质》,劲草书房1985年版。

日本朋友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著作和文章中肯定“文化大革命”，还有一点也是不能无视的，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难于解决这一现实。所以，笔者对今堀诚二所说日本朋友的做法是追随“四人帮”一说，不敢苟同。

当然，我们确实应该高度评价那些冷静地、理性地批评“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日本学者的研究业绩。

“展开”阶段的后期，日本的中共党史学界在70年代初就开始反思和总结“展开”阶段的研究成果，这是十分可贵的。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天儿慧在1972年写的《试论毛泽东研究》一文中指出，在通过研究毛泽东考察中国革命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用于这种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典型框架是：毛泽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首先这种框架有一种倾向，只把重点放在中国革命的胜利上，而且其前提条件是把毛泽东的理论乃至行动视为在本质上一贯正确。其结果，掩盖了中国革命中那些有生气的过程和毛泽东在曲折的现实中思想形成的过程。

野泽丰也在1974年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一书中写道：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刮起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风潮。由此似乎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就等于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就等于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史就等于毛泽东思想史。就这样把对中国的认识一般化了。

日本学者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共党史研究，为后来“探索”阶段的多元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展开”阶段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作为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如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研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还有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等。

“展开”阶段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中西功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判。

1969年中西功出版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一书指出，由于人们不加区分地把毛泽东个人的著作中的所有观点和毛泽东时代的所有政治方针都称作“毛泽东思想”，从而妨碍了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他主张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正确的区分。一部分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毛泽东思想，即七大上所确立的毛泽东思想，一直到八大中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一部分是“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它是1957年、1958年以后得到全面展开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体系。

中西功分析“今天的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为，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今天的“革命”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在这里，中西功实际上指出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仍采取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动力的观点。尽管中西功在解释毛泽东晚年思想时把它归之为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这种看法确实不够深刻，但这丝毫不会淹没他那些闪耀着冷静、深邃、理性的真理性的火花。

“展开”阶级不仅有像中西功这样令人赞赏的研究成果，而且四部中共党史专著各具特色。

#### （一）石川忠雄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

石川忠雄，1922年生于东京都。原庆应义塾大学校长，名誉教授。中国政治、中共党史研究家。

笔者认为，石川忠雄利用新史料并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考察中国共产党路线的变迁和毛泽东路线的形成，同战前相比较，其观点比较客观。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者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契机，自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内部也存在着历史基础。”关于西安事变，作者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指出：在西安事变期间，莫斯

科所起的作用是给了中共中央在事变处理方针上以更大的信心，而不是像《对华白皮书》上所说的“显然又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改为执行救命政策”那样，起了决定性作用。

笔者认为，本书的主要不足是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代替中共党史。当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或者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史只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 （二）大久保泰的《中国共产党史》

大久保泰，1915年生，福冈县人。1940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现为朝日新闻社中国亚洲调查会特约顾问。

笔者认为，大久保泰历时18载编写的这部长达1700多页的中共党史专著，有以下特点：

第一，比较客观和公允。作者写道，战前日本的对华政策，由于对巧妙地领导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识的错误，导致了决定性的失败。为了不再重犯这样的过失，为了正确地、科学地理解中国，进而从提出一个果断的对华政策角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历史的、彻底的研究是重要的。

第二，资料较全。作者利用300余册著作和大量的论文，史料占全书的一半以上。不少史料是他自己将中文译成日文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又是中共党史资料汇编。

第三，填补了一项空白。日本学者在70年代以前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很少有人对1945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作详尽研究。大久保泰的这部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大久保泰分析研究了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在经济和军事上得到美国大力援助的蒋介石政权是怎样败给处于劣势的中共军队的。认为毛泽东实行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中共在内战中取胜的第一个因素。而第二个因素，就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

笔者认为，本书的不足在于过多地、无选择地堆积资料，往往

冲淡了对历史的论述。

### (三)宇野重昭的《中国共产党史序说》

宇野重昭,1930年生于岛根县。成蹊大学校长,中共党史研究家。

宇野重昭的《中国共产党史序说》一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治学比较严谨。由于作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的编译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史序说》一书中利用的资料是比较准确的。另外,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常常采取严谨的态度。如他指出张国焘的回忆录固然十分珍贵,但是由于张国焘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编写的回忆录,而且又有记忆上的错误。因而,在利用这类资料时,需要十分慎重。又如关于共产国际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方面的文献相对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所起的作用,而对共产国际援助的功绩评价不高。前苏联方面的文献指责毛泽东路线是“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强调共产国际进行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首先需要公开各方面资料的全文。

第二,论述比较客观。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者写道:“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也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诞生。”“时间即使晚一些,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党也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因此,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史中的作用问题,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慎重评价。其机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研究其变化过程,重要的是弄清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成长过程。”

值得商榷的问题是,作者认为个人崇拜始于延安整风时期,还用权力斗争来说明党内斗争等等。笔者认为作者对在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什么要进行整风,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并不十分了解。

### (四)藤井满洲男的《中国共产党简史(1921--1975)》

藤井满洲男,1909年出生于中国长春市。中共党史研究家,中国研究所理事。

藤井满洲男在书的“凡例”中写道，“本书是为对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感兴趣，想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们主要从党内的路线斗争的观点出发简略地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说到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各种形态、投降主义和盲动主义路线，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并克服它，又通过这些斗争发展的历史。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看待一切，严重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在这种错误思想理论指导下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史，变成了个人崇拜史，路线斗争史，成了为“左”倾路线服务的工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党史学科遭到严重歪曲、破坏的十年，是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严重挫折的十年。藤井满洲男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接受了中国当时的观点，这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 “探索”阶段

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是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探索”阶段。

“探索”阶段的研究特点是：研究对象多样化，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日本学者天儿慧指出，日本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似乎正处在大的转变时期。与此同时形成了两股带有特点的潮流。所谓转变，简而言之，就是除了以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为中心描绘中国革命史外，还从其他方面和角度加以研究。天儿慧所指的两股带有特点的潮流是：日本学术界正在开拓中共系列以外领域里的革命史研究；开拓中共系列内的，不过是开拓非毛泽东系列或非中共中央系列领

域里的革命史研究。属于第一种倾向的是对国民革命时期非中共系列的运动、组织和领导人等的各种研究。例如，山田辰雄的《国民党左派研究》（庆应通信 1980 年版）和横山宏章的《孙中山的革命和政治领导》（研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等。山田辰雄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阶段，而国民党史的研究显然十分落后。关于研究国民党史的意义，山田辰雄认为：A. 以共产党史研究的成果为前提，补充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欠缺部分；B. 通过研究国共两党对立的侧面，在中国现代史中相对地理解各自的政治路线；C. 在弄清国共两党的一致点和对立点之后，理解国民党左派的重要性；D. 为孙文研究提供新视角。1980 年 3 月，以山田辰雄、宇野重昭、藤井昇三和姬田光义等为中心，成立了“民国史研究会”。属于第二种倾向的，似乎还可以分成以下两点：第一，把中共中央内部非毛泽东的部分作为主体进行的研究。今井骏、姬田光义、古厩忠夫、蜂屋亮子、石井明和横山宏章等分别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为对象进行了研究。第二，以中共中央影响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等所谓的地方和基层为中心描绘革命的政治动态的研究。对中共创立初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城市和农村群众运动的研究成果特别显著。例如，田中恭子活用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考察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以及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在土地政策问题上的路线、政策和实践方面的各种问题。对晋冀鲁豫地区土地革命的研究，有加藤祐三、川井伸一和内田知行的论文。研究东北地区的，有姬田光义和西村成雄的论文。

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探索”阶段，呈现出日本学者所说的“主体性变化”。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编辑出版有关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资料汇编。继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共 12 卷）之后，日本劲草书房又出版了由太田胜洪、小岛晋治、高桥满、毛里和子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上卷于 1985 年 7 月 25 日出版。

下卷于1986年11月25日出版),收录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继北望社出版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会编辑、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共10卷)之后,苍苍社又于1982年、1983年出版了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国际上对这套20卷本《毛泽东集》的出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它当作是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具有史碑意义<sup>①</sup>。

2、到中国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促进实证性研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者以大学客座教授或日本外务省特别研究员等身分在中国长期滞留,他们在中国收集了大量资料而且进行实地调查。有过这方面经历的小岛朋之、天儿慧、村田忠禧和国分良成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不少专著和论文。与此同时,与中国方面的研究机构共同研究也开展起来。近年来,日本的图书馆有关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馆藏迅猛增加,这大大改变了以往多从港台甚至美国收集和查询资料的状况。这使日本学者的研究较少受到美国的影响,研究成果客观得多。

## 二

日本学者在“探索”阶段,通过开拓新领域,取得了多元的研究成果。似乎可以说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中共党史研究已初见端倪,而自70年代末以来持续不衰的邓小平研究就是它的一个突出表现。

从总体上探讨日本的邓小平研究业绩,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1. 不屈的革命家——日本学者关于邓小平生平的研究。和田武司和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德间书店1977年版)一书,对邓小平的生平作了十分细腻的描述和研究。邓小平

---

<sup>①</sup> 麦克法夸尔编:《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是掌握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

内藤雄三于1978年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具特色的文章指出，“邓的前辈周恩来总理被人称作‘不倒翁’，整个一生都走在阳光大道上，未曾有过一次跌落。邓虽然有跌落但又百折不挠地站立起来，现在正开创自己的时代。可以说邓和周为人们指明了刚与柔的两条成功的人生路。”

2、“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日本学者关于邓小平的思想与理论的研究。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在《中国研究季刊》1986年5月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纠正了‘文革’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完成了在新的条件下使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艰巨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将会越来越发挥其威力。”

天儿慧在《中国改革最前线》（岩波书店1988年版）一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为当代中国制定的宏图大略：（1）邓小平发展战略的大背景。（2）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是求富强，求统一。（3）对邓小平发展战略的展望。他认为邓小平战略由四根支柱组成。第一是为发展战略服务的系统理论的形成；第二是为达到目的安排战略“布局”；第三是确立接班人；第四是确立下一代的领导体制。

小川平四郎以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的眼光，敏锐地观察到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邓的头脑里经常同时存在两个观念，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sup>①</sup>。

渡边利夫认为，“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位于现实主义者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枢的，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思想的另一个精髓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而邓小平思想中的另一个核心是物质刺激政策，是让那些具有富裕资格的人、地区和单位先富

---

<sup>①</sup> 小川平四郎：《父亲的中国和我的中国》，日本同时代出版会1990年版。

起来的“先富论”<sup>①</sup>。

3、“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日本学者关于邓小平历史地位的研究。竹内实提出，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他在文章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毛泽东铺设的轨道上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我认为这就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sup>②</sup>。

4、围绕邓小平研究的争论。日本的邓小平研究是在争论中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的思想路线，在日本学术界开展了第三次论战。一些学者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人认为邓小平路线与毛泽东路线构成两极，是180度的大转变。时至今日，还有人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持批评态度。

自90年代初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已成为日本研究邓小平的争论点。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日本学者已有很好的研究。但是，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在关于中国现在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否成立、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相悖。他们的研究，或者引用一些不实材料，或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正确评价。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尚未到达社会主义就不得不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倒退。”甚至还说，“中国存在改变现行路线，朝着社会主义实行‘U’型转变的可能性”。从学术研究和实践的角度分析，这些议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过，笔者相信，经过围绕邓小平研究的第三次论战，必然推动日本邓小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同时，也

---

① 渡边利夫和小岛朋之合著：《毛泽东与邓小平》，NTT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竹内实：《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载日本《东亚》1994年6月号。

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中国学者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那就是怎样把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得更加透彻,并通过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使国外同行能够尽早地理解。

“探索”阶段,日本中共党史学界出版的几部中共党史研究专著值得介绍和评析。

### (一)高田富佐雄的《中国共产党》

高田富佐雄,1923年生于日本佐贺县,1944年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7年进入每日新闻社。1966—1967年任北京支局长,因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获得沃恩奖。1970年后专门从事著作工作。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辉煌业绩和发生的一些失误,写道:究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不要说预测,就连理解都很困难的这种独特行动有什么依据吗?要想解开这些疑团,首先有必要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20年代初,一批受俄国十月革命鼓舞的中国青年几经挫折在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战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权,以后在没有值得借鉴的样板的条件下边探索,边实践,又经历近30年,他们相继去世,把接力棒交给了“第二代人”。“第二代”党员如何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适应新的现实,这是今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

笔者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客观的。

### (二)宇野重昭的《中国共产党——其历史与实情》

该书是宇野重昭采用一种十分活泼的问答形式写成的中共党史专著。这恐怕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了。问答形式,不仅对于学者,而且对于一般读者也比较容易接受。用这种形式写党史在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中是个首创。书中层次清晰,言简意赅,确实有可供参考和借鉴之处。

就党史研究成果而言,书中有独到见解。这里仅举作者对两次国共合作的研究来说明。

作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毕竟过于勉强了。但是不管怎么

说,中国共产党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锻炼,从知识分子的集团,成长为强有力的工人、农民的政党。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也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政方针指导下由广东一省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大运动。因此,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持完全否定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宇野重昭认为:一致抗日乃是非常英明的政治决断,这种主张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为什么莫斯科也渴望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保卫苏联的考虑。蒋介石完全没有一致抗日的意思。他打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先消灭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这样,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权就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了。当口中战争于9月23日全面展开时,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了。它与当初共产国际所期待的方式不同。但是结果使日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保证了苏联东方边境的安宁。而且,这次国共合作的主动权,始终明显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

### (三)伊达宗义的《中国共产党简史》

伊达宗义,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教授。

伊达宗义一书的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

作者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比较客观,如对古田会议的评价、对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的原因和意义的研究、对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失败原因的分析等等。

不过,伊达宗义文章中的不少观点是不正确的。由于篇幅有限,仅举两例:如1、对两次国共合作的看法,不仅同我们中国学者相距甚远,就是与多数日本学者也很不一样。作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的最大失策,而且把责任归于孙中山先生。他写道:“孙中山决定国共合作,对国民党来说是留下了一个不可估量的大祸根”,“国共合作对国民党一点儿好处也没有”(第2章)。作者还认为西安事变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它是国民党逃离大陆,中共建立政权的远因。在西安事变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第8

章)。2、作者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不仅与中国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就是与多数日本历史学家也很不一样。作者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中共一手策划的，中共希望日中爆发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卢沟桥事变完全是突发事件”(第9章)。

笔者认为，日本史学界比较重视实证主义方法论，这在历史研究中有其积极作用。但是伊达宗义在资料利用上没有继承日本史学界的传统方法论，过多地相信台湾方面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事实不符。

## 结 束 语

笔者依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把战后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50年分成“重建”、“展开”、“探索”3个阶段，并分析了各阶段的争论问题、研究特点和研究倾向。

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历史很长、队伍庞大、成果丰富。这在国外的同一研究领域中给人以突出的印象。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史，是战后中日关系史的一种反映，一个缩影。

日本学者常常以不同于我们的方法和角度对中共党史中的某些问题提出需要深入研究的见解，给我们拓宽视野，深化研究以启迪。

笔者的简略评析，未必准确，只是抛砖引玉而已。目的在于把中日两国中共党史学界的交流活动加深一步。

## 新书选介

《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刘英回忆录》(增订本):这本由刘英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她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记述了她和张闻天历经风雨、命运与共的夫妻生活。书中叙述反映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和挫折,涉及到一些高层情景。全书14.5万字,1997年8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钟期光回忆录》:本书是中共高级将领长篇回忆录大型丛书之一。钟期光上将以一个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情怀,回顾了自己近60年的戎马生涯,该书溶历史和审美于一炉,是一部难得的纪实佳作。书中近30幅历史照片更是珍品。全书40万字,1997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王宗槐回忆录》:该书真实地记述了王宗槐由一个“织布伢子”成长为我军著名高级将领的历史。全书24万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陈铭枢回忆录》:本书介绍了陈铭枢少年的苦难生活、投身辛亥革命、粤军时期、在北伐军中、卷入内战漩涡、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欧游和归国抗战、经营神州国光等不同时期的经历,并附录了秦庆钧、蒋光鼐、霍实子的回忆文章和陈铭枢简谱。全书19万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9日出版。

《新四军通史》:本书叙述了新四军从1937年10月组建到

1947年1月整编近10年时间自身发展及其对敌斗争的全过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全书35万字。

《中韩关系史》(现代卷):宋成有、姜忻、王蕾等著。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叙述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1996年这一历史时期,中韩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又由缓和而建交的化敌为友的历史演变过程。全书22万字,1997年1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王红续著。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于建国前的中英关系史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建国以后,集中考察当代中英关系的演变,以及香港问题在当代中英关系中的地位。全书20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中国革命根据地商业史》:刘录开、钟廷豪主编。本书以大量珍稀史料,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商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商业、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及其20多个根据地的商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全书31万字。

1947年1月整编近10年时间自身发展及其对敌斗争的全过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全书35万字。

《中韩关系史》(现代卷):宋成有、姜忻、王蕾等著。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叙述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1996年这一历史时期,中韩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又由缓和而建交的化敌为友的历史演变过程。全书22万字,1997年1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王红续著。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于建国前的中英关系史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建国以后,集中考察当代中英关系的演变,以及香港问题在当代中英关系中的地位。全书20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中国革命根据地商业史》:刘录开、钟廷豪主编。本书以大量珍稀史料,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商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商业、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及其20多个根据地的商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全书31万字。